

德國社會經濟史

加田哲二著

徐漢臣譯

各國社會經濟叢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教員
專用

各國社會經濟史叢書

德國社會經濟史

加田哲二著

徐漢臣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著者序

關於德國的事物，我素來抱着興味來觀察的。這是由於一九二三年初夏以後，我有三年間滯留德國的緣故；關於德國，想寫一些一般事物的希望，卻早就有了的。我不願意寫印象記那樣來寫，希望總寫得像研究的書籍，幾年以前，曾經寫了一本德國經濟思想史，這是整理講義的筆記而成的。借了這個機會，我也寫上了德國社會經濟史。關於經濟史，我是個門外漢。不過因為年來對於德國事物的接近，所以就寫成了這本書。自然，自信是不敢的。一方面動筆寫，一方面就感到德國經濟史的困難地方。本書就是從自己研究過程中的扎記裏產生的。寫這本書的時候，自然有許多地方利用了內外先進學者研究的成果，是深深地感謝的。再又因為是處理着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史那樣廣泛的對象，所以淺學之處，自然有許多錯誤。這是虔乞先進學者的教示的。

加田哲二

目錄

第一章	日耳曼民族的經濟生活	一
第二章	原始土地制度的變革	二七
第三章	莊園制度	五〇
第四章	中世紀初期的手工業及商業	六二
第五章	中世紀都市及其手工業和商業	七三
第六章	中世紀社會的崩壞	九五
第七章	實業革命前夜的經濟狀況	一一二
第八章	實業革命前夜的社會狀況	一三七
第九章	實業革命和工業的發展	一五八
第十章	實業革命時代的農業	一七九

第十一章	交通的發展	一九四
第十二章	商業及金融的發展	二〇六
第十三章	十九世紀後半期的社會運動	二二三
第十四章	統一國家的形成和俾士麥政策	二四七
第十五章	作為帝國主義看的世界政策	二六七
第十六章	帝國主義的進展	二八六
第十七章	世界大戰和經濟	三〇〇
第十八章	戰後的社會狀況	三一四
第十九章	戰後的經濟狀況	三三一
第二十章	戰後的社會經濟狀況	三五二

德國社會經濟史

第一章 日耳曼民族的經濟生活

一

德意志人起初並不住在歐洲中部，大概是有史以前遷移到這裏來的。古代德意志人即所謂日耳曼人（Die Germanen）是雅利安人（Arier）即印度·日耳曼族（Indo-Germanien）的一個分枝。通常認為印度·日耳曼族發生於亞洲中部。其中向北遷移的是日耳曼人，向東遷移的是斯拉夫人，向東南的是印度人，向南的是波斯人，向西的是克爾特人（Kelten）向北遷移的日耳曼人，似乎曾經久住在斯干的那維亞（Skandinavien）半島上。以後在紀元前六世紀左右，日耳曼

人就移住到了現在的德國北部一帶，維克塞爾河（Weichsel）易北河（Elbe）的河畔。再以後，在紀元前二三世紀時候，終於住滿了現在的德國全部領土，西達萊茵河（Rhein）南至柏門（Böhmen = Bohemia），梅崙（Mähren = Moravia）一帶都被住滿了。

這裏所說的日耳曼一名，即日耳曼人的意思；這是和日耳曼人鄰居着的克爾特人所稱呼它的用語，含有「鄰人」那樣意思。此外另有一說，以為日耳曼是「森林人」的意思，再有以為具有「軍人」的含義。可是，日耳曼一詞，是克爾特人的言語，倒是千真萬確的。英語裏（German）一語，雖和「德意志」為同義語，但在德國，「日耳曼」和「德意志」是不同的。克爾特人所稱呼的日耳曼人，祇限於紀元前二世紀末葉，纔移住到萊茵河左岸的高盧（Gallia）的種族。以後，羅馬人也從高盧人那裏承繼這個用語，而且把這一個用語一般地應用了。至於「德意志」即（Deutsch）一語，本來是原始德意志語形容詞（diot），即「本國民」的意思。最先把這一用語用作「本國語」的意義的，是第八世紀中葉查理曼大帝（Karl der Grosse）創造德意志統一教會的時候，和教會語的拉丁語相對待，用它來稱呼德意志六大種族（法蘭克人 Franken，屠麟根人 Thür-

ringer, 士瓦本人 Schwaben, 巴威人 Bayern, 弗里斯人 Friesen, 薩克森人 Sachsen) 的共通語的。至於更進而把它用作民族的名稱, 而具有德意志人的意思的, 那是在八四〇年查理曼大帝的國家分裂以後。到了十一世紀, 一般都把它當作民族的名稱來應用了。

這樣看來, 日耳曼即有古代日耳曼人的意味; 正惟這個古代日耳曼人, 纔是德意志歷史上最後出現的人的要素。德意志歷史的開端, 就是這種名為日耳曼人開始的。

二

前面已經說過, 日耳曼人在紀元前二三世紀時候, 已經住在現在德國領土的大部分上了。當時日耳曼人分成東日耳曼和西日耳曼兩族, 這兩族從約二十種族所形成。他們居住在東界易北河, 西界萊茵河, 北達北海 (Nordsee) 南抵瑪因河 (Main) 和沙拉河 (Saale) 相聯一線之間的土地上。

關於日耳曼族最古的文獻記載, 有凱撒的高盧戰記 (César de bellis Gallico, der Gal-

Isiche Krieg) 和塔西佗 (Tacitus) 的日耳曼尼亞 (Germania) 等二種。此外雖然還有羅馬紀 念牌上所刻的繪畫雕刻，以及當時人類學的民族學的遺物，但主要的資料，是上述凱撒和塔西佗 的二種文獻。凱撒的高盧戰記係紀元前五八年之作；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係紀元後九八年之作；其間約隔一百五十年的期間，日耳曼族的社會生活，也有相當的發展。這些羅馬人的記載，爲什麼能夠完成呢？這是因爲羅馬人和日耳曼人接觸的結果。上面說到過，日耳曼人的居住地，從德國北部一帶，擴大到萊因河畔，到萊因河上流和多腦河 (Donau) 相聯結線上；而且不停地渴求着從寒 冷礮礮地帶。遷移到溫暖肥沃的南方國土。一方面，羅馬已經確立爲世界的國家。它的社會經濟基礎，是建築在奴隸上面的。羅馬所以四面八方從事戰爭，主要目的就在於獲得奴隸。然而羅馬不斷的戰爭，反而引起奴隸的減少。因之，羅馬就設法要獲得奴隸的泉源，認爲日耳曼尼亞的地方，正是這種奴隸的泉源之一。於是羅馬就派遣凱撒，進行征服日耳曼尼亞的戰爭。凱撒經過八年的戰爭，雖已完全征服了日耳曼尼亞；但紀元後八年，羅馬軍隊在托伊托堡森林 (Teutoburger wald) 的戰敗，實開日耳曼人侵入羅馬之先河。

隨着日耳曼人的發展，羅馬人轉取守勢。在多腦河萊因河上流的聯結線上，設置許多要塞，在要塞之間，再設置邊牆（Grenzwall）以防禦日耳曼人的侵入。於是日耳曼人和羅馬人之間，保持着勢力的均衡狀態；可是，這種辦法，對於文化未開的日耳曼人，給予了巨大影響，特別是在羅馬人領域和日耳曼人領域間的境界——萊因地方，這種影響尤為顯著。因而，羅馬人和日耳曼人雖互相接壤，各存着侵入的野心；可是到了凱撒以及此後經過一百五十年的塔西佗時代，還能夠看得到原始日耳曼人特有的生活狀態。

三

古代日耳曼人大約住在現在德國的全部領土上，這已經是明白的事實。可是，日耳曼的人口，到底發達到如何程度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得不到正確的資料，現在就把恩格斯（Engels）的概算及其根據，引用在下面：

「據塔西佗說，德意志是人口極多的民族。關於德意志諸民族人口之概略的統計，我人可

於凱撒著作中得之。他說，遷住在萊茵河左岸的攸息匹爾 (Usipier) 坦克特勞爾 (Tencteres) 的人口，男女共計一八〇、〇〇〇人。故每民族計之，約爲一〇〇〇〇〇人……假使我們根據報告，把定居在萊茵河近傍的更熟悉的各民族配置起來，那末每個民族在地圖上所佔地位，約有普魯士行政區域那麼大，即約有一〇〇、〇〇〇平方公里，或是地理學上的一八二方哩。然達於維克塞爾河的羅馬人之大日耳曼尼亞 (Germania magna) 大概擁有五〇〇、〇〇〇平方公里。假使每一民族平均人口數以一〇〇、〇〇〇人計算，那末大日耳曼尼亞的總人數，約計五百萬。就一個野蠻的民族集團而言，這已算巨大的數目；然比之今日狀態而言——每平方公里一〇人，或每一地理學上的平方哩住五五〇人——仍是極爲渺小的。可是這個數目，並不盡把當時生存着的日耳曼人全都計算盡了。我們知道沿喀爾巴阡山脈 (Karpaten) 直至多瑙河口一帶所住的哥德種 (Göten) 的德意志民族——巴斯塔雷人 (Bastarnen) 波伊基尼人 (Peucenien) 及其他——是極爲衆多的。所以普里尼 (Plinius) 就以他們構成德意志人的第五個主要民族。遠在紀元前一八〇年，他們就充作馬其頓 (Mazedonien) 王百爾修斯

(Parsens) 的傭兵，更在奧古斯都 (Augustus) 統治之初，一直進擊到亞得里雅那優 (Ari-anopol) 地方。即使假使他們不過一百萬人，那末在第一世紀初期，德意志人的人口概數，就祇少有六百萬人。」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
eigentums und des Staats) 第八章。

這些擁有約六百萬人口的古代日耳曼人，它們的狀態是怎樣的呢？梅林 (Franze Meiling) 在它的「德意志史」 (Deutsche Geschichte) 的開頭上說：當紀元左近，日耳曼族初見於歷史的時候；還是個未開化民族。可是，這裏所說的未開化民族，並非以爲日耳曼人的文化，是非常低下的。這應當解釋爲跟當時保有高度文化的羅馬人比較起來，日耳曼人才是未開化人的意思。像倫普萊希德 (Karl Lamprecht) 在它的德意志史第一卷上，也是這樣主張的。又如馬克思主義的史家巴爾哈特 (J. Barchart) 在他所著的德國經濟史上，也贊同上述的見解。所以，在歷史文獻上所能夠看得到的日耳曼人，可以看作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日耳曼文化的了。

上面已經說過，可以瞭解日耳曼人社會生活的資料，是凱撒的高盧戰記，和塔西佗的日耳曼

尼亞。就這些資料而論，有許多人以為凱撒只知道土瓦本族，關於其他日耳曼人，祇是由此類推出來的；不但如此，而且他一般地觀察草率，或是誤解了日耳曼人的報告。關於凱撒的這種批判，是倫德 (Landau)，惠次 (Waitz)，亞倫脫 (Arnt)，愛西霍倫 (Eichhorn)，肯普爾 (Kemble) 諸人所主張的。不同意這種批判的反對意見，也同樣存在着。譬如漢森 (Hansen)，圖第希烏姆 (Maurer)，洛雪爾 (Roscher)，亞諾爾特 (Wilhelm Arnold)，基爾克 (Gierke)，羅特格拉森 (Glasson)，庫蘭吉 (Fustel de Coulanges) 等，就採取和上述批判相對的見解，認為凱撒不僅研究土瓦本族，也研究了其他諸族，而正確地記載了日耳曼人的各種制度的。就是在現在，對於凱撒著作價值的評價，也有各種見解。最近多數學者，譬如邁增 (August Meitzen)，愛斯馬因 (Esmein)，胡普斯，恩勃 (Max Weber)，拉哈法爾 (F. Raafah) 斯特納格 (Inama Sternegg)，挨倍爾特，克緒克 (Kütschke) 等，都承認凱撒記載的價值的。關於塔西佗也有各種批判，譬如像諾爾登 (E. Norden) 那樣就認為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對於日耳曼族的經濟史，是具有無可倫比的重要性的資料。

根據凱撒的記載，日耳曼人「幾乎不從事耕作，主要是吃的乳，乾酪，肉類；凱撒關於他所觀察得最詳細的士瓦本族這樣說：「他們的食物幾乎沒有穀物，大部分是乳，家畜（肉）多以狩獵爲常。」從這裏看來，凱撒時代的日耳曼人，就可以推想到不是純粹的遊牧民族，而已經從於農業耕作了。而且根據發掘出來的被認爲當時遺物的木犁，也可以明瞭，那時日耳曼人已經實行耕作了。

關於這事，我們憑了考察日耳曼人之間的土地關係，也可闡明白的。凱撒的「高盧戰記」第六卷第二二節上說：「任何人都未曾所有着區劃開來的一定土地，或私有耕作地；對於民族及血緣共同體，每年上司指定給它以它所需要的耕作地，而每年強制轉移給其他民族或血緣共同體。」根據這個記載，可知日耳曼人當時確已從事農業。上述文句指示出日耳曼人還沒有確定的土地私有權，土地都歸全民族所有，再由各民族來耕種它，而每年強制把耕地變換。很明白的，這裏所謂指定給民族的耕作地，並非爲民族所有，民族僅有使用權的意思。關於每年變換耕地，也有多種解釋。問題是由不同的民族來耕種同一塊土地呢，還是把新土地分給各民族，舊耕作地就被放

棄了呢？關於這個問題，有固定的定住論者，和戰時的臨時的定住論者之間的論爭，但是還缺乏資料，能夠用來判斷論爭的是非的。

不過，我們想到日耳曼人因發展而形成的移動的狀態，和它的半遊牧的性質，那末這種耕地變換制，可以說和他們的戰時狀態，是保有密切關係的。因而，從凱撒時代經一百五十年而入塔西佗時代，日耳曼人的耕種情形，已經稍有發展，土地關係，也就有和凱撒時代不同的。

即使在塔西佗時代，日耳曼人也從事狩獵和戰爭。在這時代，日耳曼人經濟生活的中心，和凱撒時代一樣，還是牧畜。日耳曼尼亞第二十三上說：「他們賣酒於萊因河畔，交換的對價，頗為簡單，以果實獸肉凝乳充之。」據此看來，可知這時代還以家畜為生活的中心。不過，從凱撒時到塔西佗時代這一百五十年之間，農業多少已有一些發展。日耳曼尼亞第二十五上有下述記載：「奴隸不像羅馬奴隸那樣，服役那被分配了的一定的家事，他們有自己的家，自己維持生計。他們和羅馬的佃農十分相像，只負擔着供給一定量的穀物，家畜，及其他材料的義務而已。」至於這些產業，卻是規模狹小，徵之於「家事，畜牧，農耕，都委諸於女子老人，以及家族中的弱者」（日耳曼尼亞的第

十五)便可瞭然的。

可是這一時代的日耳曼人，已經是定住的了。「他們有確定的住居」(日耳曼尼亞第四十六)而且他們已經形成村落，不過不像羅馬人村落那樣，各個住家是集合居住的」(日耳曼尼亞的十六)那一時代，耕地的情形是這樣的：「凡是適宜耕種的土地，全體村民測定該村居民的耕種能力，爲了耕種需要上而占有了它。於是，村再按照居民的能力，把所占有的土地分配給各人。因爲土地廣大，所以這樣的分配土地，是容易的。居民雖每年變換耕地，可是剩下來不耕種的土地，還是很多的。」(日耳曼尼亞第二十六)

四

那一種社會集團，來這樣分配耕地呢？爲了瞭解這個問題，殊有對於凱撒塔西佗時代日耳曼人的集團組織，加以一瞥的必要。當時日耳曼人的社會集團，全部是血族的身分的結合。當時的種族，係根據共同祖先所結合成的血緣集團。這種血緣集團，再分成許多「柏基」(Pegi, gau)，「柏

「基」再分爲更小的血緣集團——氏族。上面已經說過，適應着日耳曼人戰鬥的狀態，它的社會的結合，也帶有軍事性的。這種軍事的組織，也和血緣的組織保有深切的關係，即種族的軍制，分成千人組（Tausendschaft）這是和「柏基」相當的；千人組更分成百人組（Hunderttschaft）百人組就相當於氏族。

上面說過，土地分配係「上司」執行的。凱撒的高盧戰記上說：「僅在戰時，設置最高的政廳，平時則「柏基」之長，掌理人民的法律及警察之職」（第六卷第二十三。）這樣看來，凱撒時代的日耳曼人，就已經有一種政治機關的萌芽，氏族對於選定耕種用的土地，共同耕作地的界限及其利用方法上，那是一定要仰候「柏基」首長的指揮的。不過，對於已經分配了的土地，氏族有全體利用它的權利。所以，在土地關係上，「柏基」首長和氏族間的關係，可以認爲前者對於已經占有的土地，有管理處分權，而後者保持着所分給它的土地之利用權。這裏存在着兩者在維持秩序上的機能的分割。

到了塔西佗時代和凱撒時代的狀態比較起來，已經有了相當進展。前面早已說過，凱撒時代

的日耳曼人，經過一百五十年，到了塔西佗時代，已經定居了。在定居時候，氏族的百人組，就照原樣地形成了古代日耳曼的村落。這種定住村落，測定住民的耕作能力，占有一定地域，更把占有地分割成一定的均勻的面積，平等地分配給住民。這種一定面積的分割地，叫做「革華」(Gewann)住民依照村的規定，來耕種所分配到的「革華」。

不論凱撒時代或塔西佗時代，由「柏基」即「伽胡」(Gau)政廳或首長所分給的土地，每年都要調換的，這是上面早已說到過的。可是，和怎樣的土地來調換呢？這是一個問題。在半游牧半定住的凱撒時代，土地調換實行於「伽胡」領域之內，多種場合，所掉換的是未耕地，因而也能想像得到，由之就會引起住居的變更的；可是，到了塔西佗時代，卻變成耕作地本身的調換了。因為到了塔西佗時代，日耳曼人的定住，早已變成確定的事實了。此外另有一個進展是，在凱撒時代，土地由那分給氏族的，到了這個時代，土地由村落分給各戶住民，每年調換它所分給的一定的耕地。這裏所考慮到的是分給土地的戶或家族；戶或家族已經變成經濟上法律上的單位，村對於它們有指揮命令即土地管理處分之權。於是就發生了凱撒時代和塔西佗時代根本的不同。即是說在凱

撒時代，血緣關係構成了對於土地的關係；到了現在，土地關係變成社會結合的要素了。前期的血緣結合，終於逐漸推移到土地關係的結合了。

五

這裏成爲問題的是：這種原始日耳曼人的土地所有關係的性質問題。即當時存在的，是土地占有呢，還是已經私有化的問題。換句話說，土地是共同所有，抑爲社會少數成員所獨占地占有的問題。這個問題，一向已有激烈的論爭。現在作者先舉出共產說或共有說的主張，下面是這派代表的論者恩格斯的意見：

「二個自然發生的歷史，支配着全部或幾乎一切國民的原始歷史。即根據血族的國民編制和土地共有便是。德意志人也不外乎此。他們按照種族民族以及血族的編成，從亞洲開始遷移；在羅馬時代，還是近親者並肩而立，來組織其作戰部隊；這種組織，也支配着所占領的萊因河以東，多瑙河以北的新領土。各民族之定住於新的住所，像凱撒所明白地說，並非誤爲或偶然的。

而係按照氏族郡的種族關係來分佈的。關係比較接近的大的羣體，占據某個一定的地域，其中包含着各個多數家族的種族，形成村落而定住着。幾個近親的村落，集合而形成一個百人組，幾個百人組再形成一個郡（*Caru*）各地方的集合，就是國民本身了。凡村所尚未徵發的土地，留歸百人組來處分；百人組尚有未分配的，再剩留給郡；這時候，假使還有可以利用的土地——通常都是非常廣大的土地——，就歸全體國民直接所共有。在凱撒時代，至少德意志的大部分，即尚未達到定住時代的士瓦本族的耕地，是共同耕作的。這種共同耕作，根據其他諸國民類推起來，也可知道是照下列方法進行的：包含着許多近親家族的各個氏族，共同來耕種那分配給他們而又年年交換的土地，再把其生產物分配給各家族間。可是，到了我們的時代開始時候，士瓦本族也好像定住在新的場所，以後，共同耕作也忽然停止了。到了塔西佗時代，只知道是由每個家族來耕種土地的。不過，就是這時候，可耕種的土地也只能在一年裏使用，每年年終，土地又重新劃分而互相交換」（馬克 Mark）

「自從家長制家屬共同體——它是母權的共產主義家族和近代的個人小家族間的

問家族——差不多曾經普遍流行這件事，由科凡雷夫斯基（M. Kowalewsky）證明以來，問題已經不像在毛拉，惠次間所討論的土地是共有財產還是私有財產，而是共有財產的形態如何的問題了。當凱撒時代，士瓦本人不僅是存在着共有財產，而且是根據共同計算來實行共同耕種，這已是毫無疑義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除了這種古代日耳曼人實行土地共有的主張之外，還有一種否定共有制和私有制的主張，已故日本福田德三博士，就是其中的一個。他說：

「凱撒和塔西佗的記載，雖然明白地告訴我們，當時土地私的個人的所有並未存在；可是，與其承認那種從這裏立刻推論出來的，當時存在着土地共有制（其實，該項記載，私有共有兩者，都不曾說明的，）倒不如承認古代德意志，完全沒有土地所有的事實或觀念存在，並不會就所有的目的上來考慮和利用土地，要來得切當」（據凱撒與塔西佗以論古代德意志之土地共有制。）

福田博士這種對於日耳曼人土地共有制的懷疑，多半是根據喜爾得布藍（Hildebrand）

的原始經濟文化階段上的法律與習慣」(Recht und sitte auf den Primitivwirtschaftlichen Kulturstufen 一九〇七年)的，屬於共有制學說消極的批評一派。福田的主張，在共有或私有之外，考慮到一種無所有的狀態。「當時的土地，被認為等於像空氣一樣的東西。不論私的個人的，或公的共同的，所有觀念，都不曾存在。或者是極微弱的，正好像對於獵場水流一樣，說到極點，也不過好像我們對於空氣日光那樣的想頭。我們這種推測——古代日耳曼人不會把土地當作所有觀念的對察來考慮，決不至於受到妄加判斷的非難的。我們甚至認為：土地不僅不當作所有甚且是不當作共有的對象來考慮的，因為土地是那麼豐富那麼容易地存在着（前引論文：經濟學考證。）這就是福田學說的立論根據。

在日耳曼人，土地果然像空氣像水那樣豐富的存在嗎？凱撒和塔西佗都記載着日耳曼存在着富豐的土地。不過從上面引用恩格斯的著作文句看來，日耳曼是原始的民族，保有多數人口，住在威克塞爾、萊茵河以及多腦河的地域上，推測起來，約有五百萬的人口。對於五百萬人口而言，這個地域還能是像空氣像水那樣自由的天惠之物嗎？即使假定是如此，那麼，那種奉千人組的上

司 (Magistratus ac principes) 命令實行共同占領，共同開墾，每年又調換耕地的事實，即是說，把這種土地統制政策，看做是怎樣的東西呢？假使，一個種族全體的土地共有，或共有觀念，並未發生，那末，這種土地政策只好說是無謂之極了。不待說，未曾為千人組或百人組所共有的土地，一定存在着很多；不過問題並不在於未占有的土地，而是在既占有的場合，土地所有形態如何的問題。假使這時候，千人組或百人組對於土地採取一定方策，那末，至少這是千人組或百人組的土地政策。因為實行這種政策是以全體人民為基礎的，千人組或百人組對於土地就有緊密的關心，因而也不得不認為共同占有或共同所有的觀念，已經發生了。

六

現在成為問題的，雖然是恩格斯所說的「共有制形態」如何的問題；不過，是否像社會主義者所想的在將來社會那樣形態的共有制，卻是一個疑問。恩格斯一般地像下面那樣來敘述原始氏族制的社會的。「人口極為稀薄，僅是密集在種族的居住地上；其周圍廣大的地帶，先是狩獵地

域，其次是中立的守衛林，把他們和別的種族隔離開來。分業是極自然發生的，只在兩性間存在。男子從事戰爭，出去打獵或捕魚，生產營養的原料，以及這些事業所必要的工具。女子料理家務，製備衣食，以及烹調紡織縫紉。男子在森林，女子在家庭，兩者各為其不同領域的主人。各人都是自己所製造自己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男子是武器狩獵工具，女子是家具的所有者。家屬是共產主義的，大多數常常包括許多家族。凡屬共同製造及共同使用的，都是共有財產——家屋，園圃，長舟等」（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這樣，關於氏族社會裏成員的狀態，和土地私有制問題，同成論爭的目標。許多論者都主張和土地共有制同時存在的，是氏族社會成員的自由平等。這派主張典型的代表者是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的作者莫爾幹（Morgan）以及繼承他的學說的人，恩格斯以下的社會主義者，都屬於這種主張的。現在把恩格斯的主張引用在下面：

「這樣氏族是一種保有何等天真爛漫和素朴性的奇怪的組織啊！既沒有軍隊，憲兵，警察，也沒有貴族，國王和總督；沒有知事或法官，沒有監獄也沒有訟事，而萬事都秩序井然地進行着。

一切吵鬧爭執，都歸有關係的人員，即歸氏族或種族或各氏族間來解決的。流血的復仇，只是當作極端少用的手段，纔帶有威嚇性的存在着。而近代的死刑，只是這種復仇的文明形態，而也附着文明所具有的一切利益和弊害。同事務雖比現在更多——共產主義的家屬是爲多數家族所共有的。土地屬於種族所有，僅有圍圍等暫時分給家屬——，可是他們卻毫不需要現在那種龐大而複雜的行政制度。一切事情由關係者來決定。而且平常的場合，數百年來的習慣，早把萬事規定好了。不能存有貧者和窮困者。共產主義的家屬和氏族，對於老者病者和戰爭殘廢者，負有扶養的義務。一切人們都是平等而自由，女子也是如此。畜養奴隸的餘地尙未存在，壓迫異種族的必要，通常是不存在的。」（恩格斯上引書第三章）

上面的記載，是恩格斯依據莫爾幹的研究，關於易洛魁（Iroquois）人氏族的記載；可是，很可認爲這是恩格斯用來說明氏族社會的全部本質的。古代日耳曼人社會，是否是這種確保着自由和平等的人們所構成的？恩格斯認爲氏族社會的正常狀態，是像上面引文所表示那樣的。他說：「於是就全體看來聯合成爲民族的德意志種族中，已有和英雄時代的希臘人，以及所謂王政時

代的羅馬人所已發達的同樣的制度存在。即民會，氏族長協議會，以及企圖獲得現實五權的軍事元帥等。一般地，這已是氏族制度所能夠發展的最發達的制度了。這是野蠻上期典型的制度。當社會超過了氏族制度所滿足的界限時，氏族的秩序便告終了。氏族崩潰，國家便代之而出現。」（恩格斯上引書第七章。）

凱撒和塔西佗時代的日耳曼人間，純粹氏族社會的基礎，正在發生動搖。恩格斯也承認這點的：「種族的同盟自從凱撒時代以來，已經形成了。其中有幾個種族，已經有王的存在。最高的軍事元帥，像希臘人和羅馬人間那樣，已經努力謀做僭主，而且有時也能達到目的。不過，這種幸福的在位的篡奪者，現在也決不是無限制的支配者。但他們已經開始打破氏族制度的束縛了。」（前引書第七章。）

否定日耳曼人的自由和平等的狀態的人，主張日耳曼人間，已有支配和隸屬關係存在了。這派論者的根據，是日耳曼尼亞第二十五章中下述的文字：「僮僕並不像羅馬奴隸那樣，服役那被分配的一定的家務。他們有自己的家，自己維持生計。他們和羅馬的佃農十分相像，對於主人，只負

擔着供給一定量的穀物，家畜，及其他材料的義務而已。根據這節文字，主張日耳曼人已經一般存有隸屬關係。

主張這種學說的人們，認為日耳曼人之間的隸屬關係，是非常古昔的事物。凱撒時代的半遊牧的日耳曼人間，大多數人民從屬於少數的畜羣所有者而生活；塔西佗時代定住以後，這些少數的畜羣所有者變成土地的所有者，多數人民從屬於少數土地所有者，變成僕役即佃農，而從事農業；至於像土地的分配，可以解釋為乃是適應佃農耕種能力而實行的辦法。抱着上述意見的論者，打算要否定當時日耳曼人自由的存在。因而斷定中世封建的土地所有關係，其淵源實起於這個時代。

所謂日耳曼人的自由平等，並不像恩格斯所描寫的那樣理想的狀態，這由上面所引用的日耳曼尼亞第二十五的記載，已可瞭然。上述記載，證明負有納貢義的農奴，業已存在。不過，這種農奴存在，究竟是否像中世紀那樣本質的，這還有疑問餘地。從日耳曼尼亞或高盧記載上所記載的社會狀態，來證明本質的隸屬農民之存在，論證上是有非常困難的。不過恩格斯的主張對於所謂原

始共產制過分憧憬，使它理想化了。關於凱撒、塔西佗以前的日耳曼人的狀態，我們雖毫無所知，不過這兩書所記載的時代，已經不是恩格斯所理想化的時代了。這個時代已經屬於氏族制度社會的末期，可以發見隸屬關係若干的萌芽。我們是根據現實的史料，來觀察基本社會的發展，所以像恩格斯那樣理想化，是非嚴重警戒不可的。

七

馬克共同體內之有若干不自由民的存在，上面已經說過了凱撒、塔西佗時代的日耳曼人，在其社會體制之中，已經保有某種程度的階級差別。就是分成自由民和不自由民。自由民再分成貴族和普通自由民。貴族在自由民中占有最高地位，而且為數極少。貴族被認為比普通自由民更要高貴的人類，殺人時被支付的償命金（*Wergeld*）也是數倍於普通自由民，分配給他們的耕地，也比普通自由民多幾倍。所以有人以為，貴族和自由民之間，最初已有所有上的懸殊了。

在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中，業已散見王或貴族那樣的文字，而且在日耳曼族的各種族間，有

這種名分的也確是事實，不過同時有一種主張，以為像現在我們所理解那樣意味來解釋當時的王或貴族，這是誤解的。這種意見以為，這些王或貴族，在社會意義上和一般自由民並無何等不同，一般自由民並不會有受他們壓迫或支配的形跡存在。他們由馬克村落會議或種族會議所選任，其任務也不過執行會議的決定。馬克共同體裏最高的權力者，是馬克村落會議或種族會議。要而言之，馬克共同體裏的貴族，是因其行政才能或戰鬪的才能而居於類乎貴族的地位，並不是現在的所謂貴族。這二個學說，雖各有理由；不過，當時的貴族，不是像現在社會學、政治學上所解釋那樣意味的貴族，確是事實。他們所以成爲貴族，確係它的職能上所給予的名稱。所以他們的社會地位和普通自由民並無巨大的差別。

和多數自由民同時存在着少數的不自由民和出族者。塔西佗把不自由民的發生原因，歸之於日耳曼人間的賭博；不錯的，賭博是原因中之一，不過無論如何祇是原因中之一，而不是全部原因。多數不自由民是戰爭的俘虜產生的。他們是不自由民，可是不像羅馬的奴隸那樣，是真正意味上的奴隸。他們不像羅馬奴隸那樣服役於家庭勞役，而是有自己的住家，經營獨立的生活，僅向主

人買納穀物，家畜，紡織品而已。也有從這種不自由民中的被解放者。不過，被解放者的地位，和不自由民並無巨大差別的。

馬克共同體內，不論如何微少，階級的分化總是漸次發生了，這種傾向，終於把馬克共同體導到崩壞路上。這種階級的分化，起始是一種職能的分化；這種分化漸次永續化，固定化，便從職能的分化，走到身分的分化，而進展到階級化。這種分化的一個經濟的根據，是當時人類慾望的增加。以生殖著名的日耳曼族，在定住後的安易境況下，人口忽然激增，因而以原始耕種法經營的少量土地，不夠滿足慾望；又因為和羅馬文明的接觸，慾望增高，爲了過那滿足的生活，就不得不增加土地的生產。爲了這個目的，對於分割了的土地，就給各人以向所未有的處分權。向來每年交換土地的期限，延長到三年，六年，九年，十五年，終於分配調換，就被廢除，從來共同自由的土地，便變成個人的私有化。同時，大家都要求未被分割的共有馬克的開墾權，而且是實行了。一定期間採伐森林而開墾得來的耕地，變成了個人的私有財產。這樣，私有財產一出現以後，自然就因個人才能，經濟素質，以及家族所有勞動力的差異，財產的不平等就發生了。財產的不平等，又被那種和私有財產制共

同發達起來的購買權、贈與權、遺贈權等所促進。結果，就產生了富者和貧者，經濟上的獨立者和附隨它的非獨立者。和這種財產上的世襲權即承繼權，同時發生馬克共同體裏公務的終身任職的狀態，更由此而至於世襲了。在軍事上，凡有設立常備司令官的必要，這個軍職和別的公務一樣，也變成終身職，更變成世襲的了。因之就發生了稱爲侯爵（Hertzog）的階級。侯爵把戰爭中所獲得的土地作爲自己的東西，更爲了要所有那屬於古代馬克共同體的共同馬克，而行使一己的權力。此外，宗教的權力者也發生了。特別是基督敎舊敎教會的發展，炙手可熱，左右世俗的權力，漸次占有一切財富特別是共有地。共有的土地化爲私有地，馬克共同體因而就失去它的本質，終於崩潰了。

第二章 原始土地制度的變革

一

上面說過，日耳曼族的繁殖力很是旺盛，因而擁有多數人口。日耳曼本來是印度·日耳曼族。遷移到斯干的那維亞，更向南方前進，定住於萊因河以東，多腦河以北的地帶。可是日耳曼族常常渴望着氣候溫暖，地力豐沃的南方西郭的土地。可是，這些南方和西部一帶，從紀元以前起，就是羅馬的殖民地了。這就是阿爾卑斯山（Alpen）以北的羅馬領土。即是所謂高盧（Gallia）日耳曼尼亞（Germania），焚得力奇亞（Vindelicia），雷替阿（Rhaetia），諾立坎（Noricum）諸邦，大體上是以萊因河和瑪因河為中心的各地方。特別是從比利時，荷蘭起，到萊因左岸一帶，再向瑪因河，沿河趨威爾特（Worth），向符騰堡（Württemberg）的羅爾嘉（Lorch）成一直線，更由羅

爾希東趨，沿阿爾特末爾河（Altmühl），進向克爾海姆（Kelheim），從這裏再沿多腦河一帶地方便是。這就是占有着現在的比利時，荷蘭，萊因左岸，瑪因河左岸，德國南部一帶，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大體的觀念。

羅馬人在這些地方殖民，羅馬人在這裏徵取多量物資和奴隸。他們到這裏來殖民，爲經營其經濟生活，採取他們本國所用的方法。凱撒，塔西佗在記述日耳曼族時，所以會發現和他們故國文明各異的多量事物，乃是由於他們的社會組織，在發展階段上比較前進的緣故。日耳曼族侵入到羅馬的一部分領土，不僅變做羅馬所屬的農民；隨着人口的增加，在民族大移動時代——自第二世紀中葉起，到四百七十六年西羅馬帝國滅亡爲止——從未停止過侵入羅馬。日耳曼族文化和羅馬文明，因而進行其接觸和混合。這種文化的接觸上，不管日耳曼族是最後的勝利者，但充分受到文化階段上前進的羅馬文明的影響。這種文化的影響，就羅馬殖民地說，是從鄰接日耳曼族居住地帶開始的。所以，我們對於羅馬殖民地的社會經濟制度，實有加以一瞥的必要。

羅馬人把文明輸入到殖民地地方。因而在這裏能夠看到日耳曼人居留地所不能看到的都

市。在現在法國境附近的萊因都市特里爾 (Trier)，可以看到都門、宮殿、競技場、浴場等。這裏恐怕是戴克里先 (Diocletien 284—305) 帝以來在高盧西部諸地的首都罷。這樣的羅馬都市，就能夠發現於它的殖民地。可是羅馬殖民地主要的經濟，適應着殖民地的性質，是農業。即是說，農業是主要的生產部門，因而農業制度是最重要的。

二

阿爾卑斯以北的羅馬殖民地，當羅馬帝國末期，在羅馬領域內是頂富裕的地方。這種農業制度，在殖民地裏，也是當然的事實，可以看做是羅馬農業制度的模倣。爲了解當地的農業制度，非觀察它的土地制度不可。在觀察的便利上，可以分爲大土地所有和小土地所有。

即使在羅馬帝國及其屬領裏，兼併土地的傾向，從紀元前二世紀左近起，已經非常顯著。大土地所有制，在羅馬帝國內是支配的要素。大土地所有因爲自由農民的沒落，土地所有集中到少數人，作爲封建的土地所有而出現了。這種土地所有，在羅馬稱爲 *Latifundium* (大地主制) 羅馬

的大地主制，是紀元前二世紀左右發生的傾向；這是因為屢經戰事，自由小土地所有者趨於沒落，以及戰爭結果而輸入奴隸，使耕種大土地的費用低廉，增加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因而羅馬的貴族，纔有奢侈的可能。

這種傾向，同時也在殖民地的高盧出現。在阿爾卑斯以北的羅馬大地主制之內，有皇帝領地，羅馬達官的私領地，宗教團體的領有地。這些領地不僅是大土地所有，而且一般不許帝國行政權的干涉的。他們和封建領主的土地所有一樣，保有下級裁判權，能夠以一己的權力，來裁判領地內的居民。可是這種大地主制也負有向國家納貢的義務。不過，大地主制自體成爲一個納稅的獨立單位，在辦法上和別的單獨的土地所有者是不同的。大地主制以外的納貢，每一區域負擔着連帶責任的。假使其中有一個土地所有者沒有能力納貢時候，別的納貢者就非連帶負擔起這部分不可。可是，大地主制是被免除負擔這種連帶義務的，而且在查定納貢上，也常常可以減輕它的義務。自然，這種納貢辦法，更會助長小土地所有者的沒落，和兼併土地的趨勢。那是毫無疑問餘地的。

大地主制是一種不在所有。大地主制的所有者，經常住在都市，而派遣經理到所有地，命他負

管理之責。充任經理 (Procurator) 的多半是被解放的奴隸。大地主制的土地分兩種方法經營，一是整起借給總佃戶 (Conductor) 的部分和細分出租的部分；另一是由管理人 (Villicus) 直接耕種經營的部分。這就是說，分做佃租地和直接經營地兩種。

直接經營地係歸管理人經營的直轄地，總稱田莊 (Villa)，由其利用性質上的不同，再可分為城鎮田莊 (Villa urbana) 和鄉居田莊 (Villa rustica)。城鎮田莊是住宅地，是領主及其家族或經理的居住所在，有種種羅馬的設施。它們因此使用着奴隸，這叫做家族田莊 (Familia urbana)。至於鄉居田莊，和城鎮田莊完全分離的，是用作農耕生產的土地。田莊中心是經理或總佃戶居住的。住家附近是炊事場，奴隸在這裏勞動。其他有工場，販賣所，儲藏穀物的地下室及穀倉，奴隸的寢室也在這裏。家畜也在這裏附近飼養。圍繞四周的是農耕土地。領主的直接農園（不是租地）是歸管理人經營的，他們是被解放的奴隸；可是後卻歸奴隸來經營了。管理人的地位比奴隸高，婚姻也被認可的。其他還有管理販賣，奴隸監視人，管理倉庫，書記等職員。這些都是奴隸；就是直接經營農地的，也是奴隸；這些奴隸叫做鄉居家族 (Familia rustica)，每十人分爲一組，由

組長指揮從事勞動。這些奴隸起初當作動產，和所從事勞動的土地不發生關係。可以自由買賣，到後來想到土地的生產力和奴隸的勞動力間的關係，纔認為奴隸是和土地不可分的，記在土地總帳裏，就不能和土地分離出賣了。在直接農耕地，除這些奴隸之外，還以賦役形式，徵發佃租地上農奴的勞動來使用的。

總佃戶當佃租整抵租地時候，有時他再出租給二佃戶。有時，租地細分開來出租。這些佃戶總稱 *colonus*。佃農有法律的自由，自己營獨立經濟，以土地收穫為其所得。可是，佃農和土地是不可分的，當土地被出賣時，隸屬土地的佃農，也移屬新的所有者。他們對於土地所有者，有納貢和賦役的義務。納貢是土地收穫的一部分，有時也有繳納現金的。賦役是在農忙期節提供勞力。這些義務，雖是對於領主代表者——管理人或總佃戶的私的義務，可是他們在行政上，服從領主派遣的經理之支配，而且非完成它的賦役不可的。

這種佃租關係，是從大地主制內直接經營的不經濟性所引起的。即是從大地主制的勞動力——奴隸勞動的不經濟性，所引起的。奴隸是一種財產，農奴卻不是的。因之，在土地所有者看來，奴

隸的死亡，便是財產減少的意思，而農奴卻是無代價的可以代替的。在奴隸生產力很高，榨取率很高的場合，這種奴隸勞動在經濟上也可以成立的。奴隸勞動原來是強制勞動，對於勞動的刺激，只是監督的鞭策。而且，農業的性質既有季節性的，大經營要維持多數奴隸，很不經濟，因之，刺激半獨立的農奴的利己心，使之生活，而受其納貢賦役，是更經濟的了。

這樣，羅馬的大土地所有之外，還有小土地所有存在着。在這種小地主裏，有屯田兵·半自由的農兵（Laeti）先住民。所謂自由的屯田兵，是羅馬的兵士，當遠征歸國以後，被准許定住在國有地上，就變成農民；他們唯一的君主是羅馬皇帝，他們是被免除公課的。所謂 Laeti，是以充當農耕兵為條件，集團移住到雷替河（Rhaetia），日耳曼亞白爾基卡（Belgica），不列泰尼亞（Britannia）諸地的日耳曼族，Laeti是日耳曼人侵入羅馬領土後所發生的特殊的社會層。日耳曼諸族屢屢侵入鄰國羅馬的領土，尤其在奧理略（Aurelius）皇帝時代，許多日耳曼族迫近多瑙河中流的羅馬國境，要求進入羅馬領內。當時有數千日耳曼人，未得羅馬政府的允許，就越入國境了。而當時（紀元後一六七年）在羅馬領內，因為黑死病大流行，引起勞動力的不足。可是以後，日耳

曼族還是繼續越境。奧理略皇帝征服這些日耳曼族，許可他們移住到領土內來，充當奴隸，可是因為奧理略皇帝把他們作為日耳曼的奴隸，所以事實上獲得半奴隸的地位。後來日耳曼族繼續侵入羅馬，羅馬政府為補充其兵力的不足，叫他們負擔充當羅馬兵士的義務；因而他們受到羅馬國民的訓練，所謂因民族大遷移而促使羅馬政權的沒落時候，它就作為羅馬內部的日耳曼的要素，助長了這種趨勢的。

三

我們已經說過，日耳曼族侵入或移住到羅馬領土，是逐漸地進行的。紀元前一世紀，日耳曼族向西方和南方進出，把克爾特人從威塞（Weser）河·萊因河之間驅逐出來，追趕到多腦河沿岸的羅馬領地的國境，可是在這裏就給羅馬軍隊所阻止住了。日耳曼族的人口繁殖力很是旺盛，所以他們不能夠停止西漸南進的趨勢。從第二世紀中葉起，日耳曼族仍實行侵入羅馬領土。羅馬雖屢興討夷之軍，但它的勢力，仍舊日益增加，終至於非許可它移住到羅馬領土來不可。像前節所

說羅馬使他們充當農兵 (Laeti) 定住在國有地上。作爲農兵的日耳曼族的勢力，就漸漸鞏固它的基礎了。

這時候，又引起了民族的移動。東日耳曼族的哥德族，離萊奧得河 (Oder) 維克塞爾 兩河間的居住地，實行南下，東哥德族 (Ostgoten) 移住到黑海 (Schwarzes Meer) 北部沿岸地帶，西哥德族 (Westgoten) 居住到多腦河 以北的達基亞 (Dacia) 地方。到四世紀末，征服了居住在萊茵河 以東多腦河 以北的日耳曼族，也開始移動，絡繹侵入羅馬領土；羅馬 早已沒有阻止他們的實力。這些日爾曼族 也就充作羅馬 領內的農兵，提供兵士給羅馬 軍隊。這樣，隨着日耳曼族 的羅馬化，同時也誘致了羅馬 的日耳曼化 了。

西羅馬帝國 的沒落，雖是紀元前四七六年，但在沒落前二三百年間，日耳曼族 已經侵入羅馬，受到羅馬 的感化，同時給羅馬 人日耳曼 的影響。

羅馬帝國 沒落以後，日耳曼族 還繼續侵入羅馬，實行羅馬 的日耳曼化。所以，二世紀中葉所發

生的民族遷移，不差的是給羅馬以一大打擊，不過，羅馬的日耳曼化，並非憑藉這個民族大遷移的一擊，實在大有負於充當農兵的日耳曼族在羅馬內部的勢力，特別是軍事要素成長的。在這個過程中，日耳曼族由其新鮮的種族的活動，而把羅馬文明日耳曼化了。即是用新鮮的野蠻的力，影響業已成熟的羅馬文明，因而創設起日耳曼文化來了。

四七六年西羅馬帝國沒落後，占領阿爾卑斯以北的羅馬領地的日耳曼族中，有法蘭克族，勃艮第族（Burgundern），屠麟根族，查細族（Chauci），阿拉孔族，巴威族，定住在以萊因河和多腦河為中心的各地方。統一而支配這些種族的是墨羅溫（Merovinger）王朝。即在四七六年，日耳曼族的俄陶法開（Odoaker），掌握着羅馬帝國的統治權，其後十七年，哥德族的狄奧多里（Theodorich）王以拉溫那（Ravenna）為首都，而建設了國家。東哥德族的國家，一直繼續到第六世紀，滅亡以後，倫巴（Lombarden）人侵入，於五六年建立起一個王國。在這些日耳曼族之間，最有勢力的，是占領着舊羅馬領土中最富裕的高盧北部萊因沿岸的法蘭克族。四八六年，克羅特溫王（Clodwig）攻擊羅馬最後勢力的梅格力胡司（Syagrius），鞏固了一個國家的基礎。自從

他建設國家以來，直到七五一年，他繼續其王統，人家稱呼這個王朝叫做墨羅溫王朝。

四

關於日耳曼族的原始的社會經濟生活，業已加以敘述，這是以比較自由和平等的原理為基礎的社會。可是，在馬克共同體裏，威脅這種自由和平等的要素，一天一天發展起來了。在我們已經看到了的凱撒和塔西佗的記錄中，也已經有貴族存在，有所謂日耳曼奴隸存在的事實了。至於馬克共同體的土地分配制度，因為人口增加，及其結果的開墾荒地，而形成土地私有制的發展，逐漸使馬克共同體的本來面目趨於崩壞。馬克共同體的崩壞過程，在日耳曼族受到羅馬文化影響的部分，比較顯著，在別的部分，這種崩壞現象發生較遲。即是說在以萊因，多腦，西河為中心的地方，受到羅馬大土地制的影響，當四七六年西羅馬帝國沒落後，西哥德族把易北，萊茵兩河間的土地，和所征服的北高盧地方，合併起來，建設了法蘭克王國；這是以羅馬殖民地為中心，在那裏大土地所有，便已經發展起來。由此趨向東部，大多數場合，馬克共同體還被維持着。

以自由平等爲基礎的馬克共同體的社會分化，像上面所說的，有土地分配制度的變化，和轉化爲私有的傾向。他的原因，盧森堡（Rosa Luxemburg）這樣加以說明：「在這共產主義組織的內，使用高級農業鞏而形成重大的進步；馬克共同體在這個基礎上維持其鞏固的形態，以後，生產胎技術的發展更趨進步，某一時期以後，便不得不需要更集約的耕種。這種集約耕種，在當時農業技術的階段上，惟有用更集約的小經營，即是惟有人身的勞動力和土地更鞏固地更澈底地相結合起來，纔能達到。同一耕地若爲各個農家更長久地利用，這是細心管理耕種的前提條件。特別是土地的設施，不論德俄，像合拍子一樣，是土地交換漸次稀少的原因。一般地，在馬克共同體的生活中，到處都能發現土地交換期延長的特徵。這遲早就要完成從割地所有到世襲所有的推移。從共有到私有的變化和勞動集約是同一步調的，這我們可用下列事實來究明的。即凡森林或牧場經濟，無論何處都附帶有更爲優良的共用地；但反之，集約經營的農業就有這種事實：最初是分割共有地，接着便向世襲所有打開大路」（經濟學入門）。

除這種直接的分化之外，發生了一般的社會機構上的分化。關於一個共同體的事務，本由選

舉出共同體的構成員來執行的；但是共同事務的增加，是必然的，隨着這一種族和別一種族接觸的趨於頻繁，兩者間和平的和戰時的關係，也就增加。這時有特別重要性的，是戰時的關係。戰爭須動員共同體全體成員來執行的，但因共同體經濟活動的增加，全體動員就不得不發生極大困難。至於就共同體中每一個人，有的適合於戰事，有的不適合，這是不必說的。這樣，就構成了軍事專門家的武士階層。「這在最初是社會的一般大眾自己的工作，但因生產進步的結果，就逐漸形成原始社會某個一定範圍的專門。社會的勞動過程愈發達，愈能有規則的有計劃的進行，就愈不能忍受戰爭生活的不規則性和時間及勢力的浪費。在狩獵或遊牧的場合，戰爭時常變成經濟制度直接的成果；反之農業社會是附隨着社會大眾的和平性和被動性的，所以每每爲了防衛，動輒就有武人的特別身分的必要。自然，戰爭生活在一切原始民族之間，完成巨大任務，隨着時間的經過，到處會誘起一個新種類的分業。武人貴族或軍事酋長的分離，到處對於原始社會的社會平等，加以最強力的衝擊」（前引書）

這種社會的分化過程，構成新的經濟機構的基礎。這一過程在日耳曼族，從凱撒塔西佗時代，

就已存在。隨着紀元二世紀半所發生的民族移動及其完成，這種傾向就更加顯著，社會的分化過程被完成了。

五

社會諸關係雖然是隨社會的分化而變化，但構成其物質基礎的是土地所有關係，因而就來闡明這些基礎的事實。當時土地所有形態，分民地，領主領土，騎士領土，自由農民的土地等四種。其中所謂自由農民的土地，是指不隸屬的自由農民的所有地。第一所謂民地就是當塔西佗時代，除了屬於每個馬克共同體的土地以外，尚有屬於民族全體的土地，民地就是指的這種土地。在法蘭克王國，凡征服結果所占領的土地，特別是僭羅馬私有地。無主地，沒收地，都算做民地。這種民地和法蘭克王國的王權，有重大的關係。隨着法蘭克國王王權的增大，這種全體民族所有地的民地，便歸到被認為民族代表者的國王所屬支配。民地就化為王土。但王權對於這種土地的支配，和本來的王領地——也可以說是王家的私有地——是不同的。他祇不過有上層支配權，允許別人利用

的。但是，變成王士的土地，就不許旁人自由利用，每每必要得到國王許可的。

這個時代的大土地所有者，可以說是國王，貴族，豪族。貴族在日耳曼時代，便已存在，主要是血統上的貴族，隨其血統的高貴，而有多量的土地。但社會分化的發展，覺得社會的職能比血統更值得尊重，於是就發生官職上的貴族。血族上的貴族，不是得到官職，轉成新的貴族，就不外恃其傳統勢力，而滿足於微少的勢力。官職貴族因為對於國王獻納忠勤，得到報酬是攀登大位，賜予土地；再由利用它的地位，而擴大其土地了。豪族和國王沒有直接的交涉。用他在地方上的直接勢力，實行土地兼併；有新興的，和舊羅馬大土地制的所有者兩種。宗教團體即教會，也是巨大的土地所有者。我們已經說過，僧侶之社會的功能，在這一時代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因而他們是屬於支配階段的。而基督教的普及，引起了捐贈土地給教會的風氣，這是增長教會經濟勢力的重大的契機。捐贈土地的風習，開始的是國王貴族，再就普及於一般。後面要敘述到，隨着封建制度的確立，教會愈益增大其土地所有了。

這些大土地所有，它的利用分成直轄地和借地二部分。直轄地就是所有者的直接經營地，按

照所有者的意見而經營的。直轄地的中心，是所有者邸宅的所在（*Curtia, villa dominica, Fronhof, Herrnhof*）。附屬它的有直接經營的農地，牧場，森林（*Terra solica, Salland*）。直接經營的農地，是使用不自由民的勞動的。這種不自由民叫做體僕（*Mancipia, servi, Leibeigene*）以其身體隸屬於主人。此外，還有服役於地主的家庭勞動的不自由民。關於這時代的大土地所有者，和羅馬的大地主制，並無不同。祇不過一點不同，大地主制的農地存在於一個地方，而現在的大土地所有是分散的。因為是分散的存在，一方面借地就介在其中，借地人負有借地和大土地所有的強制耕作的義務。

借地用賦役地和自由民賃有地（*Precarium*）兩種方法出借的。第一是使負有納貢和賦役義務的農奴佃種，和羅馬農業制度是同樣的。和直接經營地隔得遠的土地，直接經營發生困難的場合，而又需要集約耕作如像栽培葡萄的，就歸農奴來佃種。農奴的隸屬關係，以填補直接經營農地在農忙期的勞動力的不足，為其主要目的。賦役地通常也使農奴佃種的；隨着大土地所有者的發展，一方面土地缺乏，他方面是勞動力不足，就完成共同的要求，借地便擴大到種種的階級。即

凡佃種賦役地，對於土地所有者加入隸屬關係的，有自由民，半自由民及不自由民。自由民不受何等約束，有人格自由，只負擔相等於租地費的義務，而且能夠任意解除佃租契約的。不自由民和耕地處於不可分的狀態，所以完全隸屬於土地所有者。不僅如此。不自由民在十二個月有六個月須和妻子一同提供勞動力給土地所有者的義務。半自由民介於兩者之間。他們之中，國王領地的佃戶和教會領地的佃戶，他的地位就比較高一些。

借地人所負擔的納貢和賦役，隨着借地人的社會地位的高低，負擔就有差異。身分地位高的借地人的負擔較輕，身分低的負擔就加重。這種因身分而產生的負擔的大小，起初是和人的要素，即和人的身體本身有關係的，可是逐漸人的關係有變成以土地本身為評定的標準的傾向。即是說，起初本是自由耕種的土地，由於借地關係的變更，雖在半自由民或不自由民耕種的時候，也可以用自田民的條件借得土地。同樣的，半自由民或不自由民的借地，以後歸自由民耕種，它的借地條件，也還是根據半自由民或不自由民條件來決定的。這樣，借地條件起初雖由人的身分來決定的，到後來卻變做以土地自身做評定的標準了。借地多半由半自由民或不自由民耕種的，隨着

土地兼併傾向的進行，自由民實行耕種借地，這樣就喪失了作爲自由民的資格。

第二，教會或僧院所屬土地的利用。屬於教會或僧院的土地，初由僧侶直接耕種。上面說過，因爲僧侶具有知識，長於技術，就造成開墾和耕種的進步。同時隨着基督教的普及，大家捐贈土地給教會，使教會或僧侶，變成巨大的土地所有者，結果，教會或僧院，只把一部份的所有地，直接用不自由民的勞動來耕種而把土地出借。這是因爲作爲教會僧院的財產的土地，按照教會法的規定，是禁止讓予的，所以就在出借名義上加以利用罷了。因之教會或僧院，把所有地的一部份，作爲賦役地貸借給農奴，別一部份就作爲自由民賃有地採用移轉占有權的方法；所謂自由民賃有地就是自願允許使用一物之謂。現在就是允許使用土地，便以一定的納貢，作爲報酬。即納入一定量的地租。用自由民賃有地這種辦法的，在出借者有必要的當兒，任何時期，都可命令歸還土地，所以極算一時的便法。但隨着時間的經過，許可使用期限，就被延長了。一時的方法，變做每隔五年更改一次，更變成允許終身的使用了。

自由民賃有地的借地，不像農奴借地那樣，受到身分上的拘束的。所以，這種關係，就被歡迎了。

甚至連貴族，也有用這種關係來利用教會的所有地的。根據自由民賃有地的關係，它的納貢也同別的大土地所有的借地一樣，是隨借地人地位身分的貴賤，而差異的。同時也隨宗教信仰的程度，即隨敬虔罪孽的程度，而有不同的。罪孽重的，使它負責多額的納貢，敬虔的人，就負擔少量的納貢。

六

大土地所有者以及對於它的隸屬關係的成立，一般是引起土地所有權的轉變的。在原始時代，大土地所有或更進而是土地私有本身，並沒有業已存在過的明確的證據。否定土地私有的材料，比肯定業已存在過的材料更多。特別在日耳曼馬克共同體內，土地可以看做是共有的，或總有的；這在第一章裏早已說過了。而且馬克共同體內共有的狀態，為其內部所發生的社會的分化所破壞，這也說過了。說明了馬克共同體內階級分化的事實，先在於專門軍人層的發生。我們現在要指摘出，這種專門武人的發生，是依賴那一般耕種技術的進步的。而耕種技術的進步，又不得不對土地所有發生影響。

縱使在初期，一切土地都是共有的馬克共同體裏，到了塔西佗時代，宅地和園地，已被私有，這是事實，但農耕地因為最初是馬克共同體成員的共同勞動所開墾的，所以公平地分配於共同體的成員之間，而且為他們所利用。隨着農耕的進步，實行集約農耕，便在分配來的耕地上實行特殊的農耕。這樣，一定土地的特殊性就帶來重要性，因為土地和馬克共同體的特定成員的關係，漸加密切。到了墨羅溫王朝，培西佗時代對於宅地和園地的私有權，就擴大到對於耕地的私有權了。尤其在受羅馬影響較多的高盧地方，耕地的私有權早已發展了。不過森林和牧地，依舊維持着馬克共同體的公有。這種制度，長久地一直繼續到後代。

於是，開墾馬克共同體的共有地，作為自己私有地，在馬克共同體的成員之間，也被認可了。人口的增加，必需耕地的增加，而土地的開墾，必需多量勞動；所以開墾的結果，常常算是開墾者的私有地，這且是必要的。這樣開墾私有地，是把普通共有地化為開墾地，所以不必像共同體的耕地那樣變成細分了的私有地，就不必負擔強制耕種的義務；因而開墾者就有在需要的時間，來耕種它所願意耕的土地之便宜。

這種耕地的，私有其擴大，在馬克共同體成員的權利上，引起一個巨大的變化。向來，馬克共同體成員，因為其有成員的資格，就有宅地、園地、耕種共有地的分配權利。到了宅地、園地變成私有地，共有地也規定了開墾私有權之後，於是就變成因為他具有對於這些耕地的各種權利，纔算是成員，不是因為他是馬克的成員，就能擁有這些權利。即是說，馬克共同體的成員，就被限定是那種分配到馬克共同體的耕地，私有這些耕地，用開墾來擴張其私有的那種人們。馬克共同體裏人口的增加和耕地的缺乏，使馬克共同體的成員獨合化，把這種制度固定化。當馬克共同體的土地很豐富的時代，移住到別的馬克共同體的共有地上，在這裏設定新的開墾地，是比較容易的；可是到了現在，對於馬克共同體以外的外來者來利用共有地，就誰都有抗議的權利了。這種抗議，該馬克共同體成員可在一年內行使之。在法蘭克族這是五世紀左右所公認的原則。對於這種抗議權祇有一個例外，就是當非馬克共同體成員得到國王的特許狀，而移住到馬克共同體的共有地上來的時候，馬克共同體是不能行使它的拒絕權的。這早就能夠看得出，原始共同體的支配權，給王權的擴大所壓倒了。確切承認了耕地私有權的馬克共同體，祇有在它的共有地上，保持着馬克制度

的殘骸罷了。

可是，馬克共同體對於私有耕地，規定了許多限制，來抑止完全的私有權之發展。即凡由馬克共同體所接受到分配的私有耕地，屬於全體家族，家長為一家族之代表，而處理之。這種耕地的承繼，先由家中男子來接受，已分家的弟或女子，沒有承繼權。當沒有承繼者的場合，土地就歸還給馬克共同體，到後來，因為憂慮到耕地的荒廢，分配土地的承繼權，就擴張到弟及女子，只有在這些家族都沒有任何人，或已經死滅的場合，分配土地才歸還給馬克共同體。這種承繼制度的變動，使私有權更被強化了。但在耕地經營的場合，私有的處理還受到許多限制。分配給各家族的土地，常是散處馬克共同體耕種的各部分，當耕地私有化的時候，就照舊樣子，沒有變化。因而各家族所有的私有地，多是面積狹少，散處各地。各家族的所有地，都發生各小塊的交錯狀態，當耕種這樣極狹小土地的時候，必要各所有者的協力，即必需強制耕種的。因而，舉凡關於耕種的種類，方法，時期，都非待村落集會來決定不可。這樣，馬克共同體並不許可站在純粹的土地私有權上，來耕種和利用土地的，而使之採用協同經濟的辦法。這可以說是往昔純粹馬克共同體內耕地共有的遺制，雖在耕

地私有權已被設定，但這種耕地私有權還不是近代意味的絕對的私有權，而是一種過渡的存在形態。即是說，在土地共有或總有制崩壞以後，共有或總有的精神，還在長久地支配着私有地的使用原則。

第三章 莊園制度

一

日耳曼族社會分化過程的完成，就是法蘭克國家的建設。可是它到底建設在那樣的經濟基礎上呢？法蘭克王國的鼻祖克羅特溫（Chlodwig）（四八一年——五一一年）趁着民族遷移的混亂中，侵略高盧地方，又平定西日曼諸族，建設了統一的國家。對於建設過程中有功績的貴族和臣屬，就把高盧地方的土地，當作封地賞賜給他們。這些貴族和功臣，就變成領主的大土地所有者了。自從克羅特溫死後，王權衰退，領主的權力增大起來。自由民的土地所有者漸次沒落，他們的所有地，遂給大土地所有者的領主所併吞。以後到了馬忒爾（Karl Martel）宰相時代，爲了造成一種兵力，來對抗那從阿拉伯遠征過來的薩克森軍，就利用日耳曼族的舊習，制定了一個政治

的經濟的制度，就是 *Beneficium* 和 *Vassalliāt* 等二個舊習。所謂 *Beneficium* 是在一定條件下貸給土地，所謂 *Vassalliāt* 是自由農民在需要保護的時候，就受領主的保護，對於這種保護，互相約定，在戰爭時候，當向領主納忠盡臣下之職。根據這種制度，馬忒爾就重定一種制度，把一部分的王家所有地作爲封土，貸給某人，這個人便平常練習兵馬，一朝有事，便當盡忠王家，充實王家的兵力。等到查理曼大帝死了以後，*Beneficium* 便變成世襲，稱爲 *Fief*，從 *Fief* 這個字，就發展成 *Feudalismus*（封建制度）這個文字。

封建制度是以 *Beneficium* 和 *Vassalliāt* 做基礎的，這種制度，雖然是馬忒爾替王室計劃的，但是後來給一般領主所採用了。這樣就可能根據封建制度來獲得兵力的供給了。過去，一般人都負有兵役義務，隨着封建制度的確立，就產生軍事專門家屬，發展而產生騎士團。這樣，專門從事軍事的階層，就和農民被嚴密地區別開來。

封建制度下面，王，諸侯，臣下的關係，是有階層的，這種關係上的經濟性質，是土地所有，這在七述各節，已經闡明了的。在領主騎士的支配層之外，還有僧侶。對於武人的領主和騎士，僧侶也形成

一個支配層。他們是從古人承積而蓄積着社會經驗的保持者。古人的經驗，當作祭神的、祖先的戒律啓示，用宗教形式傳佈着，僧侶把它當作神的言語，指示給人們。僧侶還是職業上最必要的天文、歷數等知識的所有者。他們不僅是宗教家，而且是科學家、立法者、醫師、教師。能夠保持這樣地位的僧侶，算在支配層裏是當然的事。恩格思說：「中世紀完全從原始的自然狀態裏脫出來了。把古代文明，古來的哲學、政治學、法學，一掃而空之，一切方面都需得從頭改造起。中世紀從滅亡了的舊世界所承繼的唯一的、事物，是基督教和多數已經捨棄了文明傾毀的都市。結果，像在一切原始發展階段上一樣，僧侶階級變成智識文化的獨占者，因而，文化本身，根原地就帶着神學的特質。在僧侶掌中，什麼政治學、法學，和旁的一切學問，都作為神學的簡單的一個部門，而保留着，也就依照神學所通行的原則，來處理這些學問。教會的教理，同時便是政治上的公理；聖書的文句，在任何裁判所都具有法律的力量」(德國農民戰爭(Der deutsche Bauern Krieg)。所以，僧侶階級及其機關——教會，不僅在信仰上，而且作為社會的物質的力量，占着統治階級的一半。

這種關係，到了繼墨羅溫王朝而統治法蘭克王國的喀羅林(Karolinger)王朝，便發展完成

了。喀羅林王朝的查理曼大帝時代，日耳曼諸族的統一，幾告完成，其領土跨及中歐西歐，根據凡爾登條約（八四三年）領土被分成三部分；短時間雖因東法蘭克國王腓特烈（Karl der Kieck）而使東西兩法蘭克王國合併，可是跟着八八七年腓特烈的被廢，東西兩法蘭克王國便又告分離，以後再不會合併；這就是德法兩國。從喀羅林王朝的查理曼大帝起，即從八世紀起，所謂封建制度便確立起來。

墨羅溫王朝時代，土地所有關係已經有一種封建的傾向，但是尙未進展到純粹的形態。國王、貴族、豪族、教會的大土地所有，介在舊的羅馬大地主制之間，其間還存在着自由農民的所有地。而各種土地所有，都在國王支配權之下。譬如在墨羅溫王朝，臣下因功由國王賜以土地，只不過取得土地利用權，支配權（特別是政治支配權）是並不和土地一同賜給他的。當時，王權還占支配的性質。第八世紀以後的大土地所有，它的性質超過過去簡單的大土地所有，即是說，大土地所有化爲莊園。所謂莊園，是德文 Grundherchaft 的翻譯，莊園的所有者稱做領主 Grundherr。莊園不僅是大土地所有的意味。它的着重點是在於土地支配。即不僅是大土地所有，而是所有者具有

所有的領域內政治權力的。這種土地所有者，作為其所有領內唯一的權力者，對領民有行政權和裁判權。莊園轉化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團體。過去的土地所有和莊園間的差別，便在於此。

大土地所有的發展，是隨着封建的政治機構之進展，共同進行的。上面說過，封建的關係是從 *Beneficium* 和 *Vasallität* 二個關係成立的。即是封地 (*Lehn*) 和臣屬關係。封地關係，是指國王把一定土地封給貴族，貴族封給他的臣屬。下層的臣屬，對於上層的主人，就結成臣屬關係，規定了幾多階級的君臣主從關係。爲了使這種封地關係得以成立，必要廣大的土地。本來，人口增加的結果，就要求廣大土地，而荒地的開墾就來供給土地。不過在祇有狹少土地和少量勞動力的自由農民，不能良好進行開墾。祇有過去的大土地所有者，才有從事開墾的可能。開墾首先從建設分村着手進行。在本村的共有地上，設立新開的定住地，或是遣送一團新家族到鄰村的共有地上，使之開墾。分村的建設，多進行於六世紀到八世紀之間。還有非馬克的成員，得了國王的特准狀，來開墾某一馬克共同體的共有地的。在這些開墾中，馬克共同體的成員，也有獲得少數餘裕的，但就大勢說來，墾荒祇不過加強了大土地所有的傾向而已。

加之，自由農民爲了有組織的馬克共同體內社會的分化，增加納貢負擔，漸次有走上沒落的傾向，這成爲大土地所有的促進力。不僅如此，而且隨着宗教團體的勢力的增加，宗教的大土地所有，也成立了。特別是羅馬所推廣的基督教，隨着他的社會功能的增大，教會僧院的土地所有就愈益增加了。在八一二二年，奧格斯堡（Augsburg）的僧正，有一五七穆根（Morgen）的土地，薩爾斯堡（Salzburg）的僧正竟有一六〇〇穆根。德台爾吉（Taranaise）的僧院有一一八六六穆根，巴威的本篤僧院，在設立時有土地七六〇〇穆根，佛爾達（Fulda）的萊尼非斯（Bonifatius）僧院，設立後不久，就有土地二五、〇〇〇法夫愛（Hufe）聖加倫（St. Gallen）僧院僅有土地四、〇〇〇穆根，要算是頂貧弱的了。這都是土地捐贈給教會，僧院的結果。

僧院教會領地的激增，決不是俗界支配者所願意的。查理曼大帝對於教會僧院之極端的土地領有政策，企圖加以制限；八一一年在亞亨教會裏，對於僧正和僧院長，發出這樣譏諷的質問：「預約着天國的報答，而用了地獄的威嚇來奪取合法承繼人的遺產，結果，他們爲了窮困就不得不竊盜。只想用類乎此的所有的手段，來增加自己的所有的人，難道就可以稱爲捨世人嗎？」至於

像魯德維敬神王(Ludwiny der Fromme)對於僧侶的這種彈劾，還不能滿足，就完全禁止教會廢除承繼人之舉，在已實行此等舉動的場合，且命令對於領有土地，對於合法承繼人，當加賠償。此外，宗會(Konzilien)也訓令僧侶，當廢除勸募捐贈土地的習慣。可是，教會僧院領地的激增，決不是這種禁令所能阻止的。教會僧院領地的增加，對於世俗支配者即王候的權力，決不是可喜悅的事。所以，對於這種土地所有的增加，除用極端政策來對付之外，再沒有旁的辦法了。就是用沒收教會領地(Säkularisation)的方法。沒收教會領地到底執行到如何程度，我們還不十分明白。一說墨羅溫王朝的沒收寺領，不過是突發的現象；另一說以為是六世紀以來一向就繼續着的。其實，沒收寺領的行動，最初是突發的，常常採取教會領地捐贈給國王的形式。馬忒爾丕平(Pippin)，查理曼大帝，羅德維敬神王等，繼續實行沒收教會領地。在十世紀，作為取得大領地的方法，而盛行沒收教會領地。到了最後時期，因為近世初期王權的發展，和近代國家形成時代的革命期的沒收教會領地，教會僧院終於失去其獨立之經濟基礎——土地所有了。

大土地所有因爲和政治權力相結合，而成爲封建的大土地所有。這就是莊園。莊園的中心是莊園廳（*Fronhof*, *Herrenhof*, *mansus*, *Curtis indominicata*, *Curtis sala*, *Salhus*, *Salhus*）直屬莊園廳的是直轄地（*Terra dominica*, *dominicalis*, *indominicata*, *terra salica*）。此外，莊園裏有租地或借地（*Zinsland*, *Leiheland*）。直轄地或直接經營地，是領主自己經營農業的地盤。不過有的領主只有極少的直轄地（*Salland*），有的竟完全沒有。這種莊園完全由那負有支付地租義務的農地形式的，所以結果，莊園廳多有變做農民納貢徵收所的樣子。不過，這種莊園決不是一般的。

莊園廳通常是領主住的，以它做中心，有那莊園的役從，婢僕的住所，家畜的小屋，穀物倉庫，手工工場等；周圍有農園，更有森林之類。莊園廳所在地的 *Fronhof*，祇不過形成了莊園的一部分，它的領地圍繞着莊園廳，有的集合在一團，有的和莊園廳分離而散在各處。普通認爲莊園形式

是廣大而連續的土地（據斯特納格），但是所領地散在各處的所謂散在的所有，也很多的（據倫普拉喜特 Karl Lamprecht）這是和封銷莊園說相對抗的散在莊園說。此外，有可以看做是兩者併存，而同時又廣涉——二平方哩甚或五——六平方哩的嚴密的封銷莊園存在，不過這可以說是例外的。

屬於莊園廳的土地，可以區別爲佃租地（Zinsland）和賦役地（Dienstland）。佃租地是農民繳納一定的地租，作爲土地使用的代價；賦役地除繳納地租之外，尚有每週三日以內的賦役義務。地租通常是現物的。通用的如穀類、豚、雞、卵、羊毛、手工製品，尤其是麻繩等。賦役地農民的賦役，是耕種、收穫、收剪羊毛、伐木、牧場服役、運送穀物等。農奴有守衛勤務、造屋、佃租地上的築籬、設備防禦、幫助建築住宅等等的義務。這些賦役，對於莊園廳的事務，提供了重要的勞作。莊園廳雖然也有奴婢，從事農業和手工業的勞役；可是賦役勞動對於這些事業的貢獻，是非常巨大的。

領主對於他們支配下的人民，更要求種種的負擔。領主向農奴課徵人頭稅；農奴不僅負擔國稅，教會十日稅，而且被要求臨時的攤派。即要求農奴在婚禮，死亡時的納貢，當領主及其隨從旅行

時候，當供應食宿等。十世紀以後，領主強制其支配下的農民，使用領主所有的水車，而禁止使用農民自己所有或他人的水車。這就叫做領主的水車場權（Mühlenbau）使用水車場須繳納一定量的穀物，嚴格規定應當使用水車場的農民。這大概規定在載運穀物的一匹驢馬，一天裏能夠往返於水場的範圍。當違反了水車場的使用，即在違反禁制的場合，不僅要徵收贖罪金，甚至把別處製成粉的穀物和所使用的驢馬，都全部沒收了。和水車場權同時成立或發展起來的領主或王權裏，還有烘麵包灶權，釀酒場權，葡萄壓榨器權，葡萄零賣權。後來甚至有度船權，道路通行稅，橋稅以及領主的特殊課金（譬如利用領主所有的山林，支付賦課金。）要而言之，這許多種負擔，統統把重壓加在農民經濟上，而達到莫大的數量。

三

莊園的經營形態，隨着對於莊園形態的觀察如何，而有不同。像上面說到過的斯特納格把莊園看做是廣大的耕地之統一集積。因而他主張莊園是使土地上充滿着民族的活動；又對一切活

動力，能夠適應其特性，給予最好的可以活動的地位；而莊園之組織計劃的統一性，保證着它，使各種能力都能充分地利用盡淨。這就是主張莊園存在合目的的分業，和統一的經營。可是像倫普拉喜特（Karl Lamprecht），就相反地認為莊園不是一個統一的經營體，所謂散在的土地所有，不能有統一的組織。根據這種見解，莊園對於以前的農業經營，不能認為是完成了重大的進步的，祇可認為是當時實行的小經營農業的集積。和後一見解相照應的，可以說是當時一般的狀態。

關於這點，從農具或農作物的種類，也可以推斷出的。在克羅特溫王的時代，和喀羅林王朝的時代之間，沒有何等新農具的製造或改良，也沒有新種農作物出現。就各種麥子說，譬如像黑麥，最初出現在八世紀的文獻裏，可是這總不能認為以前並沒有存在過罷。像塔西它已經述及各種麥子，即就以後文獻或法令中所揭載的諸種農作物看來，到現在還未進展到研究它的發展，在當時的經濟意義。只有寺院附屬農場所栽培的葡萄，十一世紀出現於萊因高地和沙拉的河谷，一直發展到多羅腦河畔和萊因，是在十三世紀左近；可是，六世紀在萊因中部流域。七世紀在波登（Bos-den）湖法爾茲地方，就已出現，這恐怕是羅馬殖民者所輸入的罷。

關於耕種方法，看不到充分新的方法，已被採用。因為六七五年和七七一年才說到的三圃農法(Dreefeldwirtschaft) 既在馬克共同體極盛時代，就已實行，另一方面，查理曼大帝的莊園法(Capitularia de Villis) 關於三圃農法不曾十分注意，看來，這早已不是一般實行的耕種方法了。縱使實行三圃農法，一方面也不得不認識，還通行着原始的穀草農法(Foldegraswirtschaft)。又如火耕(Brenn-Wirtschaft) 也長久地通行於森林地帶。因而，莊園就在開墾一個荒地時候，它的經營法也不是極進步的。普通村落的莊園地之耕種，通行一種有規則的耕地制度，和根據栽培物以劃分村落耕地的制度；不論領主的土地或農奴的耕地，也都和自由農民的耕地相混處，實行強制耕種(Flurzwang) 所以這許多種的耕地，它的耕種方法，決沒什麼差異存在的。

第四章 中世紀初期的手工業及商業

一

中世初期的莊園，是自給自足的，莊園所生產的，不僅用來滿足農民的需要，而且也滿足了領主的需要。這種自給自足之所以可能，在於領主和農民的要求，都是單純素朴的。像領主的府邸，也是極簡單素質的，上等的府邸，主要是木造的，至於石頭建築，要算極稀有的了。用當時所稀有的石頭建築的，只是修道院或僧院，石頭建築是這樣少有的。二層的住宅是很少的。因此火水風災，對於住宅的可怕的損害為人們所記憶。家具也是粗陋的。普通所使用的椅子，沒有靠手，也沒有靠背，祇不過是四隻腳上釘着一塊木板的東西。因為生活是這樣單純素朴，所以能夠維持着自給自足的状态。

租地的納貢是現物的，主要是用的穀類，此外還繳收莊園的必需品。必要的衣服、家具及其他必需品，用地租上的納貢品來滿足的。有時亞麻布被指定為納貢的一種。織物是用農民的手來織成的，一部分原料是農家自己生產，一部份由領主供給。此外，領主命定獻納手工品，當作貢品。有的時候，鐵被選做這種貢品，也有的時候，要求那木耙、鉤、犁、鐵鏟、手斧。至於莊園的賦役，不僅限於農耕；譬如建築住宅、穀倉、水車小屋、釀造麥酒、壓榨麥酒、製造和修補衣服、鞋靴、家具等，也都徵調賦役的。所以，領主能夠獲得必要的手工業勞動及其產品。

據說，莊園也扶養著許多不自由的手工業者。查理曼大帝的莊園法裏，關於王領地的職業部門，舉出鐵匠、銀匠、靴匠、旋盤工、木工、造橋工、製鹹人、烘麵包工、釀酒工、漁人、獵人等；可是事實並不像這個規定裏所舉出的，縱使在王領地，有的幾乎沒有手工業者的，像修道院裏也有這種情形。在聖加倫修道院的八二〇年的建築設計圖裏，雖然豫定著金銀匠、鐵匠、織工、革匠、旋盤工、製粉匠、烘麵包工、釀製麥酒人等的住室，可是因為這個設計圖並不會實行，所以不能成為這幾種手工業者已經存在的證據。在別的修道院的記錄上，關於手工業部門，是用宗教的莊園裏的賦役形態；部門也

就不很多。譬如八世紀巴威的各修道院裏，除了廚師，獵人，漁人，牧人之外，不過只少鐵匠，製造軍器匠，旋盤工罷了。所以修道院裏當需要手工業者的當兒，就不得不從他處雇傭。

雖然事情是這樣，可是莊園裏事實上實行各種手工業。不過，這些手工業，是一切人實行的，或是多數人協同進行的，還是職業的手工業者來執行的，這倒還不明瞭。譬如在斯塔夫爾湖 (Staffel-) 修道院裏，據說有二十四個女子從事縫紉衣服。各種衣服的形式，只不過四五種，由此推想起來，可以知道製作衣服，限定在一年裏某一時期的。在凡爾登的修道院裏，一部分的農奴，即烘製麵包工二人，廚師二人，釀造麥酒工三人等，隔日以賦役勞動形式來做工，另一部分爲了運輸葡萄，木匠等的事務，每隔三日或四日，就以賦役勞動，來從事這些。從這種狀態看來，莊園裏不自由的手工業者，從事勞動，只好說是非常例外的。莊園裏，凡必需手工業的工作時候，祇在支配下的農民裏，求取最熟練的諸人的勞動，或使他們提供手工業生產物而已。我們倒不如說這種思考法，較爲妥當。可是，手工業的發展，首先是從教會僧院開始的。這是因爲他們是當時智識的泉源；同時因爲，他們爲了使宗教的表徵具現着神祕性起見，就一定需要宗教用具的美術化。僧院裏的必需品，製

造和修理，都是僧侶自己。而宗教用器的製造，就成了手工業技術的發展。如像供器，十字架，聖餐盃，有枝燈架，燻香器，遺物匣的製造和修理，特別來得通行；教會僧院也設計金屬的戶扉，圓柱，柱架，甚至也製造玻璃器具。也通行製造書本，製造年皮紙，鑄鐘，嵌木細工等；這樣，在教會僧院保護之下，美術工藝發展起來，呈現中世工藝的最大美觀。這些工藝品幾乎都是僧侶製造的。僧侶同時是畫工，是金匠，是象牙雕刻家又是美術的織匠。特別是製造玻璃，是當作當時手工美術的粹來處理的。新興工藝。爲了這種手工工藝，教會僧院慢慢地設置工場，大有自設的工藝學校的樣子。這個時代，更進步的，是教會僧院的石頭建築。在意大利北部，法國，再遲一點在德國，石頭建築術完全是僧侶所特有的技術，直到十二世紀，還掌握在他們手裏，從有技術的建築，發展成爲世俗的建築了。

比這種教會僧院的手工業更要原始的，是鐵工。鐵工這種職業，是以販賣爲生產目的的最早的手工業者。鍛冶工的工作，是採掘貴金屬或低級金屬，加工作成各種用品。他或是助幫木匠，建築住宅，或是製造各種器具和船舶。鍛冶工也從事木材加工，也做玻璃工人。在當時，一個手工業者是從事各種手工業的。德文裏 Schmied 這個字，不僅有金屬加工工人的意思，也有手工業者，製造

者，熟練手工業者等一般的意思；隨着時間的經過，產生出各種專門從事各特殊部門的手工業者，Schmied 這個字，就和別的文字複合起來，表現出它的特殊的意義。譬如像石匠(Steinschmied)，毛織匠(Tuchschmied) 等就是。

鐵工之所以成爲最古的手工業，這是因爲已經進入鐵器時代以後，因爲鐵製的農業用具，堅固便利，鐵鑄武器犀利鋒快的緣故。特別是到了中世紀，發生了軍事專門家的武士層。鍛冶工的工作更多了。武器之中，尤其要算劍，兜，甲冑，楯等，助成了鍛冶工的發達。兜和甲冑等，是高等武士的使物，普通是不能用的。楯起初使用的是木製的，逐漸改爲金屬製造的了。因此，劍的製造，就必然地非發展起來不可。最初使用蹄鐵是在十一世紀左右，跟着武士的騎馬，它的製造也發展起來了。

這些手工業者，雖在中世初期也曾存在，不過那時他們還不是定住的。他們的大部分，是巡行手工業者，從這裏跑到那裏，跟着工作而遍歷各國。所以當建築教會那樣大工程的時候，就要從各處招集石匠，木匠，金屬匠。當建築斯拜雅 (Speyer) 阿亨 (Aachen) 的大伽藍時候，各地方的手工業者都走集攏來，其中，甚至有從英國來的師父。可是，中世初期的手工業的發展，還可說是非常

輕微的。

二

用商業形式來實行交換，到底起於何時，這是說不明白的了。根據考古學看來，因為在各個種族的遺跡裏，發掘出一定形式的器皿，所以推定這些種族之間，有交換存在；不過這種推定是危險的。因為一定物品的移動地點，並不以交換現象為必要。用掠奪，贈予這種形式，也可能使物品移動的。

在中世紀初期，一般可以說還不知道交換。根據倫普拉喜特的意見除了少數修道院之外，就是在十一世紀，實行買賣的，還只在臨時發生緩急的場合；通常只是把物件贈送給人，而被贈送的也把自己的所有贈送給他，就這樣意義的實行買賣。根據八世紀到十世紀的史料。國王、法王、僧正、修道院長等，互相實行贈予和受贈，這是明白的事，即是說贈予和回贈，在實行交換的機能；因之，可以說交換現象是非正常的。此外又盛行掠奪。北海海上活躍的壯士們，是商人還是強盜，要區別出

來是非常困難的。他們一面實行和平的商品交換，同時又實行掠奪。掠奪不限於海上，陸上也通行的。戰爭和掠奪相伴隨着，非常頻繁，所謂戰爭的利益，就是意味着掠奪的利益。可是當用暴力行爲來取得物品，不能圓滑進行的時候，商業行爲就出現，商人也出現了。商人的行爲，即物品之和平的交換，也是用商人的詐欺策略的場合要來得多。因而商人被視爲等於騙子，被認爲把價值低廉的商品，不正當地高價販賣出去。德語「交換」(Tauschen)和「欺騙」(Täuschen)，有同樣的意味，就是表示着這件事情。

這些現象，是意味着交換現象還在非常初發狀態中。在用餽贈、掠奪的形態，來實行物品的移動的時代裏，是處於不能自由取得所需要的物品的狀態中；所以，爲要消除這種狀態，就必要進入正常的交換狀態。這些餽贈和掠奪，可以認爲是交換現象的先驅。

在中歐和西歐，交換現象雖然還處於這樣未發展的狀態，可是在那些歷史的前進國家——地中海沿岸各國裏，交換現象已經進展到正常的商業，而且這些先進國的商人，爲了從事商業而侵入到當時經濟生活尙未進步的中西歐地帶來。因爲是這樣情形，所以各地商業，可以看做是作

爲外國貿易，而發展起來的。和這種狀態相適應，商業的形態首先是行商，行商和上述巡迴手工業者，是同行地進行商業的。

羅馬商人的行商，從日耳曼時代起，就已通行。羅馬商人對日耳曼人，給以一般野蠻人所嗜好的甘味，麻醉的葡萄酒，有光澤的金屬；他的代價是獲得了能在羅馬高價出賣的琥珀，毛皮，真珠，五彩鳥毛，孔雀草等奢侈品。塔西它時代的羅馬人和日耳曼人的邊境交易，此後也並不曾終結，而在多腦河畔實行奴隸買賣。祇就從南德，瑞士到羅馬的商品買賣而論，沒有曾經越過阿爾卑斯以外的直接證據。關於由海上來和德國國內相交易的資料，也還沒有。在德國國內，即在日耳曼諸族之間，沒有獨立商人來從事商業，可說是實行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直接交換的。

外國貿易上有重要性的是東洋貿易。東洋貿易中心地是君士坦丁堡 (Konstantinopol) 從這裏有到基輔 (Kiew) 再到諾弗哥羅特 (Nowgorod) 的道路，從君士坦丁堡有到馬賽 (Marseille) 的進入現在法國的道路；從這裏東洋的商品甚至被輸送到意大利，再有順萊因河而下，達弗蘭德 (Flander) 在萊因地帶，喀羅林王朝時代，已經實行商品買賣了。從十世紀到十一

世紀，萊因河畔諸都市，次第發展，當舉行復活節的科論（Köln）的歲市，不僅萊因地帶諸都市的商人，甚至各國商人也都老遠跑來的。像美因斯（Mainz）那樣城市，從這時代開始，也發展成商業都市，許多東洋的貨物，在這裏相交換。此外如斯拜雅（Speyer）、瓦爾姆斯（Worms）等城市，都以商業都市著名的。多腦河畔的都市，著名的有帕騷（Passau）。十世紀到十一世紀之間，交換範圍從萊因地帶一直擴大到易北河畔為止，再上去是及不到了。新市場都建設起來了，當建設時候，美因斯科倫、馬德堡（Magdeburg）、哥拉爾（Goslar）的市場，都當做模範來採用的。

這個時代商業上出現的商品，並非是日用必需品。倒是珍奇的天產品，昂貴的手工業品等奢侈品罷了。絹織品，絨氈，寶石，玻璃盃，金銀製品等，是用來做教會的裝飾用品的；葡萄酒，燻香，蜜蜡，油等，也是教會日用所不可缺的。東洋的香料，昂貴的絹，琥珀，武器，毛皮，葡萄酒等，是宗教界和貴族所要求的奢侈品。奴隸和食鹽同樣是交換的，金屬，簡單的金製品，粗製毛織物，馬鞍，桶子及器皿等商品，雖然也是交易品，可是它的意義還不大。

這種商品買賣，並不需要大的商店鋪。因為中世初期的商業還是行商，所以不需要這些的。同

時，也沒有恆常的市場設置的必要。祇要指定了商品交換的一定地點和時間，就足夠了。可是，當商品交換時候，和平的保障倒是絕對必要的。因為有這個必要，所以就選定有宗教意義的地點，作為交換商品的地點。因為這還可以利用教會僧院的參拜集會的日子。德文中含有「市」的意思的「Messe」一字，也可以作神事的意思解，也可以作歲市的意思解；從這上面也可以推想得出的。被人稱呼為市場教會或商人教會的教會，完全是用於這個目的。市場有的開設在教會的前面，也有的在教會裏面舉行的。

設立市場的特許執照，是頒發給教會和僧院的。德國在十二世紀前所發給的特許執照，有九成是有宗教關係的。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空斯坦茲（Konstanz），哥倫亞，努連堡（Nürnberg），布拉哈（Praha）等重要的商業都市，不必說都是作為宗教都市而有名的地方。這種宗教都市，為了多數人集合的必要，以交通便利為設定時候的第一標準；因而既有可能性發展成商業都市，而且也正在發起來了。

交易是決定地點和時間來舉行的。在市場開市的當兒，市場以外不准私行交易，或夜間交易

的。開市通常定在星期日。星期日雖然教會規定是安息日，可是開市通常卻規定這天做定期的市日。除商到着以後，規定數天日子。市場由國王和僧正加以保護，交易非在這些代表者面前舉行的。市場裏有特定的貨幣。各市場鑄造市場上所流通的貨幣。這種製造完全經過手工業者的貨幣鑄造匠的手。貨幣在這種市場上流通，市場稅也用它來徵收的。因為有這種必要，所以就產生兌換商了。在設立市場的特許執照裏，市場稅的徵收和貨幣鑄造權都被記載着。貨幣鑄造權最初是國家的獨占權，後來慢慢轉移到封建諸侯手裏去了。

商品賣買全部是現金交易。信用制度還不會發達，那怕在提供某種物品來代替現金的場合，也講定幾天後換成現金；可是這已經是信用的萌芽了。不過中世初期，信用並沒有發達。

第五章 中世紀都市及其手工工業和商業

一

從日耳曼的原始時代，經過中世紀初期，基本的社會是農村社會。雖然在羅馬人的殖民地裏有幾個羅馬的都市，而且還正殘存着；可是基本社會的一般基礎，是在村落，這裏形成莊園的支配。這裏有領主，騎士的武力的支配和僧院的支配。可是，從這種社會構成之中，那克服中世之本質——村落構成，而終於奪取其支配權的都市，發生起來了。都市對於中世紀村落的基本社會，是否定的要素。

在現代，村落和都市是對立的，但在中世紀，並不對立。不過，這祇是程度的差別而已，並沒有對立之本質的差別。現代的都市是非農村的，但中世紀的都市，大多數是半農村的。所以，大多數的中

世都市，是松巴德 (Sombart) 所說那樣的半都市 (Halbstrat)。那末，都市是什麼呢？松巴德說，凡問他人農業勞動的生產物，求得自己生活資料的人們，彼等較大的集團的定住，謂之都市。惠勃 (Max Weber) 以爲都市是商工業的所在地，必需外部不斷的食品的供給。在這種意味上，現代的都市幾乎全部都是在這個範疇以內的。可是，中世紀的都市，大多數還是農村的，甚至在圍繞着都市的城廓裏面，也進行農業。農產物便供給市民的生活。在這樣情形上，松巴德所說的「半都市」的概念，指當時多數的都市，是適當的。

中世都市不像現代都市一樣，大都市並非就是世界都市。就人口而論，被稱爲中世大都市的，也沒有五萬到十萬人存在，甚至連頂著名的商業都市，沒有有人千到一萬以上人口的；有人口二萬的都市，不過特殊的例外場合而已。大多數的都市，人口在五千以下。而都市在當時之所以具有重要性，因爲都市的大多數工商業，和輸出貿易上的生產物並無關係，它們的貨物，主要是以那種把都市當做中心的地方，爲供給的領域。因而都市雖人口稀少，卻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所以，中世都市和現代比較起來，人口上有非常巨大的差異，不能夠用現代的觀念來判斷它的。有人口八千

到一萬的都市，現在要算是孤城小邑了。而在當時，不失為大都市，譬如像中世紀的巴塞爾 (Basel)，法蘭克福 (Frankfurt am Main) 那樣，不能夠用人口八千——一萬的現代都市的觀念，來理解它的。

不錯的，推算中世都市的人口，是件困難的工作，不過，可以用種種初步資料，來推算到的。當時曾經舉行人口調查的，譬如像努連堡，斯特拉斯堡，夫賴堡 (Freibury)，諾爾特林根 (Nördlingen) 等。還有利用那包括全部都市居民的徵稅帳簿的，如像德勒斯登 (Dresden)，沮利克 (Zürich)，但澤 (Danzig) 等；再有那目的在課稅，而記錄了一部分居民的，像法蘭克福，巴塞爾，羅司託克 (Rostock) 等都是。其中，關於光是記出家族的，由於推定家族中所有人數的不同，雖會發生人口的差異，可是，根據這些資料，能夠推定到的。下面是揭載着中世都市人口的大體數：

有人口約二〇、〇〇〇的都市：

努連堡 一四三八年一二、八〇〇人，一四四九年二〇、二〇〇人。

斯特拉斯堡 一四七三年——一四七七年二〇、七二二人。

烏爾穆 (Ulm), 一四二七年和一四八九年約二〇,〇〇〇人。

律伯克 (Lübeck) 十五世紀時有二〇,〇〇〇——二五,〇〇〇人。

奧格斯堡 (Augsbury) 一四七五年一八,〇〇〇人。

但澤 一四〇一——四三〇年代約二〇,〇〇〇人。

布藍士外克 (Braunschweig) 一四〇三年左右,有一六,二〇〇——一八,四〇〇

人。

科倫約 二〇,〇〇〇人。

有人口二〇,〇〇〇——二二,〇〇〇的都市

法蘭克福 十四世紀——十五世紀,有七,〇〇〇——一〇,〇〇〇人。

羅司託克 一〇,〇〇〇——一二,〇〇〇人。

沮利克 一〇,〇〇〇——一二,〇〇〇人。

伊泊倫 (Ypern) 九,〇〇〇——一〇,〇〇〇人。

萊姆斯(Rims) 一〇、五〇〇人。

巴塞爾七、〇〇〇——一二、〇〇〇人。

特里爾(Trier) 八、〇〇〇——九、〇〇〇人。

睦爾豪燴(Mühlhausen in Thüringen) 七、四〇〇——九、四〇〇人。

有人口五、〇〇〇的都市。

夫賴堡

拉汾斯堡(Ravensburg)

海得爾堡(Heidelberg)

雨巴林根(Überlingen)

美因斯(Mainz)

諾得林英(Nördlingen)

德勒斯登僅有人口二、五〇〇到四、〇〇〇。邁生(Meissen) 和布拉哈(Prah) 也都

不過是人口二、〇〇〇的都會罷了。

這樣看來，中世都市的人口，比向來所想像的要少得多。而且從十四世紀到十五世紀，人口是減少的。可是，人口向都市的流入，因為個人的自由和利益的誘惑，是相當大的。當時生產率又非常的高，那末人口減少倒底爲了什麼原因呢？第一因為嬰兒死亡率非常的高；第二因為疫病把死亡率提得很高。這都是由於醫學的不進步。中世紀的教會，是禁止死體解剖的（這是形成醫學基礎的）；因而不能得出人體的正確智識。整個中世紀這個禁止令都被維持着，惟有在法國，到一三九六年，每年准許解剖死刑犯的屍體一次；荷蘭到了一五五五年，纔得到同樣的准許。

中世紀疫病極形猖獗。據皮希亞（Bicher）說，德國自一三二六年到一四〇〇年，疫病蔓延三十二次，一四〇〇年到一四五〇年，蔓延了四十次。又據斯特納格說，自從一三四八年到一三五〇年黑死病流行以後，直到十四世紀，黑死病流行了十四次。因為這種流行病的緣故，使都市喪了人口一成，甚至喪失了一成二分到二成五分。所以，連大都市裏人口也減少了；不過這種減少，很快的就被已經達到人口增加界限的小都市的人口，向大都市的移動，所補充了。

都市容納人口的程度之低，是都市生產技術狀態的反映。都市雖然是工商業的中心，可是工業生產的技術是非常低的。它是在中世紀的停滯狀態中。手工業同業公會（Zunft）對於生產技術的改革，任何場合都是反對的；生產以一定的方式進行，而其方式則固執不變。一定的生產樣式，生產物的原料，生產物的形態，勞動時間，徒弟人數等，都由根據公會規則嚴密地規定着，不許變更。而且，公會還盡力阻止從手工業生產方法推移到機器的生產方法。於是，中世紀的手工業生產，既不得不停滯，而商業又為手工業的生產量所限制。由手工業生產的利益所能維持的人口，也不得不在于停滯的狀態中了。

加之，都市裏有許多慢性的不能生產者，第一是病人。中世紀裏，癩病到處逞威，都市裏因之設立癩病療養所，其目的在把患者和一般人相隔離，可是患者人數是非常之多的。第二是為刑罰而身體某部分殘廢了。第三是不斷的戰爭之受傷者，而都市不得不用財政來維持他們。這些負擔是

阻止都市發展的巨大要素。

從都市人口的社會階級構成，或從貧富懸隔狀態看來，中世都市決對說不上健康的狀態。這比從來所說的有更大的貧富的懸隔。在巴塞爾，沮立克，夫賴堡，科倫，法蘭克福，拉汾斯堡（Ravensburg），厄斯林根（Esslingen），德勒斯登，睦爾豪，贈諸城，市民中五分之一或五分之二，是赤貧無財產的，在奧古斯堡，全市民的三分之二，是在無產狀態；在伊泊倫城，十分之一的市民，賴公共慈善來支持生活。薩克森的夫賴堡，全市總財產的一半，握在佔全體市民百分之二的市民手中；全體市民中百分之二八，是完全無產者。在海得爾坡（Heidelberg）中產階級的總財產，還不及全體市民總財產的三分之一。在厄爾福特（Erfurt）總財產的三分之二，握在不過佔全體市民百分之七的富豪手裏。在法蘭克福根據一三五四年的統計，占納稅者百分之五·九的一四六個資產家的付稅額，占全部稅額百分之五·二；但到了一四七五年，納稅在總數百分之三，占全部稅額百分之九·四。這是表示小財產者或小額納稅者的增加。即表示出他們從一三五四年的百分之二三·六，增高到一四七五年的百分之三二·五，一四九七年的百分之四三·三。這種例子，還能舉出許多，總之可

以說，中世都市裏，貧富懸隔的程度是非常大的。在這些貧富懸隔的狀態裏，根據其所有的富的狀態，來表示出職業的區別，佔第一位的是定住商人，醫師，僧侶；次之是零售商，手工業者；最下級的是日工，獨立的女工，普通工人。那怕在手工業同業公會。貧富懸隔邊有相當程度的存在。

三

中世紀的德國都市，作為松巴德所說的半都市，是半農業的，半工商業的。都市裏占支配地位的是工商業。工業的性質是手工業的，實行以定貨生產為中心的顧客生產。這樣形態的手工業，是固有意義的手工業；手工業者除了生產上必需的勞動手段之外，僅需有少量的購買原料品的資金，主要按照顧客定貨，來製造和販賣。他們的資金是非常微少的。在手工業的生產上，並未進展到從事資本家的生產和販賣，以獲取利潤。他們所取得的生產品價格的內容，主要是相當於生產勞動上的工資；手工業者的本質，是獨立的單純生產者。

這種生產者又作為顧客生產者，直接和消費者相接觸。所以他們一方面是手工業者，同時也

做商人的工作。因而在中世都市立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作爲中間業的商人之介在餘地，非常狹小。可是，遠地之間的商業，卽當時那樣意思的外國貿易，比較發達得早；尤其自從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以來（一〇九六——一〇九九年），歐洲商人也和猶太商人在一起，終於也在商業領域上活動了。商業的舞臺，是歐洲各地所開的歲市或節市。

這種手工業和商業上的發達，由於對它行使政治的行政權，也給封建領主以利益，領主爲了利益，終於來講求都市繁榮政策了。卽是說策劃着都市裏的生活可能性和自由的增大。所以在中世紀，都市的人口集中，也達到某種程度，都市的半農村性質逐漸崩壞，而形成了作爲都市的本質。隨着都市所生產的手工業品，供給週圍的農村，農村也供給農產物於都市。農業和手工業的分化過程，便趨於完成。

封建領主的經濟基礎，自然是在農村，可是他們不能忽視都市的勃興，或者來加以抑壓。不僅不這樣，他們還採取了助長都市的利益，來增加自己的利益的政策。卽，領主在它的領內，開設週市，或從國王那裏讓受了歲市節市的特許權；更進而對於都市付給所謂都市權，作爲提供利益的報

酬。所謂都市權，是都市作為自立的經濟單位，關於市民生活上所必要不可缺的物資的供給上所有的權利。屬於都市權的有通路強制權 (Strassenzwang) 販賣強制 (Stipplzwang) 市場強制 (Markzwang) 等。所謂通路強制，是接近都市附近的一定距離的外國商人，強制它一定要到都市來；所謂販賣強制，就是這種外國商人，在一定期間，強制着他攜來的商品販賣給市民。所謂市場強制，是爲了監督外來商人的商品業所制定的制度，有權利命令彼等的商業，當在市場或倉庫所在地公然進行。更爲都市權，規定了都市之經濟的支配領域。即是這樣的強制權利：對於圍繞着都市的農村之一定領域，獨占着都市手工業生產品的販賣權，同時，當向都市供給農村的農產物。這叫做都市的封鎖權 (Bannmeilenrecht) 它的領域叫做封鎖領域 (Bannmeile)。從這種對都市的各種特權的容許中，都市的自治權發展起來了。

四

中世都市的特色是手工業的；因之中世都市的支配要素，是手工業者和它的團體。這種手工

業團體，在意大利諸都市裏，十世紀時就已經存在，到了十一世紀，早就普遍化了；可是在德國各都市，比較意國、法國，都要遲得多。到十二世紀纔開始發生，十三世紀時纔開始普遍化。德國各都市的手工業者團體，普通稱爲同行公會（Zunft）此外還有許多稱呼（Gilde, Innung, Meisterechenschaft, Bruderschaft, gewerk）。這個同行公會的團體，形成了中世都市之支配的要素。

那末，同行公會是怎樣發生起來的呢？關於這個問題，向來約有三個學說。第一個是安西霍倫的學說；他以爲中世紀都市的同行公會，是和 Collegia（它是執行後期羅馬的市場警察和工場警察的職務的）有關係的，各種制度是從它傳下來的。第二個是莊園權利說（die hofrechtliche theorie）主張這個學說的人，有尼修基爾克（Otto Gierke）霍斯拉、毛拉等人。根據這個學說的意見，以爲同行公會的起源，是莊園裏的不自由的手工業者的團體。莊園裏有作業團體存在，它們在各部門都各充主長，來統制從事該部門的人們。主長由莊園領主任命，莊園領主的隸屬者，在其支配之下。這種團體逐漸受到組合的變化，而進展成同行公會。第三個學說主要的主張者是柏羅（Uon Below）他否定第一第二兩個主張。他把同行公會（Zunft）解釋爲自由手

工業者的自由結合，他們是爲了同行公會的強制履行所聯結起來的。他反對莊園權利說。據柏羅的意見，莊園裏的不由手工業者和都市的同行公會，是完全不同的；莊園裏的賦役手工業者的存在，整個中世紀都證明是和都市的同行公會的存在，沒有關係。現在算這個同行公會獨立起源說，爲最有勢力。

同行公會從自由手工業者的自由結合而成立的，也有幾分是原始種族團體的傳統的存續；理解到這點時候，我們就能更好理解到同行公會的 formed 和它的性質。關於同行公會形成的目的，有的以爲宗教的目的；有的以爲目的在防禦都市，因而可把同行公會看做是軍事團體。像斯模拉 (Schmoller) 那樣，以爲形成同行公會的目的，在獲得自己裁判權。關於同行公會形成的目的，雖有各家不同見解；要而言之，其目的在謀共同的利益，即是說增進同行公會屬員的共通營業上的利益。這種解釋到是最能理解同行公會形成的目的。同行強制 (Zunftwang) 的事實，就表示着這個情形。所謂同行強制，就是同行公會會員，或某都市某一職業之加入公會的，關於不得不遵守的事項之規定。主要以經濟事項爲最有關係。因爲同行公會是追求共同利害的團體，所以對於宗

教社交等確也有重大的關係，有時候，且常把它的宗教的和社會的目的，提在前面；可是，所以能夠對於這種事項，採取一致的行動或考慮，全是因為在內面關係，伏着更深刻的經濟關係的緣故。

五

具有這種性質的同行公會的活動和規約的本質，是由同行公會會員的平等性及聯帶性的原則，和對於非公會會員的排他性所決定的。同行公會會員的平等主義，表現在利益的平等分配，和特權的平等享有上，譬如一個手工業同行公會的會員，關於購買原料，必要採取共同行動；而且某個會員用某種方法，購得原料的時候，假使別的會員要求，他就非以原價把原料讓賣出不可。各手工業者更規定了營業的規模。規定使用勞動力的數量，即規定職工和徒弟的人數；規定原購原料數量，設置工場及販賣所的數量，規定販賣價格。舉凡這些規則，不准加以破壞。

同行公會的對外排他性，表現在它的強制原則上。正像同行公會所舉行的宗教儀式和社交集會，只准公會會員參加一樣，能夠在他們市場上販賣商品的，限定是公會會員。同行公會的強制，

雖然祇是一個實際的制度，可是到後來產業發達，發生非公會會員從事同一產業的事情，這時候，實際的制度就帶有一種強制的排他性。對於違反公會規定，經營同一事業的，同行公會就當作侵害者或攪亂者（Pfischer, Störer）來告發了。十二世紀末期以來，馬德堡（Maßburg）維也納（Wien）睦爾豪增的同行公會，就保有這種排他的特權。同行公會的排他的特權，在強制入會（Doctrirtszwang）上表現得最爲明顯。由於實行強制加入同行公會，公會就能夠獲得獨占的地位。強制入會不僅限於都市，而且直達到上面說過的都市封鎖領域。因而都市對於四週的村落，凡屬於封鎖領域的，自然不准同行公會非會員來經營該業了。所以，地方人民，雖然感到非常不利，而同行公會就確保着排他的獨占權了。

同行公會的規定，不僅止此。同行公會爲了保護一個手工業和它的會員，佈置着禁止或限制外國輸入品的制度。在輸入禁止，或不禁止而加以限制的時候，就限定批發價格，限定在一定期間的販賣，且有種種課稅；而對會員的生產品，都不設定這種限制。這些事實，我們在薩克森的格丁根（Göttingen）睦爾豪增等都市的同行公會規約上，可以看得到的。這許多規定，是中世紀都市的

經濟政策的精神，它保護市民，阻止外來者的競爭，是同行公會獨占精神的表現。

做同行公會會員的資格，即同行公會の入會條件，使公會強制及其施行上，容易監督會員。入會條件通常分爲三個細目。第一是關於申請入會者的素性。

作爲同行公會會員的資格，要求是自由的德國人，而且是正出的。正出的德國人這個資格，需要證明到四代；有時對於他的妻的素性，也有這種要求的。因之，異國人，即外來者及其他都市出生的，和像奴隸及農奴的兒子，如不自由民，私生兒，更進而凡從事不名譽職業的，譬如理髮師，外科醫生，飼羊人，鞣皮工，水車主，亞麻布織工，吹笛手，喇叭手，更夫，掘墓人，劊子手等，都沒有入會的資格。第二是關於技術的。爲了得到老闆的地位，在一定的修業期間（七年）終了以後，更須做那普通職工，遍歷其他各都市，更要把其製品提呈給師父，製品必要試驗合格。第三是必需入會金，財產證明，宴客等。這種條件，因時而異，不過到了後來，逐漸加重負擔，這是確實的。適合到這三個條件，纔可以作爲同行公會會員。自然，同行公會入會條件，隨着公會的發展，有被變更了的；不過通常當世紀中葉同行公會成立期，入會條件是很自由的；因而公會的獨占化傾向也很少，祇以確保公會會員

的安定和自由，爲同行公會的最大目的。可是到了後來，特別同行公會衰退期的十七十八世紀，同行公會の入會條件，就發生作爲確保會員獨占地位的條件的作用了。所以同行公會の入會條件，在前期的公會發展期，和衰退期是有極大差異的；我們認爲有自由和獨占的對立。事實上，當公會發展期，同行公會是確保安定和自由的，所以成立了，作爲藝術的手工業；而衰退期的同行公會，確保手工業和商業的利潤，變做它的主要目的了。

六

中世都市是手工業的，這早已詳細說過了。手工業的都市，一方面雖然排擊中間商人，可是另一方面，就都市自身說，終於去追求商業的利潤，這也已經稍有說到了。十字軍以前，各都市間的通商，限定於東洋的珍奇的商品；十字軍遠征，更使和東洋的關係深化，同時歐洲諸國間的交涉，也更加深了。因十字軍而造成繁盛的商業活動的，是意大利諸都市；它們因爲這些交易，而能夠集積了巨大的財富。

德國各都市，從十二世紀到十四世紀，自從頂繁榮的香檳（Champaign）國際互市場開始衰退以後，就逐漸活動起來。德國各都市和意大利各都市的交通，把意大利和弗蘭德以及英國相聯結起來。這叫做萊因通商路。從意大利越過阿爾卑斯山脈，向巴塞爾，再經斯特拉斯堡，斯拜雅（Speyer），瓦姆斯（Worms），美因茲，科不楞刺（Coblenz），科倫，到達烏得勒希特（Utrecht），從烏得勒希特渡海，把貨物輸送到英國。從正當這條交通路的要衝的科倫起，甚至輸送商品到亞亨（Aachen），路得喜，布魯塞爾，梅西倫（Mecheln），根脫布呂革（Brügge）等地。除了這條交通路以外，上德意志及奧地利的商業都市，也有和意大利尤其是和威尼斯（Venedig）結合的。正當這條交通路的，有勞連堡，累根斯堡，以及波登湖（Bodensee）畔諸都市。

正當這些交通路上的德國諸都市，除了在都市以及和它的封鎖領域作經濟活動之外，由於這種海外貿易，能夠獲得巨大的利益。最顯著的是屬於漢撒同盟（Hansabund）的各都市。漢撒是什麼意思呢？語源的意義還不明瞭。所謂漢撒，是哥德語，有軍士聯合即戰士團結之意，也可以解作商品的租稅支付之意。大概初期的同盟建設者，是綜合這些意思而用的文字。至於漢撒同盟成

立的直接動機，是防止十二世紀左右商業上的危險。當時無論陸上海上，盜匪的危險非常之多。特別是北海和波羅的海（Ostsee）方面北方民族的海盜行動，常常苦惱了北德諸都市的貿易船業者。他們不得不爲了防衛海盜的侵略而結合起來。同盟的最初目的，就在於此。至於同盟的史實在一二四一年漢堡和律伯克訂立同盟以前，還不明白。至於漢撒同盟確實開始活動，是在十四世紀以後。首先締結了各都市間防衛同盟的，是以科倫爲中心的萊因河畔諸都市，其次，波羅的海沿岸諸都市形成同盟，這些同盟，就形成漢撒同盟了吧。形成漢撒同盟的諸都市，雖因時代推移而有變化，但繼續占着主要勢力的都市，是律伯克，漢堡，布勒門（Bremen）的波羅的海沿岸諸都市，此外更包含着但澤，維斯比（Wisby），里加（Riga），斯特拉爾松德（Stralsund），卓挨斯特（Soest），多特蒙德（Dortmund），科斯坡（Königsberg），挨爾賓（Elbing），羅司多克，布藍士外克（Brinswaig），夫賴堡，法蘭克福，馬德堡等德國的主要商業都市，同時，在卑爾根（Bergen），諾甫哥羅，倫敦，布魯日（Bruges）等外國都市，凡是有德國商館和居留地的都市也都加入。

漢撒同盟有力的都市，都正當交通的要衝。德國諸河川都是南北平流，可供航行之便，漢撒同

盟的主要諸都市，都位於威塞河（Weser）、易北河、奧得河、維克塞爾河（Wechsee）諸河河口和其上流。德國的各種產物，從這許多河流輸送到海岸地方，再從這裏輸送到外國；外國的生產物，用航船運到這些主要都市，再輸送到德國內地。所以易北河畔的漢堡，奧得河畔的斯德丁（Stettin）、威克塞爾河口的但澤等，都因其地理地位的有利而繁榮了；和律伯克，同為漢撒同盟的主要勢力。他如萊因河畔科倫、易北河畔的馬德堡、奧得河畔的法蘭克福，都爲了航行必要上的物資的積卸，自然能夠招來它的繁榮的了。

漢撒同盟的商人，不僅在國內活動，國外的活動也值得注目的。尤其關於英國的羊毛輸出，當全盛時代，竟能夠驅逐了初期經營者的意大利商人，而占住獨占地位。在十四世紀初期，英國羊毛輸出的百分之七六，已經落到漢撒商人手裏了。這樣他們就能夠積集着巨大的商業資本了。

德國內地商業都市，第一可以舉出位於意大利到弗蘭德地方的通商路上的諸都市——瓦姆斯，斯特拉斯堡，斯拜雅，是繁榮了。法蘭克福形成德國西部地帶的商業中心地，該地節市，非常繁榮。因德意直接貿易而繁榮的都市，有努連堡，奧格斯堡，烏爾穆，空斯坦茲，巴塞爾，維也納（Wien）。

等。尤其是努運堡的繁榮最爲熱鬧，據說歐洲任何地方，都能發現該地商人的坟墓。努運堡接近安堡 (Amberg) 茲爾次巴給 (Sulzbach) 的鐵礦山和錫礦山，曼斯斐爾德 (Mansfeld) 的銅礦山的地域。所以努運堡以金屬工業的都市著名。全市四分之一從事金屬工業，一三六三年屬於金屬業的團體，數達二十九個。

以漢撒諸都市爲中心的德國商業，一方面因爲漢撒同盟喪失掉在國外所有的各種特權，另一方面因爲新航路的發見，不得不趨於衰退了。漢撒同盟在倫敦，係有羊毛製品輸出的特權；可是從十四世紀終，英國對外貿易開始從被動的變爲自動的了。英國商人自己輸出羊毛到他的領土的卡來 (Calais) 再把毛織品輸出到安凡爾 (Anvers) 到了都鐸爾 (Tudor) 王朝時代，開始了強有力的國民經濟政策；到了十六世紀後半期，伊利莎伯 (Elizabeth) 女王時代，漢撒商人的特權終於被奪去了。在比利時，漢撒商人的權力也不得不失墜。加之，漢撒同盟裏有地方的部分的利益衝突，衰退的機運就趨於濃厚。漢撒同盟的活動，是純粹的中間商業，對方國家工商業的發展，必然要使這種種類的業務衰退的。

而且，新航路的發見，使地中海商業和歐洲大陸橫斷商業，趨於衰運。商業中心從這些地方，移到以大西洋為中心的地方去了。這樣德國的海外貿易便不得和國內貿易同趨衰退。

中世紀都市的商業，稍有附隨着手工業的樣子，不過遠地的商業，商人卻能夠蓄積巨大的財富。這些商人之間，也和手工業者之間同樣地形成了商人的同業公會。至於它的機構是大同小異；這裏也沒有詳記的必要。這種行會制度，整個中世紀都實行的，是以秩序和統制為精神的中世紀的特色。而這些組織的特色所在，就是它不僅是一個業務方面的組織，而是關於行務的人，它的整個人格表現的要求。這點正和近世個人主義的組織，有本質上的差異，這是基爾克（Otto Gierke）所早已指摘過的了。

第六章 中世紀社會的崩壞

—

關於莊園裏的農民的地位，已經紀述過了。他們在莊園領主支配之下，雖處於隸屬狀態下面，可是農民的狀態，並不怎樣惡化。莊園的納貢，雖然維持着舊時的標準；可是因為耕地生產力發展的結果，納貢反相對地減少了。領主因為戰爭及其他原因，結果財政陷入困難狀態，他們爲了多收入納貢，就對農民減免賦役；有的甚至把莊園的一部分，讓渡給他們。到了十三世紀免除了向來的隸屬關係，享受着自由的程度比較地多。莊園的經濟，是自給自足的經濟，經濟上的困窮狀態，也還沒有達到極度。可是十三世紀中葉開始浸潤進來的貨幣經濟，終於一變莊園的性質了。

自給自足的莊園，終於變成以供給都市商業爲目標的商品生產者。昔日 *Grundhereschafft*

的莊園，現在化爲 *Gutsherrschaft*，變成向國內外市場的商品供給者。莊園經濟就本質說，是以自給自足爲原則的；所以雖然也有剩餘生產物供給市場的事情，不過祇限於極例外的情形；而到現在，例外的情形變做恆常的事態了。莊園經濟的商品生產化，不外意味着莊園本質的崩壞。莊園的監督制，隨着貨幣經濟的發達，就用貢租和賦役，把土地貸予給農民。作爲商品生產者的領主，爲供給商品到市場上去，必需要更多的生產力，因之不得不採取兼併土地的政策。在如此廣大的土地所有上，他們用自己的經濟來生產商品，同時以高的貢租和賦役，把土地借貸給農民。

領主因爲變成商品生產者，更進一步的和都市相接觸，他的生活就提高了。爲了彌補這些費用，領主不得不用一切方法來榨取農民。當時所實行的苛雜的貢租，就是明白表示着這一會事。地租，人頭稅，荒地稅，牛乳稅，雜草稅，紡織稅，雞蛋稅，港灣稅，市場稅，水稅，風車稅，家畜稅，等等的租稅，都被徵收了。結果，少數剩餘的自由農民，也化爲農奴；這種傾向，到了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世紀，愈加激烈了。

這樣對於農民的榨取，大的領主，固可藉之維持生活，小領主卻救不了困窮。領主們賴借取高

利貸來維持生活的膨脹；這愈使他們陷於窮境。首先是小莊園主，尤其是騎士們的運命，陷入慘境中了。在中世盛期，他們興盛煥發，因火藥發明引起戰術變化，使他們失業，同時也趨於經濟的沒落。而地方領主由於增加農民的榨取，來把經濟的困難轉嫁給他們。

二

因為農民地位的窮困化和農民的自覺，就形成反抗運動的農民暴動而出現了。德國從十五世紀以來，爆發了多次農民暴動。農民希望做那和哈布斯堡家（Habsburg）戰爭，而獲得了自由的瑞士人。在英國，一三八一年流行着「亞當耕，夏娃織，誰是貴族」的口號，曾經燬炙人口。當一四七六年，自稱尼古拉家的牧師的倍海因（Hans Böhain）指導農民暴動，倡說去建設沒有諸侯沒有教王，也沒有支配者的新的天國；被符次堡（Wurzburg）的僧正處以火刑。接着這次地方的動搖，到了一五〇〇年，便形成了稱為草鞋同盟（Bundschuh）的農民同盟；這個同盟的形成，大大刺激農民，誘發起許多農民暴動。一五一四年有符騰堡「貧窮的康拉」（der arme Konrad）

的暴動，一五一五年有克倫敦，斯泰雅堡（Steyerburg）的農民暴動；這些暴動都力說胡司（John Huss）關於理想社會的要求，即根據福音書的自由平等的要求。他們要求教會領地的國有化，廢止十一稅。這種運動不僅限於農村，都市裏也進行的。一四二六年在維也納，一四七七年在亞亨，一四八〇年在科倫，羅司託克，布藍士外克，奧斯那布律克（Osnabrück），一六四一年在馬德堡，都有暴動發生。

這些農村和都市中的改革運動，宗教上也實行了。支配着中世紀的是羅馬天主教。現在人民對於作為中世紀的觀念形態（Ideologie）的羅馬天主教實行批判，主張各制度的改革。這就是所謂宗教革命的思想。宗教革命思想和運動，以德國做中心而掀起的；這是因為德國沒有中央集權的政權，缺乏國家的統一，因而羅馬教庭的榨取政策，在德國最易實行；而現實上多成爲羅馬榨取政策的犧牲。宗教革命的呼聲，由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喊出來，而反對羅馬天主教的批判，由社會各階層的代表在實行。

農民層的宗教革命的思想，是英國衛克列夫（Wycliffe）等所指導的思想；在宗教批判方

面，雖非常保守的；而在社會的政治的要求上，卻是異常急進。他們站在原始基督教的共產主義的主張上，在這個範圍裏，他們是和都市下層人民的指導者繆賽（Thomas Müntzer）的鬭爭相關聯的。都市的宗教革命的思想 and 運動，適應着都市的社會階層，分成三派。在當時都市裏，代表着商業資本家（他們是商業家，掌中握着巨大的資本，左右都市的商業）和都市地主的都市貴族之宗教革命思想的，是法國的喀爾文（Calvin）。代表都市手工業小市民立場的是路德，而代表都市下層市民即平民立場的，是繆賽。喀爾文、路德的宗教革命思想是溫和的，尤其是他們的社會要求，以經濟活動的自由做中心；特別是喀爾文的立場，具體表現着當時新興資產階級的倫理要求，要改變中世基督教的經濟觀，來求適合新的資本主義的要求。路德的立場，程度上不像喀爾文那樣是新興資產階級的。他的立場是小市民的，譬如一五二五年的農民戰爭，在農民運動尚未變成暴動之前，是表同情的；可是到運動轉化為暴動，他就高唱反對，主張維持秩序了。

對於這些立場說來，站在下層市民立場的繆賽是革命的。下層市民的立場，在繆賽以前，有德國西南部所實行的再洗禮派（Wiedertäufer）運動，這是明白地以建設原始基督教的共產主

義社會爲目標，而偉大農民戰爭指導者的繆賽的見解，特別是如此的。

三

從十五世紀末開始，被社會的不安所襲擊的德國，到了一五一七年，路德在符騰堡舉起宗教改革（*reformation*）運動的第一聲後，愈益動搖不安了。一五二一——一五二三年之間，上述經濟上趨於沒落的騎士，在改造帝國的口號之下，一齊奮起，可是不久就爲軍備整齊的諸侯軍隊所鎮壓下去。不過這種一連串的社會運動，愈益刺激農民的神經，同時變成蹶起的衝動，而農民間組織的運動，就愈加活潑了。

農民運動的指導者是繆賽。他對於農民階層間廣泛深刻地動盪着的不平反抗，給予一種精神的指導；由此而把它組織成一個運動。這樣，大農民戰爭（*Der grosse Bauernkrieg*）被組織起來了。繆賽在士瓦本爲農民暴動而活動；到一五二四年秋，該地就揭開了大農民戰爭的序幕。繆賽所指導的農民們是革命派，因之是少數派，可是卻佔着指導的地位。因他的指導，士瓦本農民暴

動掀起後，就進入屠麟根活動；一五二五年春，德國西南部一帶，即亞爾薩斯（Elzas），法蘭肯（Franken），提羅爾（Tyrol），沙爾斯堡（Salzburg）等，都投入革命運動的漩渦中了。革命運動在社會的要求上，雖然是革命的；可是在宗教的要求上，卻是復古的，一貫着宗教的意識。這祇要一看土瓦本農民要求的十二條便可明白。十二條的大要如次：

- 一、村落自身獲得牧師任免權；
- 二、大十一稅（納穀）之總收入中，除去牧師之薪給後，當以餘額充貧民救濟之用；
- 三、承認各人身體之自由；
- 四、承認山河漁獵之自由；
- 五、承認山林採伐木材之自由；
- 六、減輕賦役如舊狀；
- 七、領主當要求規定以上之勞動時，當先徵得農民同意；更當支給相當報酬；
- 八、減輕地租，保護農民；

九、要求裁判公平；

十、領主非法占有之公地，當歸還村落；

十一、廢止死亡稅；

十二、以上各項中，有不副神意者撤回之。

這些要求，都根據聖經的文句，來做基礎的；就像非難農民戰爭暴動化的路德，也把它當作神之呼聲，而勸告領主們讓步了。可是，對於上述諸條的讓步，姑立領主的經濟上看來，決不願意的。領主就用武力來和農民暴動相鬭爭。還不曾充分被組織的農民，和領主武力相敵對，是非常困難的；同時，領主先以有利的休戰條件提給農民大眾，暫時處於停戰狀態，進而卻充實準備，加以彈壓。到處卻用這樣戰術，來強力壓迫他們。

四

因之，農民戰爭終於失敗了；可是這會給農民什麼影響呢？農民戰爭失敗以後，農民層的地位

並未會惡化，因為他們已經長期受着極限的榨取來了。農民戰爭雖以失敗終結，但關於農民所受的痛苦的要求，至少也有暴露明白的效果。農民戰爭以後，田園法頒佈，納貢及賦役都由法律規定，因而受到非法榨取的事例便少了。而且，趁着宗教革命的風氣，國家沒有教會和修道院的土地，充作王的領土；同時，農民間也有取得這種土地的。以後教育也告普及，路德那流人來經營國民學校，一向只限於都市的教育，也在農村實行，設立起農村學校了。

農民的狀態，這樣雖稍有改善，但封建領主傳統的暴壓，仍遲遲未告終結。特別苦惱農民的是領主的狩獵。領主爲狩獵的娛樂，嚴禁殺害野獸，特別是鹿、野豬；犯者處以死刑。因而這些野獸蹂躪農村的耕地，農民恐怖死刑，只好袖手傍觀。而且，當領主狩獵之際，農民得供給住宿，並被課賦役。農民們被這種人類和動物的二種野獸，所苦難磨折了。

自一六一八年到一六四八年間的三十年戰爭，是北方之雄阿多爾發（Gustavus Adolphus）和德國諸侯的鬭爭；阿多爾發爲了獲得德國的經濟利益，三十年的長年累月以從事鬭爭，因之，德國的國土荒廢，農民的狀態更淪入悲慘。阿多爾發的軍隊侵入進來，蹂躪東北部，陷農民於

塗炭苦境。戰後，領主對農民的誅求，備極苛酷，農民陷於貧困頂極，完全處於領主的隸屬狀態下。假定一六五〇年到一七五〇年間，德國人口爲一〇〇，那末其中有六五人或七十人是農民；這許多農民之中，可說有五分之四是處於農奴或體僕的狀態裏。一五二四年農民戰爭，以及長年以後的三十年戰爭，使德國農村極度疲弊，而阻止了德國經濟的發展。

五

在中世都市裏，手工業佔支配的地位，這早已詳述過了。這種手工業，是和直接消費者有關係的定貨生產或顧客生產；但另一方面，中世都市還存有爲遠隔地域的需要的生產形態，這就是家庭工業（Heimarbeit, Hausindustrie）。家庭工業裏，老闆並不把所生產的商品，直接販賣給消費者的顧客；生產者的老闆，和消費者的顧客間，有中間者的商人介在着。這種中間商人是行莊，專從事於商品的販賣。家庭工業的發達，雖不屬於中世紀的，但在中世紀後期，我們知道幾個這種的經營方法。譬如像在努連堡的金屬工業，烏爾穆，累根斯堡的棉織工業，空斯坦茲的亞麻工業等，可

以看到這種例子的。

這種生產形態的發展，是在十六世紀以後。因為到了十六世紀，纔始有足夠採用這種生產形態的資金，被德國商人手中所蓄積起來。它的出發點是美洲的發現和繞航好望角的成功。這二個發現，給經濟界巨大的變動。因為新航路的發現，引起對外貿易的發展；因為美洲墨西哥金銀礦的開掘，金銀就流入歐洲。這許多事實，就動搖已是山窮水盡的封建經濟的基礎。在這個動搖時期，蓄積了巨大財富的，是商人。這些富豪，不僅經營商業，也經營手工業，鑛山業，更又兼營金融業。國王諸侯騎士等，都從這班富豪的金融業者那裏，接受資金的融通，用錢財的勢力，就把他們放在自己支配下了。德國的富加 (Die Fugger) 衛爾塞 (Die Welsch) 兩家，是頂顯著的。富加是奧格斯堡的富豪，一四八七年財產共計一萬五千克爾登 (Gulden)，一五一一年增加到二十五萬克爾登，一五二七年增加到二百萬克爾登，在其最隆盛時代的一五四六年，竟達四百五十萬克爾登。這種巨大的財富，是因經營鑛山業和金融業獲得的。按照中世紀基督教的經濟觀看來，高利貸是罪惡之一；諸侯財政的窮困，早已到了沒有這種金融業存在，就不能緩和了。

像這樣作爲高利貸的豪富商人所集積了的財富，不光是用於消費，而且用以獲得更大的利益。這種由金融業來把財富的集積增加幾倍，實行這樣經營的時代，稱之爲高利貸資本主義（*Wucherkapitalismus*）；也可叫做貨幣轉化到資本的初期的形態。這種金融業者或商人所蓄積了的貨幣，他們投資到新的方面。這就是投資到工業方面——被稱爲行莊制度（*Verlags-system*）的經營方法。行莊制度的工業，可以說是中世手工業到近世工場制的過渡工業形態。蓄積了財富的商人們，用他的財政的優越，使手工業者隸屬於他們的支配之下，預借給他材料或一定規金，使他經營手工業，而把生產品交出來。這種制度，是資本主義初期時代所表現的制度，由金錢所有者的商人，和生產者的手工業者間一種隸屬關係所形成的。即商人把一定的金錢，或生活必需品（如生產手段），預借給手工業者，手工業者支付利息，或把生產品交出給他，同時禁止引渡商品給別一商人。這就是所以被稱爲 *Verlagsystem* 的原因。直譯就是預借制度。

這種行莊制度在德國，幾乎一切產業都通行的，如在鑛山業，金屬加工業，紡織業，鐵業，造紙業，裁縫業等；而其中最普遍通行的是纖維工業的紡織業，在家庭工業的形態上進行生產。這種制度

自然並非德國所特有，初期資本主義時代，到處都通行的。

家庭工業從外觀上看來，像是獨立的手工業者的生產形態；但實質上，是近於隸屬於一個商人即行莊的一個勞動者。這些家庭工業受資本主義的企業——行莊企業所指導，假使沒有它的金錢的援助，就不能繼續生產，因而隸屬於行莊，就是必然的了。當時的農村，是這種家庭工業良好的溫室。因為農村為戰爭而荒廢，同時為領主的誅求和高利貸資本所苦惱；所以專靠農業就不能維持生活；農村裏就作為副業，實行手工業的生產。但他們沒有設備必要的材料工具等的資金。都市的行莊，就把必要的材料或資金預借給他們，使生產可能；因為這是副業的收付，所以商人就能夠賺得巨利。

次於家庭工業所實行的工業形態，是工廠手工業（Manufaktur）。它不像家庭工業那樣，採取外觀獨立性的形態；而是在一個工場之內，招集手工業者，使之從事一定的生產。在這點上，工場手工業裏的手工業者，是集合的；可以說是緊接着即待到來的工廠工業之前的制度。它和工廠工業不同的地方，就是工廠制度生產的主要動力，是使用蒸氣力等自然力；而它是手力為主的。工廠

手工業以十八世紀爲其發展的時代。

支配着家庭工業，工廠手工業的，是行莊，是商人；這對於公會（Zunft）可說是站在反叛者的地位。公會對於這種制度，雖然採取極力反對的態度；又是公會制度的獨占化，祇有狹隘的生產力，而不能適應近代的要求。所謂近代要求，是以遠方貿易爲主的大量需要，或如近世戰爭所要求那樣的大量生產。這種要求，就打倒了銅牆鐵壁的公會強制，而開拓出新的生產的領域。

六

這樣，以都市的公會爲中心的封建經濟，就衰退了。代之而起的，是經過中世都市而發展起來的貨幣資本——商業資本。商業資本不能像手工業那樣，僅以支配都市的封鎖領域而滿足；它是一國的甚至於是國際的。爲了適應商業資本的要求，統治的範圍，就不得不擴大到廣大的領域上。這就是近代國家的意義。當商業資本成立時候的國家形態，並不立刻統一成爲民族的國家或國民的國家。尤其在德國，德國的統一國家的出現，更待之於後期；可是已經不允許像過去那樣，以多

數封建諸侯爲中心的分權制度，而是進展到以大選舉侯爲中心的領域國家。其中最大的，是領有普魯士的腓特烈（Friedrich der Grosse）大王的國家的發展；唯有這種絕對主義王權，纔是和這一時代的商業資本主義的要求一致的。腓特烈在七年戰爭中，把普魯士國家，登於德國的事實上支配者的地位，而造成商業資本活動的原野。

絕對王權的武力基礎，是對國內的廣泛的警察政治。因而，這種國家形態有時被叫做警察國家（Polizeistaat）；而對外則具有強大的軍備。爲了實行警察政治，就必要一個官僚政治，因之就必要多數官僚。對外的軍備，就實行徵兵制和騎士制的中間物——備兵制度。這種國家的基礎，一方面包含着舊有土地貴族的支配權，同時在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商業資本的支配權。絕對王權是把基礎安放在這兩個互相矛盾的要素上面的，雖然是這樣的國家形態，可是它的經濟基礎早已不是建築在農業上面了。近世租稅制度並不置於繳納穀物上面，而是建築在繳納現金上面的。貨幣終於支配着政治。隨着田租變成以現金繳納，也就規定對都市的課稅；用這些租稅還不能供應國家經費的時候，就募集公債。公債的募集，是意味着近代國家隸屬到都市富豪。

商業的發達，必要貨幣數量充分的供給。而近代國家爲了國營事業，也必要貨幣的。因之，增加貨幣的方法，是絕對主義王權下所喜歡採用的政策。國家爲維持軍備，維持廣大的官僚羣，需要巨大的資源。這個時代，國家也從事經營鑛山及其他實業；國家也就必要這些資金。在必要資金這點上說，資本家和國家是同一的。而獲得資金的方法，不外是振興實業，輸出生產品到國外，使國際貿易的收支均衡上變成有利而已。

這就是使絕對主義王國實行重商主義 (Merkantilismus) 的理由。重商主義的目的，在於擴入可以充作貨幣基礎的貴金屬到本國來，以求造成一國的富強。德國當美洲的金銀未曾流入歐洲以前，竟占歐洲銀產額五分之四，所以這樣，諸侯的重金政策，恐有很多幫助罷。不過，使貴金屬從外國輸入本國，並非重商主義的唯一目的，斯莫拉以爲重商主義的意義，在求國民經濟的確立；這不得不說是和所謂重金主義有表裏關係的。一國實業的興隆，既能招致貨幣數量的增大，而貨幣數量的增大，也惟在一國實業的興隆上，纔能發見它的適當意義。所以斯莫拉把國民經濟的確立，當作重商主義的目的，是不曾抹煞貨幣政策的意義的。

西歐各國採用重商主義的政策，在於海外貿易的發展，殖民地的獲得；但在德國，這方面的活動，是頗被忽視的。因為由大農民戰爭所荒廢了的國土，更蒙三十年戰爭的戰禍，農村恢復，必需許多日子；所以不能像荷蘭英法那樣，從近世初期起，實行那繁盛的海外貿易的活動。德國佔代表地位的絕對主義國王——腓特烈大王的經濟政策，就在恢復那已趨荒廢的普魯士的領土，進而併合德國各地，而立於歐洲諸強國相同水準上。因而進行七年戰爭，實行德國西歐化。腓特烈大王的重商主義政策，準備使德國走上資本主義的發展。

第七章 實業革命前夜的經濟狀況

——十九世紀前半期的農業·商業·交通·金融狀況——

一

德國資本主義組織的發達，要比英國法國遲得多。德國的實業革命，到了一八四〇——五〇年，才逐漸就緒。不過在此以前，資本主義制度，早已逐漸浸潤到封建主義制度裏去，而廣及於德國的一切實業部門；走向實業革命的準備工作，已經一步一步地進展；即使在政治上，也已經發生許多變動。一八〇七年開始的解放農奴的各種勅令，是打開新時代之幕了。

當十九世紀初期，在現在的帝國（Reich）的整個領域上，是統一的也是散漫的，可是卻沒有已經結合了的國家經濟。什麼像共通的關稅（Zolllinie），相聯絡的道路網，乃至統一的貨

幣，共通的租稅，以及全體通行的紙幣之發行，共同一致的私法和公法，按照地域上自然的歷史上特定的前提，而一貫起來的分業的生產組織：這些都告缺如的。只存有文化上（非政治上的或非經濟意味的）的統一——憑了同一的言語和文字，憑了跟法國的戰爭，憑了新生起來的歷史，憑了種種道德的和法律的理想、觀念、習俗，把民族的血緣關係以及共通的歷史基礎上，有教養的人們的意識裏，相接近的東西，混纏起來的統一而已。（Sartorius Von Waltershausen）。

從這樣的社會開始，經過關稅同盟的締結，一直進向德意志帝國（Deutsche Reich）的成立的過程，同時也就是德國資本主義走向爛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德國到一八五〇年代，就遭逢着歷史的時代，即實業的革命時代了。因之，把十九世紀的德國歷史，分成實業革命以前的和以後的兩期，認為更是適當。

德國農業正像其他實業部門那樣，譬如機器大經營的新技術，浸潤到工廠手工業，主要是發生於一八五〇年代以後；而它的政治的以及經濟的變化，卻主要發生於十九世紀前半期；所以我們可以叫這個時代，是德國農業變動期。現在先從十九世紀前半期的農業經濟講起。

二

十九世紀之初，德國還是明顯的農業國家。一八〇四年，全部人口大約七成三分（約一千萬人），是住在農村裏的。其他的二成七分，雖然集中在都市，可是都市人口的半數，還是農民。所以當時德國全人口八成以上，是從事農業的。一八〇〇年，柏林僅有十五萬餘人口；人口五萬以上都市，僅有華沙（Warsaw），北勒斯勞（Breslau），科尼斯坡（Königsberg）人口超過一萬的都市，只有十四個；而這些都市還充分帶着村落的風度。

要而言之，十九世紀初期德國農業的落後性，是和農民的政治落後相適應的。貴族兼莊園領主的一團，對於農民的土地財產，實行了所謂最高財產所有者的權利。即掌握着農民財政的決定權。所以，農民不是近代意味的財產所有者。財產所有這種半中世紀的殘釋形式，明明是大大阻止了德國農業的發展。爲了農業正常的發展，除去加在農民身上的法律桎梏，是必要的。不錯，財產所有的自由和個人移動的自由，喚起農民和地主的營利心理。加之，對外的關係上，在拿破倫一世的

抗爭中——普魯士在耶那 (Jena) 和奧爾修德 (Auerstedt) 的戰敗，實在是德國農民解放的信號——對內關係上，被西歐各國蔓延着的法治國家的自由主義要求所促進，所以，解放農民已到了不可避免的地步。可是在那時，正和自己力量，要求自己解放，一掃封建特權的法國農民相反，德國農民要這樣革命地成長還過分虛弱無力，明白這種狀態的德國各領主，就自己進而斷然實行解放農民。被認為改革者的代表的，是斯太因 (Friedrich Karl Stein 1757—1831) 和哈登堡 (Karl August Hardenburg 1750—1822) 等二人。

可是，這種解放決不是爲了農民的利益，而是爲了領主自身緊急的利益。他們因爲莊園農民勞動能力的不充分，其合勞動能率；所以任他自由，化爲無產勞動者；而根據新規則所採用的「農民」，不過要獲得更充分的勞動力罷了。

三

一八〇七年十月九日普魯士首相斯太因發佈的農奴解放令；和四年後（即一八一一年）

所發佈的哈登堡立法，都是被認為十九世紀初期歷史上值得永久紀念的一大事件。一八〇七年的勅令內容是表明各普魯士居民，不問其為貴族或農民，同樣可以獲得各種財貨；撤廢選擇職業的限制——農民也有從事農業以外營業的權利，禁止隸屬關係的成立，以及世襲隸農關係，可於一八一〇年十一月十一日，與聖馬丁節（Martintage）同時廢止。可是，這許多也不過代表領主一方面的利益罷了。第一，根據農民保護立法所造成的地位，即農民新獲得的所有物，假使領主向農民「賠償它所成立的所有權」，便得作為領主所有。第二，假使領主在別的地方，造成同樣大小的土地，把它指示給農民，即准許沒收農民現在所有的土地，變為領主的領地。第三，不管舊所有者的意見如何，領主得把農民狹小的利用地，變為由更大的四塊到八塊利用地所湊成的大土地。

新勅令一方面雖宣布世襲農奴制度之廢止；另一方面又認可領主有土地自由處分的權利，不得不說事實上是抹煞「保護農民」的旨趣的。

其次，說到哈登堡立法，這是一八一一年九月十四日普魯士政府所發布的土地法；它由二個部分構成。

一個是規定領主和農民的關係；另一個是關於土地耕種的改良。這裏規定着：有土地世襲利用權的農民，獻納其土地三分之一；僅有一代利用權的農民，獻納土地的一半；即得成爲土地剩餘部分的所有者。可是這個立法，被領主方面的利己運動所阻止，並不會實施。

一八一一年勅令的終末，發表了下面宣言，即是一八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宣言」。一八一一年未曾實施的「流產」勅令，一點兒不曾解放農民；反之，這個「宣言」限制着所有權所規定的農民人數。詳細說來，按照一八一六年的宣言，當加保護的農民，僅限於自主的，保有足夠養活自己的土地；而且土地已經記入於好的徵稅表裏，因而規定着課稅量的。

自從新宣言發佈以來，農民保護便告消滅，所以，農民階級的所有權，便被領主所掌握。農民死後，土地被沒收；用各種各樣方法，來達到這個目的。凡和「宣言」中所規定條件不合格的大多數農民，因而多變成日工勞動者了。然而，「宣言」所給予保護的農民人數，實在寥若晨星；大多數的農奴，依然未被解放，被遺落在大地所有者的權力之下。

一八二一年七月七日發佈的法律，說明共有地分割法和義務解除法。前者廢止一向對土地

的共同使用權，把它解放分割，變成個人所有權，然後來使用它。從腓特烈三世實施以來，已經解放和分割了二百五十萬摩爾根（Morgen）到了一八四八年，已達四百三十萬摩爾根。

其次，所謂義務解除法，這是把農民負於領主的納貢和賦役的價值，規定數量，用規定的方法，來解除這種封建的義務。

除了普魯士以外的德意志各邦，也或速或遲的實行解放農民了。可是，解放農民只不過在非常被限制的形態下面來實行的。不管這樣，從土地拘束中獲得自由，和土地所有的自由，都是意味着和土地分離的自由。

實際上，農民有土地所有的自由，同時一無所有的農業勞動者也出現了。解放農民的結果，一方面大多數土地集中到領主手裏；另一方面創造出了多數的農業勞動者。

四

當資本主義正在手工業的領域裏，漸次得勢的時候，農業領域裏資本主義的浸透作用，也是

不可避免的。領主對於農民的榨取，與其在封建的壓抑之下，徒使農民陷入於疲弊困憊；只得到一點些微利益，倒不如把農民解放自由，得到更大的利益，要有效果一點。這時，使用農民，不單像過去那樣，只是用於領主必需的滿足；而且經營着爲市場的生產了。

一方面正在產生出可充榨取對象的多數農業勞動者；另一方面，領主兼併了獨立農民的土地，在資本和土地集中必然結果之下，就不得不把眼光放到近世實業上來。特別在德國東部，極少數領主侵害農民利用地，因之和離開土地的多數日工勞動者大衆，形成對立；以農業爲基本的近世工業，就逐漸獲得勢力了。

第一是製造火酒 (Schnap) 。從這時起，德國火酒，供給於歐洲各國。第二是製造蔗糖。這二個實業，提供德國的領主，以巨大的資本支配權。

替代着負擔賦役的封建農民而出現的自由日工勞動者，根據當時狀態，他的報酬還是用現物支付的。此外，還有住在莊園裏的莊園勞動者 (Insten, Dienstenleute, Dreschgärtner) 。他們在莊園左近，和家族在一起，住在莊園主所指定的小屋子裏；舉家提供勞動；他們因此得有種種

經濟的特權。

作為勞動報酬的現物支付，逐漸用貨幣支付了。可是現物支付（它就是到了現在，還在德國各地，發生重要作用）決不是領主方便的榨取手段，這是由於當時大經營的形式，農業的自然性，和勞動者缺乏土地這三個要素所產生的必然的歸結。

農業勞動者的工資，在十九世紀前半期，沒有什麼變化；到了一八六〇年代，和德國工業的發達相關聯，才開始高漲。

如上所述，德國的農民解放，使土地集中到領主手裏；因此有大經營的成立。可是也唯有農業的大經營，才使農業有合理化的可能。當十九世紀初葉，德國農業的廣泛範圍上，素朴的三田制度，還佔着支配的地位。

三分之一的耕地，即二千一百萬公頃耕地中，有七百萬公頃完全未被利用。這樣原始的農業法，憑藉着飼養多數家畜上所必要的豐富的草地，才得繼續維持的。不過，到了十九世紀初期，逐漸增加起來的人口，就把草地，沿澤地，逐漸變更成耕地了。

畜牧草地的減少，就引起家畜飼養上所必要的糧秣的缺乏。糧秣的缺乏，尤以冬季爲甚。因之家畜的減少，使施肥薄弱，土地變成不生產的了。

故之，牧草的改善，成爲德國農業的出發點。修伯德（Johann Christian Schunbart 1734—1787）和腓特烈大王，是舉有成效不可忘懷的農業改良家。修伯德夙具改良牧草之志，他移入車軸草種在休耕地上，和別的農作物交互配合。這個方法在十九世紀初期，突然特別傳播到中部和東部各地。修伯德因爲移植車軸草的功勞，從約瑟夫二世起，被列爲貴族。

德國農業開發上，完成獨一無二功績的人，是推爾（Albrecht Von Thaer 1752—1828）。推爾初爲策勒（Celle）的醫生，被稱爲把農業經營放置在科學基礎上的最初的人。他學習了英國先進的農業經營，把這種學問帶回本國，發表名著「合理的農業原理」（Grundsätze der Rationellen Landwirtschaft 1809—1812），一八〇四年移住到普魯士，開設了最初的農業學校。不僅用輪耕農法（Fruchtwechselwirtschaft）來替代三田農法，而且孜孜一生，盡力於全部農業、土地制度以及勞動法之改良。

利比喜 (Justus von Liebig 1803 1873) 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從自然科學的側面，繼承而且完成了推爾的勞作。他是農業化學的創設者，研究植物成長發生的各種條件，其中特別宣說人造肥料的重要性。

這期間，農業學校在斯拉斯哈姆 (Schleisheim) (一八二二年) 耶那 (一八二六年) 玻爾斯托夫 (Paulsdorf) (一八四七年) 相繼開設了。

可是，農業技術之科學的研究，和教育設施，即設立農業學校等改良事業的結果，造成休耕地可注目的減少。十九世紀中葉，休耕地比過去減少一成五分；而收穫反而增加到十二萬噸。

上面已經說過，農業技術的改善，不僅對於經營組織上，而且也實行於經營方法。作為代表的是深耕法。良好的耕種，必需要農具的改良。而肥料的改良，是第二個代表的改善。這就是自然肥料，人類肥料和綠肥的應用。第三是適應土地的性格和風土特質的植物種子的選擇。

上面所記述的農業合理化的結果，農作物、家畜以及伴隨着的生產上，除了極少數的例外，收穫都表現顯著的增加。

五

十九世紀初頭，德國各都市裏，行會的手工業還把握着支配的勢力。行會制度的勢力，還是牢不可拔。當這期間，資本主義的浸透作用，也正在次第進行。

當十八世紀，啓蒙的專制政府，已經開始並破壞行會制度了。拿破倫時代的動亂，掃蕩了封建制度已經全部消滅的各地的行會。即把萊茵省、萊茵巴威、萊茵黑森（Rheinhesen）等地的行會制度掃蕩了。

普魯士的斯太因·哈德堡的改革，用營業自由，給行會制度一個大痛擊。過去普魯士諸州，營業自由雖說亦是紙上空文；可是它是要想撤廢行會強制的。

這種改革，從德國西部和西南部開始，逐漸波及到德國其他各邦。其次，還有別一要素，助長了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浸潤的；這就是在舊商業都市和商港都市的巨大資本的積集。

在十八世紀，專制政治宮廷和軍隊所需的巨大資金，愈益增加的租稅負擔和國債，特惠保護

的經濟政策的費用上所必要的莫大資金，成爲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大刺激。而且，大資本的一部分，直接由國庫支出。這就是霍亨索倫（Hohenzollern）家的重商政策。普魯士的租稅、關稅、賦役，榨取手工業者和農民，一方面潤澤軍隊和領主，同時在國家補助的名目之下，多數落到資本家的手中。資本因農民的無產化，而產生剩餘價值。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奪取了民衆的宗教假日及其他，用來完成資本生產剩餘價值的過程。資本蓄積的勢力，像上面說到的那樣，和國家的軍事的權力之活躍並存，看準行會制度的間隙，爆發這個朽腐的建築物。用國家權力來破壞行會制度，和家庭工業的成立，主要是在都市；可是反之，設有行會制度極端的獨占和制限的制度，爲領主無抵抗地所抑壓的等於農奴的農民，祇耕種極少的所有地，僅賴此而不能維持生活，好久以前，就把紡織，製造家具等，當做副業的；在這些低凹地帶，大部資本就投資了，因而就有家庭工業的成立。自然，資本主義的發展，德國高地的各地方，也相次爲家庭工業的勢力所蔽及了。

可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方法，祇限於家庭工業，手工工場次之，使用機械的工廠工業，並沒

有那樣發展。蒸汽機的使用，在普魯士當一八三七年僅四〇〇餘架，一八四六年也不過一〇〇〇餘架而已。而且，資本家的生產部門中頂尖銳發達了的實業部門，就譬如在棉紡織業裏，也幾乎不使用蒸汽力。數達五十萬錘的錠子中，有百分之五十八用的水力；百分之二十九用的畜力，百分之十三，用人力來運轉。

行會制度的崩壞，和家庭工業的成立，結果使階級組織完全變化。行會制度裏的小老闆，職工，徒弟，作爲工資勞動者「不是作爲老闆，」而和資產階級的先驅——商人階級相對立。在商人階級極苛酷的榨取方法之下，「像用運輸制度，動力制度，延長工作時間，減低工資及其他等，」在各種頂惡劣的勞動條件之下，不得不甘心於過重的勞動了。

六

德國實業中最早佔優勢的，是紡織業和鑛山業。最初的亞麻紡織機器，輸入於一八一〇年，一八三七年僅有工廠五，錘數一〇、三〇〇；一八四六年僅有工廠十四，錘數四五、〇〇〇。祇是當

作農家的副業來經營的。羊毛紡織，起初還只是以家庭工業形式來經營的；一八四六年，在普魯士總計有四十五萬一千九百九十三錘。

棉紡織業最初就以工廠經營爲多，一八〇二年，普魯士的棉業使用一九〇名勞動者，年產量總計值三萬二千一百八十七泰來（Thaler，值馬克之三倍。）

一八四六年德國各地的紡織業狀態，約如下表：

地 別	紡 紗 廠 數	精 紡 錘 數	每 廠 精 紡 錘 數
普魯士	一五三	一七〇、四三三	一、一一四
薩克森	一三二	四七四、九九八	三、五九九
巴威	一一	五〇、五三二	四、五八九
符騰堡	一一	三三、〇〇〇	二、七五〇
巴登	二	一八、〇〇〇	九、〇〇〇
黑森大公國	一	一八、〇〇〇	一、八〇〇

黑森選舉候領	二	一、五〇〇	七五〇
關稅同盟（合計）	三一三	七五〇、二七四	二、三九七

薩克森開始就是德國棉紗工業的中心地。一七九八年當地建設了最初的機器的利用水力的棉紡織廠。一八一四年薩克森的機器精紡織錘數，實達二十七萬六千六百二十五枚，到了十九世紀中葉，約達五十萬枚，在關稅同盟中的總錘數中，占到三分之二。

另一方面，織物業在棉布，亞麻，絲綢以及呢絨各方面，次第發展起來了；不過和紡織工業比起來，家庭工業的色彩更爲濃厚。

鑛山業一早就採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其中，鐵工業因爲熔鑛爐和精鍊法的改善，表示了顯著的進步，焦煤溶爐在一七九六年起，始於上西利西亞（Oberschlesien）採用；到了一八四六年，數達九個；有五十二個木炭熔爐的魯爾地方（Ruhrgebiet），到一八四〇年以後，才採用焦煤熔爐。

魯爾(Ruhr)煤鑛脈的發見，實遠在十四世紀。這時候起，採煤工業在魯爾流域數地興起了。自十六世紀終至十七世紀初，魯爾採煤工業漸成有秩序的工業組織。三十年戰爭以後，即在韋斯特發楞(Westfalen)條約(一六四八年)以後，這些鑛山的管理權，完全被收在德國聯邦政府的手裏。可是，德國政府的官吏，祇執行鑛山管理的事務；地主常常所有着採煤權利；所以魯爾存在着多數小鑛業者。開始鑿穿現在所謂堅坑的，是在一八〇〇年左右；到了一八二九年才完全成功；同年，波伊斯特伯爵(Graf Beyst)的鑛山，鑿穿那完全貫通了覆煤地層的坑，宣告成功。因之，魯爾一帶的採煤方法，形成迅速的進步，一八四〇年，魯爾產煤量一躍增加到九十九萬噸；一八五〇年竟超過一九六萬噸。所以，促成魯爾地方工業發展上有力的發展的，從一八三八年已經開始了。

當時，對於煤的需要，漸次增加；自魯爾地方起，各地煤業突然勃興了。普魯士的煤產量，一八二四年是一百二十萬噸，一八四三年是三百拾萬噸；可是和一九〇〇年的一萬萬一百九十萬噸比較起來，還可以明白它的勢力的微薄的。

爲鐵工業和煤工業的發展所促進，機器工業也形成顯著的發達。

所以，十九世紀前半期的工業，顯然還是手工業，機器的工廠工業，還得不到巨大勢力。

七

我們已經說過，農業和工業的發展，是商業發展的結果；而同時也是原因。小經營和大經營所造成的工業經營組織和經營方法的改良，雖然說主要還是限於手工業的，可是卻正在着着進步。工業的資本主義化，有負於商業者實多，而且，農工業二個實業部門已經收得的成果，轉而就刺激商業的發展。

大商業雖以採取現物商業的形態爲主，可是重要性卻逐漸加重起來了。因之，經營組織的擴大，也由資本家之手進展起來。而農業生產地的分散，以及工業生產地的擴大化，生產者及和消費者間關係的擴大化，對於現物商業，或更正確說，對於市場商業，漸次感覺到不便。可是，因這種不便，終於促進樣品商業的發展，那是屬於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事了。

零售商業的重要性，也次第增大；這從各地方零售商人的增加上，可以看得出來。普魯士每萬人中所佔的成數，一八九四年佔九十七人，一八九五年達二百四十人。在北勒斯勞（Bretlan）市，零售商對於全人口的比重，一八四六年佔百分之三·一，一八九五年也達百分之六。十九世紀前半期零售商業重要的變化，在後半期還繼續進行，直到完成了經營的固定化。

行商的色彩，次第消失，零售市場的勢力，逐漸失墜；代之而起的，是店鋪商業流行了。零售商業的沈滯，是手工業的情勢所發生的必然歸結。而零售商業的經營本身，多不免是手工業的家長制度的組織。

十九世紀前半期的特徵，是對外貿易的入超，和代表農業國性質的顯著。一八四二年，輸入總額五萬萬六千六百萬馬克，輸出總額四萬萬八千八百萬馬克。輸入品中，木綿原料，糖，咖啡，占一半以上；輸出品中，綿織品，穀類占大部分，這是表示着農業國的面目。

輸出總額，一八三〇年爲六萬萬六千六萬馬克，一八四〇年爲十一萬萬二千萬馬克，次於英、法兩國，而居第三位；它的急激的發展，是在中葉以後開始的。

和各實業部門的發達，保持相互關係，被這種發達所促進；而同時又刺激別部門的，是交通業。就交通的發達說，首先可以舉出來的，是道路的增加。

十九世紀初葉，德國道路的惡劣，是歷史上有名的。乘公共馬車去旅行，是當時最好的方法；可是從柏林到萊比錫（Leipzig）要一天半，到北勒斯勞要四天，到科尼斯坡實需一星期工夫。現在道路逐漸改善，大道路的增加，在普魯士逐年遞增如下：

一八一六年	四一四英里
一八四二年	一、三一二英里
一八四八年	一、五七三英里

可是，把馬車作為唯一交通機關的初期交通，實在是非常不便的。

而在這個期間，領土統一的氣運，爲了工業的近代經營形態，和各領土間協業的確立，就必需交通的變革。鐵道就適應這種必要而開設了。德帝國的鐵道，以努連堡、孚爾德間最初的鐵道，開始築下了基礎。鐵道的開通，在一八三五年，關稅同盟的成立，是在它的前年。向來處於孤立狀態中的德意志各國，因之而接近，它的相互關係，更加緊密了。物價，尤其是西部和東部之間所存在的物價巨大的差別，現在不再存在了。實業之資本主義合理化，從這時起，隨着政治的統一，而表示出急激的進展。鐵道的開始，也相繼進行了。

一八三五年 努連堡、孚爾特間

一八三八年 柏林、波次丹 (Potsdam) 間

一八三八年 布藍士外克、瓦爾芬波推爾 (Wolfenbüttel) 間

一八三九年 萊比錫、德勒斯登間

一八四〇年 萊比錫、馬德堡間

一八四〇年 明亨 (München) 奧格斯堡間

一八四〇年 法蘭克福，馬因次間

一八四〇年 曼亥姆 (Mannheim) 海得爾堡間

一八四一年 柏林，安哈爾特 (Anhalt) 間

一八四一年 杜塞爾多夫 (Düsseldorf) 愛爾倍爾夫爾特間，

一八四一年 科倫，亞亨間

鐵道的延長距離，一八三五年六公里，一八四〇年四七〇公里，一八四五年二千餘公里，一八五〇年達六千公里弱。

河川航行，以前有航船業的發達。汽船的交通，一八一七年開始於威塞河，翌年普及於萊因河和易北河，一八三〇年多腦河也通行。萊因汽船公司在一八二八年，萊因中下流汽船公司在一八三六年，都分別創設起來。

海上航行，汽船的使用並不發達，船舶的容量也是小規模的；據一八四一年到一八四五年的平均，每一隻祇有一百七十八十註冊噸 (Register tonne)。漢撒汽船公司創設於一八三九年，漢堡

美洲汽船公司在一八四七年開設了。

長久之間被小邦分立所妨礙，難免是不完全的郵政制度，也作為上述的各交通部門發達的當然歸結，現在逐漸走上發達的道路了。在普魯士，一八四九年電報制度佈設起來了。

九

一切部門裏德國實業上面那樣的發展，同時要求發券銀行的增加。可是當十九世紀前半期，進展的程度，還表示出遲慢的。尤其在一八三〇年代以前，銀行券的缺乏，是它的特徵。

十九世紀初葉，掌握銀行券發行權的唯一銀行，是一七六七年，腓烈普大王所確立起來的柏林國家銀行。

可是，柏林國家銀行到了一八〇六年，也停止發行銀行券，從一八二〇年以來，用來代替的是所謂銀行憑單，即祇用一百泰來以上的存款憑單來代替罷了。

這種存款憑單，到了一八三六年，數達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三百泰來；同年十二月五日，根據閣

令被收回了。再以有百萬泰來以內的證券發行權，於一八二四年創設了斯德丁銀行（Die Ritter-schaftliche Privatbank zu Stettin）；這第二個發行所發行的證券，也遭遇到了同樣命運。所以，在一八三〇年代，祇有一八二〇年所創設的律伯克私立銀行，發行證券而已。

可是，這時候證券發行上加了一個新展開，這就是巴威發行匯兌不動產銀行（Bayerische Hypotheken und Wechselbank）的創立；一八三四年起，有八百萬格爾盾（Gulden），以後，有一千二百萬格爾盾的證券發行權（銀行券發行權）。一八三九年創立萊比錫銀行，一八四六年，有總額二千一百萬泰來的銀行券發行的普魯士銀行，都創立起來了。

可是，銀行券發行正規的進展，不得不待之於十九世紀後半期了。

不管德國實業的後進性，另一方面，早已有公司企業的發展和成立了。其中若干採取股份公司的形態。普魯士股份公司的數目如下：

普魯士的股份公司

年	份	股 份 公 司 數	資 本 額
一八二五年		二一	三六〇萬馬克
一八五〇年		一〇〇(以上)	六、四〇〇萬馬克

第八章 實業革命前夜的社會狀況

——十九世紀前半期的政治情勢和階級運動——

一

十九世紀的開幕，在政治上，是使絕對主義國家——神聖羅馬帝國——的舊制度震駭了。受列強資本主義的發展所挾擊，過去的一切的政治法律，對於近代國家的發展上，開始被感覺到是一種桎梏了。從征服者拿破崙（Napoleon）的法國壓制下，從長年累月的戰禍的迷霧之中，透露出德國統一的曙光。這就是一八〇三年帝國同盟的成立。

一八〇七年所開始的斯太因和哈得堡二人的改革，衝破了腐敗的封建國家各實業部門的虛隙，對於資本主義的浸潤，提供了機會。

國家統一的動向，在一進一退中，逐漸機運成熟了。一八三四年關稅同盟的成立，和次年的最初鐵道的開設，同是劃時期的事件。

所謂關稅同盟 (Zollverein)，就是在關係國家相互間，撤廢經濟上的國境，造成同盟經濟。這個同盟在德國，從一八一九年起，已經發達起來。一八二六年，成立了北德六邦關稅同盟。同盟的利益，被一般所認識；以它做範模，旁的地方也結成了同樣的同盟。一八二八年有南德關稅同盟，一八二九年有中德通商同盟的成立。可是，這各同盟集團的對立，就使同盟集團的利益，不能充分發達；因之就企圖合併，一八三四年，德國關稅同盟就成功了。即從一八三四年到一八三六年間，漢諾威 (Hannover) 布藍士外克 鄂爾敦堡 (Oldenburg) 緒安堡 · 利培 (Schauinsland) 之間，成立了關稅同盟。因為國內工業貧弱，又因為航路很短，有低廉輸入的可能，所以顯然有自由貿易主義的傾向。而德國在一八三三年到一八四八年間，因為關稅同盟，和顯著的鐵道開通數的增加，產生了十五年的和平時代。雖然如此，一八四二年到一八四六年，爲了綿紗和生鐵關稅率的極端低下，終於引起關稅同盟的危機。

這樣，在自身內部，正在促進資本主義的發達；一路又急急在葬送自己的日趨傾復的封建的建築物，還很能支持着自己。一八四八年的歷史的日子，這樣，逐漸接近起來了。

封建社會內部，新的階級分化，在社會各方面廣泛地進行；身分之外，發生出近代的階級；在同一身分的內部，更實行階級分化，而身分還採取各種形態殘留着。

上面已經說過，農民解放的結果，一部分中世紀的農民，作為純粹的農民，新的用着急激的速度，被吸收在集中了的領主莊園之中；另一部分，和土地分離，變成農業勞動者，進入莊園。而兩者都濃厚地帶着手工業的色彩。換句話說，當時多數農民，把手工業當作副業來經營。

農業勞動者在其內部，再細分為各種階段，譬如日日農業勞動者、莊園農業勞動者等存在。工業部門的階級分化和變更，從十八世紀初葉以來，急激地進行了。存在於中世紀工業的一部分老閩，職工，徒弟，早已多變成零星的工資勞動者，即適應着家庭工業，工廠手工業和工廠工業的經營形態，而變成家庭工業者，工廠手工業勞動者，和工廠勞動者。

這些人，總括起來叫做無產階級（Proletariat）。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站在資本主義之消

極的積極的立場上。所以兩者的成立和發展，是對立的，而且是同時進行的。

資產階級也適應着無產階級的各種形態，而變化它的態度。狹義的資產階級——所謂工商業的大企業家——的前身，是商人階級。在十九世紀前半期，這兩種形態都存在着。

舊制度的支柱——領主階級（*Trunketen*）（即土地貴族，）循着獨自的發展過程，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也頑強地發揮着支配權。這個時期，領主階級的質的變化，並不顯著。在絕對王權之下，腓烈普大王企圖用重商政策造成工商業的發達，這早是屬於半世紀以前的。被封建特權所擁護的資本支配權，就給予德國領主的動向上一種獨自性。

工業，商業，交通和農業的經營形態的變更，招致了小資產階級的發達。以十九世紀末做分水嶺，他們的進展。到了一八三〇年代一八四〇年代，逐漸增加了重要性。

十九世紀前半期德國社會的動向，可以看做是領主，農民，農業勞動者，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階級對立關係的過程。

政治的勢力，和代表經濟勢力的各領域各階層，這些階級所經過的過程，實在可以斷言：這是

德國社會的歷史動向本身。這時候，惟有德國社會所包藏的矛盾之消極方面，是值得特別注目的。這是因為這一方面，常常是矛盾的決定要素。所以我們一定要先從農業勞動者和工資勞動者的狀態，開始敘述。

二

十九世紀前半期，德國農民和農業勞動者，負擔着許多封建的重荷，這已在上面說過了。農民和農業勞動者人格的從屬，在法律上不待說是被廢棄了。可是，普魯士農民中祇不過極小部分，因而成爲自由的土地所有者罷了。可是小康有餘的農民，大部分也正在逐漸喪失了所有權的確實性。

實際上，農民的封建負擔，用貨幣地租或穀物地租等來計算；而且不得不用地租的二十倍的數額，來償清這種負擔。農民（包含着其餘農業勞動者）呻吟在苛重的封建的和國家的義務這一重荷之下。

農民和農業勞動者的大部分，並不曾因農民解放而確保其所有權，也不會免除封建的貢租和賦役；他們人格的自由，更不足以防禦領主的貪慾無厭。

所以，領主到處都能壓迫農民。領主蔑視農民的權利，收買其土地，能夠用強力來收回所出借的土地。他們運用一切的權力和詐譎，巧妙地剝奪了農民的所有。實際上，農民的自由，是失去對領主要求任何權利的自由——這裏所謂自由，就是沒有權利——，而領主的自由，是對於農民課以一切義務的自由。

要而言之，農民和農業勞動者，連一舉一動都不自由的。除掉用自己的雙手來工作，或是使役牛馬來工作之外，還負有義務，應當做那難以相信各種各樣的工作。

爲了領主的狩獵洗禮，結婚，而獻納貢賦，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而已。在這種封建重荷之下，農業勞動者用近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爲領主而從事市場的生產，使領主徒然增大了資本蓄積的勢力。

所以，農民和農業勞動者的生活狀態，完全是惡劣的，實際上所不能相信的窮乏，困憊和瀕死

的飢餓，常常支配着他們。因法制的變更所造成的經濟的變化，使農民層特別是農業勞動者，和領主間的階級對立，變成明白了。所以他們對於封建的義務，自然地舉行叛亂，然而縱有何等政治的確定要求，他們也是過分無力的了。

他們缺乏政治的訓練，對於結成黨派，終有莫不相關的觀感。與敦瓦爾特（Odenwald）斯瓦爾次瓦爾特（Schwarzwald），薩克森，西利西亞等地所掀起的農民暴動，決不能說是大規模的。

在普魯士最初的議會裏，農業勞動者，僅有被五十人所代表的程度；在梅喀楞堡，農民和日工勞動者結束而放棄掉過去的奴隸根性，用五萬人署名的請願書，要求廢止教會保護權，牧師由村鎮公選，領主的領有地適用村鎮令，工業經營和販賣之自由，廢除有害的工業經營強制，及一切所有地上的狩獵權等。在西利西亞，做照着勞動者同盟（Arbeiterverbänderung），為促進利益的目的，結成了農業勞動者同盟（Bund der Landwirthe），高揭出這樣要求：「國家對於一天勞動，應向勞動者支付足夠他和他的家族共同生活的工資。」這是成為農業勞動者所能達到的政

治意識的頂點。在他們的行動裏，可以窺知階級的和政治的意識之薄弱：就在他們所提出的要求裏，甚至連明瞭地表現的社會的性質，也缺乏的。

他們對於自己的對立物，在認識上或在態度上，也暴露出階級的弱點。可是，這並沒有變更十九世紀前半期社會體制之消極要素——農民層的特質。

三

可是，形成比這更強有力的消極要素的，是工資勞動者。上面已經說過，一切形態的工資勞動者，因為工業不會發達，在可驚的惡劣條件下勞動，這是和農業勞動者同樣的。

這是因為和經濟組織未分化的狀態相照應，受到二三重複雜型態的榨取，以及新進展起來的經濟組織所要求的，新榨取方法的增大化的緣故。競爭制度，動力制度，勞動時間的延長，和工資的減低，苦虐着手工業勞動者，這在上面已經說過了。

此外，童工，女工，澈夜工作的不衛生，因設備不完全而引起危險，失業等，作為代表的榨取新形

態，而顯現出來。

日趨滅亡的實業制度，和因此而成爲雙方的犧牲，成爲雙方冷酷的貪慾目標——手工業者覺醒的姿態，最能明瞭地表現出來的，算是西利亞亞的織工罷。

該地亞麻業，向來就發達的，完全用鄉村的家庭工業，在濬确的地方經營；內部關係幾乎站在封建基礎上，在可戰慄的程度中進行封建的榨取，全部織工——不問其爲自由織工或隸屬織工——，負有當向領主支付織工稅的義務，甚至還不得不負擔着封建的貢品和賦役。

加之，爲了一小方塊的土地所有，對於國家又非支付地租不可。而商人支付給他們的工資，是等於捨施給乞丐的工資。西利亞亞織工的困窮狀態，實是一方面受封建領主無厭的榨取，另一方面受毫無顧慮的商人資本主義的榨取之結果。

被這樣二重榨取——還有國家的租稅重荷——所壓迫，而延續着的西利亞亞的織工制度，終於因爲工廠工業，而遭逢着暴露手工業的歷史運命的日子了。機器的紡織工業，逐漸造成手工紡織業的衰滅；到了一八四〇年代，蒙受災害的織工，紡工，染工，即使除兒童以外，已達十二萬人。當

年秋天，得到二十二個銀克倫工資的，西利西亞的蘭根比勞（Langenbielau）和彼得爾斯瓦爾道（Peterswaldau）的織工，對於仇敵——商人茨凡茨伊格爾家和對於機械的憎惡念頭，到了一八四五年終於爆發了。織工們一面呼唱着從心底裏迸濺出的有名的血之審判（Das Blutige Richt）歌，殺奔到了商人所長年累月榨取來的堆積商品的倉庫。結果，商人用槍彈來鎮壓了這個暴動。德國文豪霍甫特曼（Gerhart Hauptmann 1862—）所著的「織工」把這個暴動戰曲化了。

同時，孚柏塔爾（Wuppertal）的紡織業，危險襲來了。織工繼續着這樣狀態：「現在的工資，只夠每天糧食，織工不得已因為錯亂障礙過勞等而引起事故的發現，而不得不忍受着過度的疲勞。所以，雞鳴即起，繼續勞動到深夜，甚至還要更遲。體力耗盡，感覺遲鈍。胸凹背駝，腸弱咯血。全身衰弱，漸成殘廢。健者亦天年短促，終於天亡。彼等暴處露野，或居於無空氣無太陽的苦人之中。」

一八二八年，紡織者反對減低工資，引起暴動的時候，企業家立刻輸入近代的機械，使兒童作工，來對抗它們。在克累斐爾（Krefeld）到了一八四六年，一八千架的織機之中，都市有一千架，農

村有二千架停止工作，因而直接有四千五百人，間接有一萬二千人無飯可吃了。」此外，屠麟根的競爭制度，是極爲苛刻的。

這些悲慘的狀態，不僅限於紡織業的範圍，其他種種實業，也是一樣。這些悲慘的狀態，因普魯士政府消極的活動，而發見了。當一八一八年，普魯士政府聽到萊茵地方某工廠主，開設一個學校，開議就決定對創立者加以表彰。因爲無賴對於該廠主的壓迫，接着就實行調查學校；當時教育部長亞爾登斯太因（Kral Altenstein 1770—1840），要求杜塞爾多夫（Düsseldorf）政府提供關於該校的詳細報告。

據報告說：被表彰的工廠主，擁有二個紡紗廠，晝夜開工，使六歲以上兒童操業。第一廠日工使用兒童九十六人，夜工六十五人；第二廠日工九十五人，夜工八十人。勞動時間日工十三小時，夜工十一小時；時常連星期日也得工作。加之一天的勞動，兒童年少者僅付二十個本尼（Pfenning）以下，年大的三十個本尼以下。而在履傭成年工人時，就非支付十個銀格羅仙（Groschen）不可。所謂這個被表彰的學校，就發見了祇不過對於日間工作的兒童，賜以二小時教育，夜間工作的兒

童，賜以一小時教育罷了。

關於這種狀態不能滿足的教育部長亞爾登斯太因，就向萊因省（Rhein-Provinz）的地方廳，以及韋斯特發楞，布蘭登堡（Brandenburg）西利亞，薩克森諸政廳，要求關於工廠的童工的狀態和種類，實行調查。

這個調查，是用德國官僚之流不靈活的方法進行的。即是說，並不直接去調查兒童，祇是詢問廠主，醫生，牧師，教師等，就編製報告；可是，雖然這樣的報告，已經充分足夠使當時人士震驚了。

全部紡織業，以及針，青銅，鈕扣，鐵甲，壁紙，陶器等工業，使役著幾千個年齡僅四歲以上的兒童，一天工資僅幾個克羅仙，使之從事那十小時到十四小時的過度勞動。

實業不進步的地方，譬如在布蘭登堡，陷於非常悲慘狀態裏。盧瑟發爾得（Luckenwalde）市當局官吏報告說：織布業所使役的兒童裏，陷入在道德的墮落狀態裏的，為數極多。

萊因省的有人道的廠主，一八三九年在報上對於這個問題，警告大家；萊因地方議會，要求制定產工的法制；而政府不過按照「工廠使用童工之規定」，禁止工廠，鑛山，鐵廠，鑛鐵所等使用未

滿九歲的幼童工作；未滿十六歲童工的工作時間，限定在十小時以內。而且這個規定，還充分含有軍事意味的作用的。

四

工資勞動者所經驗到的苛酷的狀態——最低程度的生活，失業，而且可怕的窮困，飢餓，疾病，普及廣泛的範圍，喚起了社會運動。可是，當時工資勞動者常常缺乏階級的明確性；甚至在階級運動上，也缺乏明確性，不安和動搖，支配了他們。

十九世紀前半期，工資勞動者階級，無論量的方面或質的方面，行會制度的組織勢力，實在很旺盛的。加之，爲了在意識上它的感化，相當強大；所以勞動者階級之階級的自覺和意識，不能免除它的影響。其中，尤其是被行會制度所組織着的家庭工業勞動者，還承認它的對立物爲老闆，甚至還擁護那束縛自己的行會制度的桎梏。他們的社會的理想，是變成那常常在眼前浮動，片刻不能忘懷的小老闆或小資產階級。

另一方面，當時的工廠工業的勞動者，在數量上也是少數，政治上也力量微薄，尚未具有階級運動的明確的認識，計劃和指導。他們經濟的政治的要求，還不是一貫而合目的的強有力的。

根據當時歷史敘述家李爾（W. H. Rieh）和國家學者伯倫知里（Bluntschli）的意見：所謂「第四階級」並不是怎樣統一的從社會的民族的階級所產生的階級，祇是從整個身分階級脫落的產物，全階級被粉碎了的要素的匯集而已。這兩者的觀念，或多或少的風靡着三月革命前夜的觀念界。

十九世紀前半期，工資勞動者階級的支配的部分，是手工業勞動者。這種手工業的職工，還未曾充分清算了行會制度的關係。有時候，被那接近於行會制度的家庭工業勞動者的反動觀念所捉住，甚至主張復歸到資本主義以前的工業，廢止機械，恢復徒弟，職工，老闆的舊的經歷，和徒弟職工的義務！

剩餘的手工業職工，所以還被這種後遲的觀念所拘束，另外一個原因，那是階級構成使然的。當三月革命逼近在眼前，法蘭克福全部職工階層，還居住在經營者的住宅裏。少數自覺的職工，開

始了形式的階級鬭爭。爲了確保其固有權利，他們不得不離開經營者的住宅了。所以，「行會制度解體的歷史，一部分也是無產階級階級意識成立的歷史」(Kampfneyer)。

開始是斷片的自發的階級鬭爭，以後變化成統一的大規模的了。這時候，絕對主義的反動政策，使國內的運動，負偶於所謂意識的領域；或者釀成國外鬭爭團體的發酵。這就是多數被放逐到國外的急進主義的勞動者，職工等，主要移住到巴黎，倫敦和布魯塞爾，認識空想社會主義的教義，造成結社或同盟，從國外向德國國內實行社會主義的宣傳。有許多人，把社會主義乃至自由思想，帶到故鄉來宣傳了。住在國外的，主要集中在瑞士和巴黎，組織德意志人協會(Association patriotique allemande)，結成亡命者同盟(Bund der Geächteten)，正義者同盟(Bund der Gerechten)。亡命者同盟是由同情於傅立葉(Charles Fourier)主義的德國民主主義者維涅第(Jakob Venedey)，和社會改良主義者修斯塔博士(Theodor Schuster)所指導的。和它相關聯着，組織起「人權協會」。上述兩個協會分成左右兩翼，其中左翼在修斯塔博士指導之下，組織正義者同盟，這在起初是共產主義的空想主義的，以後變成共產主義的革命主義的，

終於轉化成共產主義同盟 (Bund der Kommunisten)。

這些國外團體裏最有勢力的正義者同盟，自從修斯塔博士引退以後，得到德國裁縫工威德林 (Wilhelm Weitling 1808—1871) 的活動的幫助不少。

威德林被稱為德國共產主義之父，他在一八〇八年十月五日，生於馬德堡，是法國士官和德國婦人的私生兒。為縫工，生長於貧困中。一八三五年，離維也納，而到巴黎，着手正義者同盟的基礎的活動。這時候，以及在以後，追放和旅行，坐獄和煽動上，把全部生涯，在漂泊裏消磨盡了。他的事業的目的，據他自己的話說：是地上的完成裏成熟的人類；而所有的共有，是它的成果。人類共同生活的規矩，是自然法則和基督的愛。他不僅一方面在基督教強烈的影響下，另一方面，還貶低工廠勞動者積極的意義，反映出手工業職工的性質。晚年和勞動運動遠離，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在紐約永眠了。

科學社會主義的創立者馬克思 (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生於特里爾 (Trier)，一八四二年充任科倫創刊的萊因新聞的主筆，開始了社會主義的活

動。一八四三年赴巴黎，翌年發表德法年鑑。從此開始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協力之下，一八四七年組織了共產主義同盟 (Bund der Kommunisten)。

馬克斯和恩格斯在勞動運動上的意義，更確切地說來，在於把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兩者相融合了。可是，當「三月革命」前夜，共產黨宣言的根本命題，還不曾廣泛地浸透着勞動階級。

這事說明了當時勞動階級社會構成的性質。工廠勞動者在數量上還是少數，又被和平主義空想社會主義所浸潤。可是這並不會變更了社會的和經濟的矛盾之消極要素——工資勞動者的特質。

五

工廠工業不發達的結果，一方面引起工廠勞動者的貧弱，他方面也阻止了資產階級的進展。這已經說過了。「三月革命」時的資產階級，不僅在數量是微少的；而且多分帶着手工業的色彩。因為大部分的大經營，是在手工業經營者的掌中。他們還相當地殘存着領主的地主的特徵。所以，

資產階級在十九世紀前半期，可說是還不曾充分完成了階級的分化。

銀行資本還不曾充分獨立，因之也看不到銀行家的發生；工業資本裏，也有類似的狀態；手工業組織裏，多數場合，商人和經營者是同一的。

工資勞動者悲慘的狀態，一半責任不得不由資產階級負的。可是，那怕用了這樣犧牲，資產階級所受的利益，還是非常被限制了。這是因為第一，給予這種犧牲的其他階級，不得和它共分利益。第二，他們自身蒙受許多限制，自由的活動被束縛了。所以，一直到三月革命，資產階級也還不失為社會矛盾的消極要素。

身分階級的束縛，和絕對主義國家的統制，就非阻害資產階級的發展不可。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就對之而誕生了。小邦分立的經濟政治的地方分權主權，使資產階級只好侷促於狹隘的天地裏。資本主義工業全面的發展，在既存的無數關稅障壁之下，是不能想像的。資本主義的工業，爲了販賣大量生產的商品，就必要更廣泛的沒有障壁的經濟領域。於是，資本主義國家統一的機運，就醞釀成熟了。資產階級感覺到自己力量，縛住商品交易和實業的供給力，作爲階級的共同行動。

的束縛，早就不能長此再忍耐了。

然而他們是無力的。他們雖然懷望着解除束縛，可是那怕到了三月革命，他們所必須的經濟和政治的德國統一，未曾在資產階級的自由的基礎上實現之前，在政治的意味上，是不能立待而到的。

小資產階級數量上雖占多數，可是被日趨發達的資本所壓迫，在法制上也是無力的。所以他們「懷着不滿，對於租稅及其他業務活動上障礙的活動，到處表示不平，而關於確保在國家和社會上地位的改革，連一定綱領也沒有的」（恩格斯）。

他們還「大言壯語，呼求暴動」，可是「武裝暴動一引起重大的危機，他們對於陷入進去的危險情勢，就感到最大的恐怖。在他們自身，他們的社會地位，他們的財產上看來，對於當然應得產生的結果的恐怖，他們首先感覺到了。」所以，他們有時和革命攜手，有時贊助政府軍來對待暴徒。上述階級對立的激化，和政治騷亂的事情，愈益增加；一八四六年的飢饉，和第二年的恐慌，更使階級矛盾激化了。這樣情勢之下，巴黎二月革命不會不在德國引起巨大反響的。有歷史意義的

三月革命，就終於到來了。

可是，新興諸階級之經濟的和社會的權力，缺乏那完全顛覆身分制度的力量。不管這樣，各階級還是揭出各自要求而突進了。資產階級要求憲法，出版集會及結社的自由，德國國家的統一，這是受到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所支持的。農民自動要求廢除那架在身上的封建重荷，而躍起了。要而言之，構成反對陣營的，是一羣異質的大衆；受各種利害所推動，而或多或少的都被資產階級——其中以普魯士的資產階級，特別是萊因省（Rhein-Provinz）的資產階級，站在最前鋒——所統率的。

封建階級因而被顛覆，新的階級掌握政權了。而「一個異質的大衆」的暴動所獲得的權力，卻並不在自己手中。實際上掌握政權而出現的，是資產階級。而且，在革命進行之中，發見了無產階級可怕的姿態，資產階級就迅速地和封建勢力相妥協，而背叛革命了，進而運用那剛才得到的權力，運用那從無產階級和革命的小資產階級那裏奪取來的權力，掉轉來對付他們。反動勝利了。可是，在革命的餘燼中，還能看得到無產階級運動的自主權的確立。德國勞動者工會在一八四八年

八月組織成了革命，終於以未完成的資產階級革命而告終局。

雖然這樣，封建的重荷，和行會制度限制之部分的廢止，使德國資本主義以後的發展，容易進行。而同時，實業革命的時代便告開始。

第九章 實業革命和工業的發展

一

三月革命完成其歷史的任務而告終局，實業上和政治上的狂飆時代就開始了。工業急激的進展，商業潑刺的發展，和政治統一的動向相共，使後進農業國的德國面目一新，成爲新的工業國家，更逐漸成爲高度的工業國家；往年是入超國家，現在一躍而確保着出超國的地位；關於國家統一之政治經濟乃至文化的運動，就澎湃而風靡一世。

這種發展，必然的伴隨着各種社會運動。國內和國際的勞動運動，到了這時代，突然增強勢力。以國家主義和帝國主義爲基礎的獨占資本主義，終於達到頂點，陷在不能避免國際間相互衝突的狀態裏了。世界大戰之前時期，爆發導火線的實業革命，究竟怎樣發生的呢？

德國資本主義的發達，要比英法遲得多，這非有何種必然性不可。而同時，和三月革命的結局相符合，實業革命終就襲擊着德國，也一定有何種必然性存在的。

德國實業革命為何要比英法遲半世紀到一世紀纔就緒呢？現在，可以從消極的積極的兩方面，來觀察這個歷史的必然性。一般地可以舉出來當作消極的原因是：第一、封建諸關係的廢止較遲；第二、因為國內小邦分立，有關稅制度及其他限制存在；第三、海外殖民和貿易上，商業資本的蓄積量，頗為微少；第四、金融資本——特別是銀行組織——未曾充分發展。在三月革命前後，封建權力還依然強大，經濟上掌握着資本主義的勢力，政治上拒絕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是充分的。正像上面所說的，德國資本主義在封建權力的重壓之下，僅能侷促發表罷了。

在這樣範圍內，縱使暫許資本主義的浸潤，然而還存有強力的舊封建諸關係。作為逼使實業革命落後的重大契機，這是明白的事。三月革命的結果，這點發生顯明的轉化。雖然是部分的，可是封建諸關係中，有的被廢止。有的緩和了。比這更加重要的，是和它對立的資本主義諸關係，被給予安定穩固的基礎了。

國內小國分立，因為各國掌握着關稅制度及其他權利，阻止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明白的事。資本主義在分立的小領域上，是不能發展的。爲了資本主義的進展，就感到有打破地域的及附隨而來的各種障礙的必要。一八三〇年代的中葉，相繼而起的關稅同盟的締結，和鐵道的開通，是給予資本主義活動地域的二個決定的契機。

關稅同盟使小國分立推進到國家的統一，幫助了資本主義的國內市場的形成，以此開始，直到一八七〇年代之間，郵政同盟，陸路連絡同盟，內河海岸的連絡，鐵道和電報協定，共通的德國證券法和德國商法的制定，都相繼成立了。

所以，實業上的許多限制的撤廢，以及因之國內市場的發展的原動力——交通制度及交通機關的變革，跟法制的變革，共同發揮重要的作用，這是不可爭論的事實。這不僅對於國內市場的發展爲然，那怕對於資本主義進展的不可避免的條件——國外市場的增加，也可以這樣說的。

國內和國外市場的確立和發展，跟實業革命的發生和進展，保持着相互關係。現在小國分立所附隨着的實業上的桎梏，已被撤廢；代之而起的，卻是積極的條件的成立，愈益助長它的機運，在

這樣狀態之下，三月革命告終了。

二

德國社會經濟的特異性——資本原始蓄積的微小，商業資本因海外貿易和交易的不振，故而畜積者和蓄積量都是微少的，這是延遲實業革命的契機，實是明白的事。

僅僅靠農產物輸出而獲得資本，這雖然是有，但當作實業革命的原動力，未免是太微少了。上面已經說過，對於專制政治的宮廷和軍隊的巨大資金，愈益增加的租稅負擔和國債，特惠保護的經濟政策的費用所必要的巨大資金，變成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巨大刺激，這也是事實。

同時，德國國內採銀量，有累年增加的傾向。從一七六七年到一七七一年，夫賴堡鑛山的產量，計十三萬一千二百〇五銀馬克，薩克森及其他鑛山，共產二萬一千六百二十四銀馬克；從一七九六年到一八〇一年，前者產銀達二十四萬一千二百九十九萬銀馬克，後者達三萬六千三百九十七銀馬克。另一方面，資本流入德國，採取下面行態而活潑地進行了。第一，由於到德國來的僑民的媒

介。漢堡有八千到一萬法國人，阿爾多那 (Altona) 有四千法國人；再加上富裕的荷蘭人；這些僑民決不是空手來的。

第二是戰爭賠款。是英法戰爭，由法國所支付的。普魯士先在一八一五年，就收進一百萬法郎。此外，據古斯塔夫·居里希說，十八世紀中葉，獻給德國諸侯政治家 and 學者的補助金和賄賂，法國所付的數達一億三千七百二十二萬六千一百五十二里孚爾 (Livre)；英國數達四千六百六十九萬六千五百七十六鎊。把它換算成二十世紀的市價，實相當於十萬萬馬克。這樣被蓄積着的資本，自然有一部份用在直接剩餘價值的生產，有一部分轉化為金融資本，因之刺激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不待說的了。

不過，這個刺激祇是側面的，要強有力的驅使實業革命的原動力，還不充分的。因為臨近三月革命，愈趨深刻的政治的不安，資本的不少部分，不在實業界活動，徒然在窖中死藏了。三月革命的餘燼歸於平靜之後，政治的因之引起社會的安定，和數年來浸潤全世界的各地豐富產金相併，使巨量存款擁入德國諸銀行了。

光是普魯士銀行，從一八五一年一月到八月間，存款從四百七十五萬泰來，(thaler)增加到九百三十三萬泰來。該行不知道利用增加的存款，在一八五一年十月一日，取締收受存款了。而同年十月一日，庫存現金達到一千〇八十萬泰來，到了十月三十一日，更達二千三百七十萬泰來了！

隨着三月革命的終結，被貯藏着被蓄積起來的資本，終於開始活躍的時代到來了。營利的心，獲得的慾求，企業精神的醒覺時代到來了。因為政治不安而後退的資本主義的精神，終於突破提防，迸發出來；尤其是因為法國拿破崙三世的政變，和德國國內反動的勝利，伴隨着強大的呼聲而流出了。

三

這樣，實業革命成立的消極原因，一到了一八五〇年代，不僅大部分消解了，而且這許多要點，迅速變化成惹起實業革命的積極契機。此外作為積極的契機的，還不得不提及機械和技術的輸入。先進各國的實業革命，有賴於機械和技術的發明；反之，後進國的德國，卻賴輸入它們來享受可

以利用的便利。

從英國輸入機械，和招聘熟練工到西利西亞和薩克森來，早已進行；這已開始實業革命的幕了。英國所發明的蒸氣機，早已傳到德國各地，應用於礦山和紡紗等業。其他各種發明和發現，立刻被移入被運用了。

要而言之，上面是德國實業革命的發生上所伴隨着的地域的和歷史的必然性。

實業革命向德國襲來了。比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各國落後半世紀到一世紀或三十年到八十年的德國實業，到現在纔進入了疾風暴雨那樣時期了。

德國這樣的後進性，一方面也使進展過程具有特異性。這第一，蒸氣機械的採用，較其他先進各國稍早。因之，接續着所謂第一次實業革命，就產生第二次實業革命了。這是因為有專門從外國輸入發明的便宜。另一方面，先進各國化費一世紀到一世紀半的過程，而德國被迫着僅在半世紀裏完成了，結果，所有實業部門都要求迅激的發展。這一期間，某些實業部門，竟至凌駕先進各國，獲得領導地位了。

實業上最顯著的變化。尤其要算生產方法，經營組織的迅速的變化。工廠工業雖本已存在，但勢力尙微，手工業佔着支配的地位。需要上市場的成立，和機械的採用，共同要求有大量生產可能的工廠工業之興起。於是，工場手工業便開始退卻。過去，工廠工業和工廠手工業，是互相剋制，各照各的道路推進的。然而工廠手工業因爲：第一、經營者畏懼那工廠工業的冒險性；第二、資本缺乏，使改變爲工廠工業，頗爲困難；第三、家庭工業的勞動者本身，不能實行別的變更。在這一期間，它還占支配的地位。

可是現在，全部條件都變更了。西利亞織工的暴動，早已說明手工業的悲慘的命運。一切部門，凡處在競爭地位的手工業，都給工廠工業所蠶食了。凡不處在競爭地位的手工業，特別是不能純粹用機械來生產的，或是需要技藝或鑑賞的手工業，最後還殘存着，或新被改造了。於是，工廠工業登上光榮的勝利地位。

四

要而言之，十九世紀後半期，德國工業的歷史，就是工廠工業的組織，驅逐了手工業的組織，和走向經營組織及技術的高度形式的改造歷史。因之，從事工業的人口，就顯著增加。每千人口中從事工業的成數，有如下變化；

一七〇七年	五七人
一七七五年	六五人
一七九一年	九三人
一八四六年	一二二人

前二者是普魯士的平均，後二者是全德的平均。

我們可以知道從事工業人數，有顯著的增加。尤以工廠工業的領域上，增加得特別顯著。工業勞動者人數當「三月革命」時候，數量還依然微少的，現在就參加關稅同盟的領域裏，有如下急激的增大；

一八六一年	五一、〇〇〇人
一八八二年	三五六、〇〇〇人

一八九五年	五八二、七〇〇人
一九〇七年	一一二〇、〇〇〇人

再就從事工業每千人中觀察起來，因經營大小所占成數的不同，可用下表表示出來：

	五人以內	六人——五〇人	五〇人以上
一八八二年	五五一	一八六	二六三
一八九五年	三九七	二三八	三六三
一九〇七年	二九五	二五〇	四五五

從上表看來，大經營所容納的勞動者人數和小經營相比較，可知一八八二年的相互的關係，到一八九五年緩和些，再到一九〇七年，達到相反的關係了。這是在說明資本主義經營組織的進展。

再就蒸氣發動機的增加，來觀察這種關係。上面說過，一八三〇年代中葉，甚至連德國有力的

工業之一——紡紗業裏，也幾乎看不到蒸氣發動機的使用；可是一到一八五〇年代，各種部門都能看到採用蒸氣機的急激增加。主要蒸氣機械的馬力數，在普魯士的情形如次：

一八四六年	七、〇〇〇馬力
一八五九年	六二、〇〇〇馬力
一八七五年	二五〇、〇〇〇馬力
一九〇〇年	三、七〇九、〇〇〇馬力
一九〇八年	六、三七二、〇〇〇馬力
一九一四年	六、四九三、〇〇〇馬力

實業革命頂熱鬧的舞臺，要算工商業的領域了。在十九世紀前半期工業裏，具有最重要性的紡織業，一到了後半期，就把地位讓給重工業了。其中站在先導地位的是礦山業。煤產量就普魯士而言，一八四三年計三百十萬噸，全德——包括盧森堡（Luxembourg）在內——的產量數字如下（單位噸）：

一八六〇年	一六、三七〇、五〇〇噸
一八七〇年	三四、〇〇三、〇〇〇噸
一八七一——一八七五年平均	三四、四八五、四〇〇噸
一八八一——一八八五年平均	五四、四六〇、八〇〇噸
一八九一——一八九五年平均	七四、九七〇、一〇〇噸
一九〇〇年	一〇九、二九〇、〇〇〇噸
一九一〇年	一五二、八二七、八〇〇噸

根據夫雷格爾的調查，煤的產量如下：

一八六〇年	四、三八二、七〇〇噸
一八六六年	六、五三三、一〇〇噸
一八七一年	八、四八二、八〇〇噸

一八七一年以後，其增加如下：

一八七二——一八七五年平均	九、六七二、二〇〇噸
一八八一——一八八五年平均	一四、一六九、三〇〇噸
一八九一——一八九五年平均	二二、〇二七、一〇〇噸
一九〇〇年	四〇、四九八、〇〇〇噸
一九一〇年	六九、五四七、三〇〇噸

煤和燭煤產量的增加，和鐵道擴張，汽船加多，熔鐵爐採用煤的增加，蒸氣原動機的增多，充作家用燃料的增加，都有相互關係。所以，對於實業革命的作用，是極為重大的。

現在，鐵礦的產品，可用下列數字來表現：

一八六〇年	一、四〇八、八〇〇噸
一八六六年	二、九九六、〇〇〇噸
一八七一年	四、三六八、一〇〇噸
一八七一——一八七五年平均	五、二六一、八〇〇噸

這樣，礦山產品的總量，其數字如下：

一八八一——一八八五年平均	八、五五六、八〇〇噸
一八九一——一八九五年平均	一一、六七九、二〇〇噸
一九〇〇年	一八、九六四、三〇〇噸
一九一〇年	二八、七〇九、七〇〇噸

一八六〇年	一八、八五三、九〇〇噸
一八六六年	三二、二八三、〇〇〇噸
一八七一年	四三、五七五、七〇〇噸
一八七一——一八七五年平均	五一、〇五六、九〇〇噸
一八八一——一八八五年平均	八〇、二三〇、三〇〇噸
一八九一——一八九五年平均	一一二、六三三、八〇〇噸
一九〇〇年	一七四、六六六、八〇〇噸
一九一〇年	二六三、一六七、三〇〇噸

這是因為熔鐵爐的裝置和方法的改善，伯賽馬法（一八六一年）馬丁法（一八六八年）的輸入，以及其他冶金上技術改善的結果；鐵工業特別繁盛，結果，生鐵產量可驚地迅速增加了。下表示着生鐵產量的增加。

一八六〇年	五二九、一〇〇噸
一八六六年	一、〇四六、九〇〇噸
一八七〇年	一、三九一、一〇〇噸
一八八〇年	二、七二九、〇三八噸
一八九〇年	四、六五九、四五一噸
一九〇〇年	八、五二〇、三九〇噸
一九一〇年	一四、七九三、六〇〇噸

（上表包含盧森堡在內。）

在一八八〇年，英國生鐵產量七、八〇〇、二六六噸，德國僅有二、七二九、〇三八噸。到了

一九一〇年，德國已達一四、七九三、六〇〇噸，凌駕英國的一〇、一七三、〇〇〇噸。要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紀後半期開始進入實業革命時代的德國，不得不說是有特別顯著的進步的。

這時候，擁有屬於鑛山業和鐵工業的巨額資本的企業團體，到了一八九〇年以後，特別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了。關於和上述鑛山工業有關係的股份公司數，大概如下：

公司	數	股份資本
煤礦股份公司	一四六	八四四、八八(百萬馬克)
冶金股份公司	一七八	一、六二〇、一一(百萬馬克)

其中，一一五家煤礦股份公司和一四二家冶金股份公司，在一九〇一年以前就已設立了。這些企業團體的代表，博斐梅爾公司，菲尼克斯公司，龍巴西亞公司和上西利西亞鐵工業公司等。煤產量和生鐵生產的增加，另一方面就促進機械工業異常的發展。十九世紀的機械工業，據萊說：「幾乎是從一無所有的狀態裏建造出來的。」當十八世紀末，用手工業形式，從事機械即水車或機座的製造的，祇不過幾百人罷了。以後，隨着關稅同盟的確立，和使用機械的大經營的浸潤，

它的數量就逐漸增加了。一八六一年已有五萬一千個製造機械的人，一八八二年達三十五萬六千人，一八九五年五十八萬二千七百人，一九〇七年一百十二萬人。機械工業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七年之間，實在是發展頂急速的工業。其生產量在戰前已達三萬萬六千馬克到四億馬克，和棉製品產量，同居德國輸出品數量中之首位。

一九一〇年，機械工業股份公司的數量和資本，約如下表：

公 司 名 稱	公 司 數 目	股 份 數	資 本
一般機械製造公司	四八五	八三四·二七	百萬馬克
造船公司和船塢公司	二四	六九·八四	
光學機械精密機械製造公司	二七	三六·〇五	
樂器製造公司	六一	六五·九五	

次於鐵工業而得勢的電氣工業，特別要到了十九世紀末，纔進入迅速進展的過程，以拉德腦 (Emil Rathenau, 1838—1915) 爲領袖的普通電氣公司 (Allgemeine Elektrizitätsgesellschaft)

schaff) 終於在一八八七年設立了。到了一九一〇年，合計有電氣公司一九五家（一九〇一年以前，設立的有一二三公司，以後設立的有七二公司），股份資本，數達十二萬萬馬克。

同時，形成一個重要實業部門的化學工業，在世界市場上確保住獨一無二的地位，尤以機械工業以及製糖工業等，都被認為德國輸出工業的重鎮。化學工業的勞動者，一八六一年二三、六〇〇人，一九〇七年達一七二、〇〇〇人，年產量超過了十萬萬馬克。僅煤膠 (Farr) 染料一項，戰前每年輸出一萬萬二千五百萬到一萬萬三千萬馬克。尤其要算那給染色工業以一大改革的安尼林染料的鍊出，和藥品工業的發展，使德國化學工業，呈現着名實都執全世界牛耳之偉觀。

五

因機械輸入和技術改善，而獲得頂驚人發展的，其一便是纖維工業。其中要算棉紡業占了德國工業的頂重要部分。棉紗紡織的總噸數，有如下表（原位噸）：

德國棉紡工業

年 份	國內生產的	輸入進來的
一八五五——一八六〇年	三七、二二三	二六、一四四
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	三七、四六五	一一、三三〇
一八六六——一八七〇年	五四、六二五	一四、八一四
一八七一——一八七五年	九三、一一二	二一、六七八

一八七一年亞爾薩斯·洛林的合併，對於棉業有重要意義。棉紗紡織在萊因省（Rhein Provinz）西利細亞巴威鄂爾登堡和巴登等處，最繁盛因為由英國所輸入的技術的改良，一八三六年有二四·九百萬磅的生產量，一八六一年就達到六八·八百萬磅了。

在萊因省和韋斯德發楞兩地，當一八四三年到一八六一年之間，總錘數從一一一、七九九增加到二九九、四一三；而且小經營也從一二〇減少到四三個了。

織布工業在一八六一年，小經營有織機一五一、四五一台，老闆七七、九一五人，職工八〇、三八七人；而在九四〇家的工廠裏，有機械織機三三、四九一台，手搖織機一三、〇〇〇台，從業

者三四、六六三人。小經營的織布工業，卻逐漸式微，下表表示着衰退的情形：

德國織布工業織機數

一八七五年	九三、五〇一台
一八八二年	四八、九九九台
一八九五年	二八、九九七台

現在。說到毛紡業和毛織工業。一八六一年，一〇六七家毛織工場，有二、五九二台機械織機，一一、八一八台手搖織機，其他六二二個毛織所，有三、六五五台機械織機，九、〇六八台手搖織機。可是，就在毛織業，手工業的經營，也像下表那樣減少了：

一八八二年	三八、〇九一台
一八九五年	三一、四〇四台
一九〇七年	一六、五四九台

可是，這一期間，勞動者人數增加四分之一，機械織機支配着經營；在一八八〇年到一九〇五年之間，輸出從一萬萬一千九百二十萬馬克增加到了二萬萬五千一百二十萬馬克。

絲織業的中心地，是科倫，繆爾哈姆（Mülheim）尤其是包含瓦來斐爾特在內的萊因省；一八六一年，家庭工業有三二、八八二台織機，而三一四家的工廠，有一、二七〇台機械織機，和五、三九二台手搖織機。

縱使在織綢工業，舊式工業也迅速地衰退，一八八二年到一九〇七年間，大約減少了三萬台的織機，和四萬四千個勞動者。

反之，工場勞動者在這期間，竟達家庭勞動者之五倍左右。然而，受到工廠組織的浸潤較少的，是亞麻業。一般上說來，它的消費是有待於農家需要的；因之，就作為農家的副業而殘存着了。

第十章 實業革命時代的農業

—

農業到了十九世紀後半期，採取着怎樣的變動過程呢？因為這個時期，從後進的農業國向繁華的工業國躍進，所以德國農業把它先導的實業地位，讓給工業了。

農業人口對於全體人口所占的比例，在普魯士發生如下的變化：

一八一六年	七八%
一八四九年	六四%
一八六七年	四八%

整個德國的以後的變化如下：

一八八二年	四二·五%
一八九五年	三五·八%
一九〇七年	二八·六%

從上表看來，也可以看得出德國農業重要性的減少的。和其他實業部門疾風暴雨那樣的變動比較起來，農業變動的程度和性質，也不免是微弱的。實在說來，德國農業的外部構成，整個十九世紀幾乎不會變化。

譬如，土地所有關係，就是到了十九世紀末葉，還繼續着過去的社會狀態。農民解放結果所產生的情形，大體上可以分成三個地方。即在易北河以東的地方，領主的大土地所有是占支配的地位。二〇〇公頃以上的所有，占全面積三分之一，不僅如此，在薩克森和西利細亞，占五分之一；波森 (Posen) 和蓬麥倫 (Pommern) 實占全面積的一半。

其次，所有着二〇——二〇〇公頃的富農（領主）所在的地方，即在什列斯威希霍爾斯太因 (Schleswig-Holstein)，漢諾威，韋斯德發楞，鄂爾德堡，布藍士外克諸地，富農所有地，占全面

積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最後，主要是德國西南地方；在這裏，小農，某些地方是極零細的小農經營，占着支配的部分。

要之，德國是一個土地所有集中在極少數人手裏的國家；一〇〇公頃以上的土地所有，掌握全面積四分之一，二〇〇公頃以上的掌握五分之一，五〇〇公頃以上的掌握着十分之一。

這種狀態，就是到了十九世紀末，也沒有什麼大變動。所有關係上幾乎沒有變動，同時農業的經營關係上，也沒有顯著的變動。然而，這並不一定德國農業內部構成的變動的。

部分說來，關於土地的過去的觀念，同時產生新的觀念了。純粹當作土地的位置和營養物來源看的土地，多少不得不資本主義化了。這是必然的，因為大土地所有者之中，產資階級增加了。而且因為土地所有者吸收資本，這種傾向更被促進了。另一方面，租佃制度的浸潤，也是資本主義組織增加的前兆。

所以，走上衰退路上的德國農業，也被迫而資本主義化；過去的經營方法和經營組織的農業，突告消滅了。

這時期農業的法制關係的變化，也並不顯著。三月革命（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結果，殘餘的封建義務，部分的被廢止；法律的桎梏，稍被減輕了。勞動方法是多種的，且時時變更了。農業勞動者的工資，在十九世紀前半期，雖然幾乎沒有變動，可是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特別是一到了一八六〇年代，受到工業等迅速發展的影響，開始是慢慢地，接着就迅速上漲了。而且，過去占支配地位的現物工資，也逐漸消影匿跡了。

到了十九世紀末，共有地的分割，雖快告終結，但在德國西部，卻還保留着不少的共有地。森林的共有地，由一八八一年三月一四日法律規定加以維持，甚至連設立共有地的反動運動也發生了。此外，地役權及其他關於土地的法律，或者部分被改善。或者為政治家所注意，或者被要求改善了。

二

上面說明了農業的經營關係，所有關係和勞動關係的大概情形；現在試來觀察農業推移到

新經營組織的過程，和生產的增加。首先我們要知道，農業也像其他各種實業一樣，實行經營組織的改變嗎？從工業開始，不論商業交通，有經營的擴大和強化的傾向。可是和這些產業同樣範圍同等強度的變化，在農業是少有見到的。

很明白的，農業裏所謂大經營，只能存在於非常被限制的形態上。經營規模的擴大，或愈趨擴大的傾向，在德國農業是不能看到的。一〇〇〇公頃以上的土地，已經要算例外了。土地所有分散到遠方，是反乎經營上利益的；要超越一定的地域，更不可能了。

農業的經營組織，其所以缺少變動，這是農業在實業上的地位和特質，所引起的必然結果。和普通農業同時並存的，如像農產物加工的其他農業部門，就能得到類似其他實業部門的變動了。譬如像生產乳酪或釀酒等，就能發現和普通農業不同的過程。它們多多少少都由大經營來生產的，或者具有這種傾向；雖然它偶而有採取實業合作社的形態，可是這決不是原因；就是不採取這種形態，也充分能夠建立在資本主義基礎之上的。

乳酪合作社在一八九〇年有六三九個，到了一九一〇年實達三，二三〇個。每合作社平均社

員數從一八九二年到一九一〇年間，由四五人增加到九七人。合作社所收受的牛乳量，達二五萬萬公升 (Liters)，價值二萬萬一千二百五十萬馬克。乳酪合作社是實行大經營的。釀酒合作社在一八八〇年有一四個，一八九〇年二九個，一九一〇年將達二〇〇個；它的規模雖是小經營，可是它的意義卻決不小的。

上面說過，某種農業裏，大經營要建築在資本主義基礎之上，纔有可能，在合作社是不可能的；可是那怕如此，合作社在一般農業上的作用，實在重大。由於合作社，農業的小經營，纔能照舊被維持，作為實行某種統一的實業活動的大經營的一個部門。而事實上，到了十九世紀末葉，特別是一進到一八九〇年代，合作社的發展，在農業裏很是迅速。

舊有的農業裏，因為它的特質，不能容許資本主義經營形態的大經營；可是，農業的自然條件，即整個生產過程上分業的不可能，在德國也發生決定的作用。而且，在拒絕轉化到大經營的小經營之間，技術的分化和專門化，也因其實業種類之不同，幾乎是看不到的。各小經營內部，生產各種各樣的農產物，在十九世紀初期，是不勝枚舉的。

因之，各經營之間，也不能產生技術的統制和結合。德國農業當十九世紀後半期，在變動過程上，一方面雖有許多消極的特質，但也有積極的一面，這是不得不注意的。

三

助長德國農業積極變動的另一機關，是農事協會的發達；它在農業技術上教育的意義，是不可抹煞的。農事協會在一八四〇年代發生於普魯士，到了一八七三年，變為廣及全德的組織了。它的主要任務，是設立農業化學研究所，巡迴教育制度的指導，扼要說來，是傳播農業上有用的智識；對於近代式農業的發展上，它的幫助是很大的。

這種研究設施，和大學裏關於農業科學的進展，由於教育的企圖和目的，愈趨完成。所以，大經營化的經營裏，就有承受科學成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適應着感到痛切要求的初等和中等的農業教育的設施的需要，就造成獲得農民所必要的農事智識的機會了。

適應着農民各階層來滿足其要求的各種教育組織，譬如像大土地所有者和富農的農事學

校，小農的農業學校和冬季農業學校，都設立起來，作為它們的補助的設施，又建立起農事補習學校和巡迴教育設施。

以後，農事研究設施，被統制於國家的統一之一，肥料栽培及其他，各方面都提高研究的效果。結果，農業的合理化進展，特別是栽培上的改善，形成全部經營進步發展的重心點。栽培上的改善，使十九世紀農業的面目，煥然一新。從三圃農法轉化到輪作農法（莖類和葉類野菜的現代式輪作），決定地實行了。肥料的改良，形成農業技術進展的重要的一部分。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有增加傾向的家畜的增大化，使有獲得豐富肥料的機會。

可是，肥料改善上更有決定作用的，是人工肥料；利比希（Justus Liebig 1803—1873）的功績，就更加發揮了。人工肥料第一是磷酸；最初是輸入磷酸鈣，以後用其他磷酸鹽來代替，最後作為柏賽馬法馬爾丹法等生鐵精製的副產物，它的四分之三製成托馬斯磷酸鹽了。

次於磷酸鹽的人工肥料，是加里鹽類；德國受到這種鹽類的惠施；它的生產量如次：

德國加里鹽的生產

	重	量	價	格
一八六一年		二、四〇〇噸		四二、〇〇〇馬克
一八七〇年		三七五、三〇〇噸		三、三五八、〇〇〇馬克
一八八〇年		六六五、九〇〇噸		六、七八三、〇〇〇馬克
一八九〇年		一、二七四、九〇〇噸		一六、五〇五、〇〇〇馬克
一九〇〇年		三、〇五〇、六〇〇噸		三九、一一一、〇〇〇馬克
一九一〇年		八、三一七、七〇〇噸		九一、三五七、〇〇〇馬克

硫酸銨也有重要的意義。智利硝石輸入量，一八七八年計五〇，九一八噸，一九一一年七三〇，九三九噸；價值一三五，二二四，〇〇〇馬克。

四

完成德國農業技術上變革的另一端，就是機械的採用。那怕在農業，機械的採用也逐步進展；

這個時期，蒸氣的偉力，在農業上也盡量被發揮了。下面的統計，正在證明着。

德國機械技術的發展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五年	一九〇七年
打穀機	二六八、三六七架	五九六、八六九架	九四七、〇〇三架
蒸汽打穀機	七五、六九〇	二五九、三六四	四八八、八六七
播種掘地機	—	一四〇、七九二	八三、一二五
刈割機	一九、六三四	三五、〇八四	三〇一、三二五
播種機	(六三、八四二)	二八、六七三	二〇六、九一四
肥料撒佈機	—	一八、六四九	?
蒸汽機	八三六	一、六九六	二、九九五

(註)一八八二年中，播種機數包括播種掘地機在內。

一八九五年，五——二〇公頃的小經營，有百分之四五·八，是採用上述機械的，到了一九〇二年，增加到百分之七二·八。屬於這一級的經營，所採用的刈割機和打穀機，其數如下：

年 份	刈 割 機	打 穀 機
一八八二年	一、四九三架	一七三、三七七架
一八九五年	六、七四六架	四二七、八六九架
一九〇七年	一三三、六二四架	七四二、七二三架

使用機械上發現出更大意義的，是一〇——二〇公頃的大經營；一八九五年占百分之七八

・七九，一九〇七年已達百分之九二・七。

屬於這級的經營，所採用的刈割機和打穀機的數量如下：

	刈 割 機 數	打 穀 機 數
一八八二年	一〇、六八架	一三四、一二二架
一八九五年	一九、五三五架	一二七、三五三架
一九〇七年	一三六、一〇四架	一五九、六二三架

小經營的使用機械，因為合作社的增大和發展，得到實行的可能性；這在上面已經說過了。

實行甜菜栽培的地方，農業的經營，特別發展。因為這種農業，必須慎重的耕種和豐富的肥料。十九世紀末葉，甜菜栽培的面積，突然增加。一八七三年到一八七四年，栽培面積八八，八七七公頃，一八九二年到一八九三年，三五二，〇一五公頃，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一年四四七，六〇六公頃，到了一九一一年，已達四九六，〇〇〇公頃了。一八九五年，二〇〇公頃以下的經營，占栽培面積的一半；甜菜栽培有助於中小經營不少。

牧畜的發展，也不劣於農業。它對於農業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作用，這已經說過了。二十世紀初和十九世紀同期比較起來，馬增加百分之六二，牛百分之七五，豬百分之二五·九，山羊百分之六二·六，但綿羊反而減少了百分之四三。這是因向英國的輸出，到了十九世紀中葉，由於英國內地飼羊而減少了。畜種的改善，賴着曼瑞爾（Menzel），奈都球斯（Hermann Engelhard Von Nathusius 1809—1829），塞德伽斯（Hermann Settegast 1819—1908）等人，奠定科學的基礎，和實際的業績，而進步了。

飼養家畜的主要是德國農業的中小經營，這是顯明的特徵。

五

我們在上面闡明了德國農業所實行的各種合理化。現在不得不檢討它的結果所獲得的成果。無疑地，生產可驚的增加和質的向上，是決定的成績。向近代經營方法的改變，必定要改善了過去耕地的利用，這是明白的事。荒地次第改少，因而耕地就趨增加。一八五二年，普魯士有自然的草地四百二十萬公頃以上；一九〇〇年減少到一百三十萬公頃，因而耕地和庭園，從一一，七〇〇，〇〇〇公頃，增加到一四，七〇〇，〇〇〇公頃。

薩克森在一八四三年，耕地和庭園計有七八五，一八〇公頃，一九〇〇年增加到八四三，七六〇公頃，經過十九世紀，德國耕地實足增加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道生說，德國的耕地，從一八八三年到一九〇〇年的十七年間，有如下的變化（單位公畝）

耕地和園地	一八八三年	一八九三年	一九〇〇年	十七年間的增減
	二六、一七七、三五〇	二六、二四三、二一〇	二六、二五七、三一〇	增七八、九六〇

葡萄園	一三四、六二〇	一三二、五八〇	一三五、二一〇	增 五九〇
牧草地	五、九〇三、四四〇	五、九一五、七七〇	五、九五六、一六〇	增五二、七二〇
牧場及園地	三、四二五、一一〇	二、八七三、〇三〇	二、七〇六、七一〇	減七一九、四〇〇
山林及栽林地	一三、九〇八、四〇〇	一三、九五六、八三〇	一三、九五五、八七〇	增八七、四七〇

即是說，在一八八三年時，全面積的四成五分五釐，是用作耕地和園地的，到了一九〇〇年，它所佔成數變做五成八分六釐；而牧草地和牧場，卻從一成七分二釐減低到一成六分，山林及栽林地，從二成五分七釐增加到二成五分九釐。另一方面，建造房屋用的面積，一八八三年占八分三釐，一九〇〇年占九分三釐。一九〇〇年，約一千四百萬公頃的山林中，四百四十萬公頃屬於園地，有二百二五萬八千〇九十公頃屬於公有，五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九公頃歸屬各種團體；又二十五萬七千三百〇二公頃是皇家所有，六百十萬三千三百六十五公頃是私有的；這實在值得注目的。因之可以知道德國山林之富，和林业林學高度的進步。據道生說明，這些山林之中，在到一九〇〇年的二十年間，約有二百三十八萬公頃，種植森林了。

農產物收穫的增加，不得不列舉其成果的重要部分。經過十九世紀後半期，一般地有趨向於漸增的形勢，據官廳統計，其收穫如下（下表為平均年，單位一〇〇〇公斤）

	一八七八——一八八〇年	一八五八——一九〇〇年	一九〇〇年
小麥	二、四一〇、三八六	三、七六五、四〇七	三、八六一、四七九
黑麥	五、八二、五四二	八、七五二、八七五	一〇、五一一、一六〇
大麥	二、一七六、〇六七	二、九三八、三九〇	二、九〇二、九三八
燕麥	四、五一〇、八六四	六、九〇九、五七九	七、九〇〇、三七六
馬鈴薯	二〇、六五四、五三九	三八、五九七、三七六	四三、四六八、三九五
德國小麥	四六七、五三八	四八五、五三一	三八七、九三一
乾草	二〇、三一九、九三九	二四、二六四、六一五	二八、二五〇、一一五

係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〇年平均。

畜牧收穫的增加，也不劣於此。這就是家畜數量顯著的增加，每頭重量的向上，和各種畜種的改良，效用的增大等等。

第十一章 交通的發展

—

上面所說那樣工業的異常發展，必然的不得不影響到別的實業部門。而尤以對於交通的影響為顯著。同時，因為交通的發展，也助長了各實業的發展，這也是明白的事。因為工業的技術和組織上的變革，和交通的技術及組織上的變革，其間所存在的關聯，是密接不可分的。誰是原因，誰是結果，要確實地區別開來，是困難的。交通被工業的異常發展所促進，而又作為促進工業，表示出異常的發展。工廠工業因機械的使用，造成大量生產；尤作這種大量生產的運輸者的交通制度，實在是循着下面那樣繁盛的發展進行的。

首先是，一到十九世紀後半期，道路雖然把它的作為樞要交通手段這個地位，退讓給鐵道可

是它還表示出着着進展的傾向。一八三七年在普魯士主要道路計長一二、八八八公里，一八四八年增加到一、五七三公里，此後繼續表示着下列的增加：

德國主要道路公里數

一八六二年	二八、八〇〇・〇公里
一八七六年	四六、四五四・九公里
一八九一年	七九、一四三・〇公里
一八九五年	八四、九五七・五公里
一九〇〇年	九五、九四五・〇公里

可是，道路決不是和鐵路相關爭的交通機關；道路的發展，不僅不受到鐵道的發展所阻礙，而且，假使沒有有用的充分道路網，那末德國鐵道決不能充分發揮其使命的。有了在物資運輸和分配的機能上優良的道路網，鐵道纔能展開其效用。所以道路好比是血管，把血液輸送到作為動脈的鐵道裏去。

因之，作為交通手段的道路的意義，決不至於減輕，反而是愈加增大着的。不待說，主要道路在這個時期，不僅數量上增加，而且質上也向上進展了。如像「買路錢」（Ohnsee-geld）的撤廢，關於道路的法制上的改革，統一作用，也逐漸實行了。

經過十九世紀後半期，占着更重要的交通手段的地位的，是鐵道。而確立德國鐵道網理論的，是國民主義經濟學者李斯特（List）一八三一年李氏關於德國鐵道網的發展計劃，在德國鐵道事業上，實在是提供了一個理論。他的鐵道國有計劃——即一八三三年的德國鐵道的基礎——薩克森鐵道組織，和一八三八年的國家之運輸制度，接着在一八四〇年所發表的國民主義經濟學——就是盛唱在國家基礎建設鐵道，使實業大趨發達。不過，李斯特的鐵道國有論，不幸在當時還不容易被接受；德國鐵道是採取私有和國有兩種形式。以後，從努連堡到孚爾特（Fürth）間的德國最初鐵道幹綫，敷設起來了。德國鐵道業走上發展的過程，鐵道延長距離有異常的增加。根據松巴德（Sombart）的計算其情形如下：

德國鐵道的延長距離

一八四五年	二、一三二公里
一八五〇年	五、八二二公里
一八五五年	七、七八一公里
一八六〇年	一一、〇二六公里
一八六五年	一三、八二一公里
一八七〇年	一八、五六〇公里
一八七五年	二七、七九五公里
一八八〇年	三三、八六五公里
一八八五年	三七、五七二公里
一八九〇年	四一、八一八公里
一八九五年	四五、二〇三公里
一九〇〇年	四九、八七八公里
一九〇五年	五四、六八〇公里
一九一〇年	五九、〇三一公里

此外，松巴德關於德國鐵道的發展，又試作下面那樣的比較。

德國鐵道專業逐年比較表

年份（五年間）	絕對增加數	比較數
一八四五——一八五〇年	二、六九一公里	—
一八五〇——一八五五年	一、九五九公里	三三三
一八五五——一八六〇年	三、二四九公里	四一
一八六〇——一八六五年	二、七九五公里	二五
一八六五——一八七〇年	四、七三九公里	三四
一八七〇——一八七五年	九、二三五公里	五五
一八七五——一八八〇年	六、〇七〇公里	二一
一八八〇——一八八五年	三、七〇七公里	一一
一八八五——一八九〇年	四、二五六公里	一一
一八九〇——一八九五年	三、三八五公里	一八

一八九五——一九〇〇年	四、六七五公里	一〇
一九〇〇——一九〇五年	四、三〇二公里	一〇
一九〇五——一九一〇年	四、三五一公里	八

到了十九世紀末，鐵道異常的發達，使經營可驚地擴大。因而集中了巨大的勞動力和資本。所以這種發展，恰恰使人發生自發的那種印象。然而，德國鐵道是伴隨着工業的異常發展的。

德國鐵道最初是私營的。國有鐵道在普魯士最初設立於一八四三年。以後國有鐵道組織，逐步增加；不過就是到了一八七〇年，重心點還依然在私有鐵道。從一八六五年到一八七五年間，普魯士的國有鐵道，從三、一〇一公里增加到四、三九〇公里，增加率達百分之四一；私有鐵道從六、一四八公里增加到一二、四八六公里，計有百分之一〇三的增加。就是到了一八七九年，有一半以上的鐵道，還是屬於私營的；從這時候開始，經過俾斯麥（Bismark）國有鐵道計劃的督促，鐵道國有化運動就興起了。到了一八八〇年代的中葉，鐵道的國家支配，已被確立，就在別的同盟各國，屬於國家所有的新線也增加了。

十九世紀末，全德國鐵道的國家經營，已經一般化；到了一九一〇年，私營鐵道，終於祇占全德國道的百分之六了。

鐵道發達對於各種實業的影響，是顯著的。首先要算對於證券市場的影響了。這恐怕是從鐵道股份和證券的買賣上產生的。一八七〇年，柏林交易所裏，上場的有價證券，主要是鐵道股票。銀行的生長，對於鐵道也有不少幫忙的。

二

十九世紀前半期，重要交通機關的河川交通，因為十九世紀初期和鐵道競爭失敗的結果，一般是循着凋落的傾向進行的。

各地的運輸量，都給鐵道奪去，日趨減少，鐵道所加的壓迫，與日俱增，鐵道在交通組織上的制霸，現在只是時間問題罷了。就無傍的辦法的。這時候，河川交通碰到意料不到的轉機。這就是在柏林設立了德國川河航運獎勵協會，其目的在於水上航運業的宣傳。

結果，使輿論復活，招來了水上航運業的隆盛。除了有幾個地方之外，竟有鐵道也不能匹敵的運輸量的增加。一八七五年到一八七七年平均，穀物買賣由鐵道運輸的計七九、九五三噸，由水上航運的計七三、三一八噸；可是，一八九六年到一八九八年平均，前者五一〇、二六三噸，後者竟達到八三二、〇〇〇噸。同樣，一八七五年到一八七七年平均，曼亥謨(Mannheim)的石油運輸，水上航運計六、四七四噸，鐵道運輸四、一四六噸；到了十九世紀末，後者為四、八五一噸，幾乎沒有增加，而前者實達一二〇、三三三噸。

水上航運，和經營組織的改善，同時並進。資本主義化的完成，是在十九世紀末。這就是新企業形態的基礎奠定，和技術的改善——蒸汽力的應用和普及——。因而造成船舶數量和運輸量的增加。

現在，用裝載能力做區別，來表明船舶隻數如次：

一五〇——二五〇噸	一八八七年	一九〇七年
	一、七五一隻	六、三〇一隻

二五〇——四〇〇噸	八八二隻	三、一二三隻
四〇〇——六〇〇噸	三八九隻	一、八六七隻
六〇〇——八〇〇噸	一三九隻	八九九隻
八〇〇噸以上	八一隻	一、二一三隻

十九世紀後半期，隨着貿易的進展，海上航業就特別隆盛。新的企業形態的採用，和技術的改善，在這裏也同樣顯明。這就是隨着資本的增大，同時發生資本的集中。漢堡·美洲郵船公司和北德·羅伊德汽船公司，是代表的例子。後者在一八八〇年，占布勒門汽船中百分之一八·四，到了十九世紀末葉，竟占百分之四六·三。布勒門這二個航運企業，一八八二年布勒門總船隻數百分之二一·二，一九〇〇年占百分之六一·四，一九一〇年已占到百分之六六了。

另一方面，船舶的裝載量也逐漸增加，表示出下面那樣的數字。即漢堡每隻汽船，平均噸數有下述變化；而繼續航行力和速度，也逐漸表示出好成績來了。

一八四一年——一八四五年平均	一八七註冊噸 (Registertonno)
一八七一年——一八七五年平均	四六九噸
一八九七年——一九〇〇年平均	一、一二〇噸
一九〇六年——一九一〇年平均	一、二六一噸

各方面交通制度的改善和發展，也必然地不得不使郵政制度引起變化。十九世紀前半期，郵政制度還只是私立的不便的；到了十九世紀末葉，也跟着變革了。

當十九世紀初期，郵政制度未見改善，又不在國家監督之下的。譬如，到了一八五〇年，這種郵政制度的改良程度，在普魯士，祇不過變成定期的罷了。

然而，一八七一年的法律，私的郵政制度實行廢止，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德國農村人口，終於得和世界各國作日日定期的通信交通了。

一八五〇年，德奧郵政協定成立，因而實行郵費的減低和統一。一八六八年，通一郵付統一郵費十本尼，已經通用於德國郵政制度所普及的領域上。這樣，郵政制度的統一及簡便化的結果，郵

政的利用，就突然增加。郵寄物的增加如次。

	郵包數	押匯數
一八八〇年	五一·七百萬	五七·一百萬
一九〇〇年	一三七·八百萬	五四〇·三百萬
一九一〇年	二六一·五百萬	一、二〇九·七百萬

假使將信件限於掛號的，那末十九世紀中葉，每年平均在全人口中，每人是二封到三封，可是到了一九〇五年，已達七〇封了。

電報制度的發達，專屬於十九世紀後半期的。它的開設年份如下：

- 一八四九年 普魯士
- 一八五〇年 巴威，薩克森
- 一八五一年 符騰堡，巴登
- 一八五二年 漢諾威

一八五四年 梅喀楞堡, 斯瓦林, 布藍士外克

一八五五年 鄂爾登堡

次之, 電報局的局數, 一八七二年爲四、〇三八個, 一九〇〇年爲二四、四五六個, 到了一九〇年已達四五、一一六個了。

最後, 電話有下面那樣的發達:

年	份	電 話 局 數	電 話 裝 置 數
一八八一年		七	一、五〇四
一八九〇年		二五八	五八、一八三
一九〇〇年		一五、五三三	二八九、六四七
一九一〇年		三六、六六五	一、〇三九、二〇〇

到了一九一三年, 電話局已達四萬個, 電話裝置數也增加了一百三十三萬具了。

第十二章 商業及金融的發展

一

十九世紀後半期，商業不問是大商業或小商業，都有顯著增加。假使就從事商業人員的增加看來，普魯士在一八四三年每千人中占九七人。一八九五年增加到二四〇人。在薩克森，把一八六一年和一八九五年的數字比較起來，增加到一與三之比。在北勒斯勞（Breslau）市，全人口中所占的成數，一八四六年占百分之三·一，一八九五年已達百分之六·〇。現在，再就全德國來看，一八八二年每五四人中占一人，一八九五年每三八·八人中占一人，到了一九〇七年，每二九·九人中占一人了。

那末，上面所說的商業的發展，是由於什麼原因呢？主要原因是：第一，是海外生產品尤其是殖

民地生產品的消費的增加。自然，就是到了十九世紀初葉，比較有多量輸入的咖啡、茶、可可、糖等殖民地的商品，還不過是富裕階級的消費對象罷了。可是，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事情完全變了；在西歐文明各國，這些商品變成大衆的消費對象了。現在，全人口中每人每年消費量，一八三六年到一八四〇年和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〇年的比較如下：（單位一公斤）

咖啡	〇・〇一——二・九九
茶	〇・〇四——〇・〇六
可可	〇・〇一——〇・五七
果實	〇・〇六——三・一五
香料	〇・〇五——〇・一八
餅	一・一〇——二・九六
米	〇・一八——二・五八

這些消費的增加。不特說，特別是意味着零售商的活動領域的擴大的。

第二是，都市人口的增加，尤其是大都市人口的增加。過去小都會裏的週市及此外的市場，是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交易의 媒介者。可是在大都市裏，這種形態的媒介者，隨着直接交換的不可能，同時就不得不消滅了。這結果就促進商業的發達，大都市的食料和調味用品，使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增了許多牛乳商，和乳產油品商，販卵商，蔬菜商等。

第三是，分散的經營之擴大化。

第四，比這些更重要的原因，是手工業的消滅，和大工業的出現。工業生產的領域上，大經營的發生和日益進展成長，使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生產品的直接交換（這是適應手工業的定貨生產的特徵，）變成不可能了。機械和技術的應用，所直接間接地及於商業的影響，十分顯著。不僅直接給商業以更顯著的刺激，而且是別的商業伸張的原因，根本是工業的異常變革的產物，所以十九世紀後半期商業的發展，和工業的發展之間，不得不是存在着歷史關聯的必然性的。

根據這樣原因的德國商業的伸張，因為下述條件，也不得不積極或消極地受到制約。這第一是，報紙的有規則的指示價格，根據價格通知的市場的公告。第二是，迅速的通信，迅速而公正的送

呈樣品，正確的通知，用敏捷而安全的信札電話的定貨，都因近代的正確尤其是公正的郵政制度，纔有可能。第三是鐵道。德國的鐵道，構成商業發展上密接而不可分離的條件，無用再多說了。第四是，由於交通機關的一切部門是共同的，纔開始決定商業價格，它的統制成爲德國商業的發展條件，而發生作用。

簡單說來，造成商業的新的形式，必要的前提是：人物，消息報告和運輸的完成，電報組織的擴張，鐵道網的建設，以及郵政制度的改善。

大體上，十九世紀前半期，現物商業尤其是市場商業具有支配意義的大商業，就是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鐵道開設，對它並沒有怎樣決定的影響。

可是，因爲交通機關的發達，商品的供給開始增加。譬如在一八六〇年代，萊布齊 (Leipzig) 的商品供給，因交通機關的發達，而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市場商業便開始減少，終不免減到消滅的程度。卽根據樣品的商業，代之而帶有支配的意義了。

零售商業多還停止在舊有的形態上。一八五八年，普魯士的三九，三三九個獨立商人，只有二

二、九〇七個做賣買的夥計。而頭腦和家主的關係，多半不會脫去家長制的舊套。恐怕這種經營形態的後進性，在德國大商業上，也還是到處看得到的共通的現象。即在北勒斯勞的五一八個的店主，有八二七個夥計的殖民地商品販賣上，還多量能夠看到這種色彩的。可是，這一時期的小商業，其特徵是顯著的分化。現在大致劃分為：（一）零售紡織品；（二）零售鋼鐵青銅鐵品；（三）零售玻璃陶器石製品；（四）零售裝飾品；（五）零售骨董品。

扼要說來，德國大商業的發達，從樣品商業更引致了標準商業。這樣德國商業的發達，就在交易所的定期賣買的形態上，達到了頂點。德國大商業正在逐漸排斥中間商業，把自己資本化；而且使輸送業倉庫業等日趨分化，而強化自己。

二

十九世紀後半期，德國銀行業的發達，從過去政治經濟的停滯所伴隨着的萎靡狀態，和一八五〇年代，共同進入到一大飛躍時期，不過走向正格的迅速的發展過程，非待到一八七〇年不可。

從一八五〇年到一八七〇年，德國銀行制度的特徵，是證券流通的顯著增大，證券發行所的迅速增加。一八七五年，有證券發行權的三十三家德國銀行中，二十七家銀行是一八七〇年以後，十九家銀行是一八五〇年代設立的。因而大被證券種類煩瑣的增加所苦。一八七三年，銀行證券和紙幣的種類數，達一百四十種以上，另一方面，證券流通的向上，帶來了良好的結果。

一八五〇年代之初，證券發行總額每年平均，數達一萬萬二千萬馬克，到了一八七三年末，增加到十三萬萬五千二百萬馬克。可是一八七〇年代以後，證券制度逐漸走上統一和安定化的時期；法制上對於有證券發行權的私立銀行，賴從事其他業務，以促進其放棄該項權利，而求發行權的獨占化。

一八七〇年代初，普魯士銀行之外，有該項權利的三十二家銀行中，二十八家銀行都在一九一〇年以前，放棄發行權了。到了一九一〇年，僅國家銀行以及巴威證券銀行，德勒斯登銀行，符騰堡證券銀行，巴登銀行等五行有證券發行權。其中，國家銀行的作用頂頂重要，說是德帝國確立後，銀行證券制度的歷史就是國家銀行的歷史，也不會誇張的；它對於德國全般經濟生活的意味，是

不小的。

此外，從事匯兌，票據交換，貼現等業務的銀行及銀行職員，它的發展和增大，可以從下面三點來觀察的：

第一，從事貨幣及信用業的人數，一八四六年祇不過一，一〇〇人；一八五八年增加到一，七七四人；一八九五年已達一七，八九六人了。其間人口總數增加二倍，而它增加到十倍以上。不過這個數字包括銀行業者及其雇員在內。

第二，大都市裏它的增加更爲顯明。柏林當一八五〇年代末，計有二四四人，一八九五年增至七四四人，一九〇七年加到一六，九四六人，增加了十六倍。

第三，各家銀行，經營有顯著擴大。全德國每一銀行擁有資本額，其數字如下。

德國銀行資本的增加（單位百萬馬克）

一八八三年	股份銀行	信用銀行
	一一·五	一一·二

一九〇〇年	二〇·五	一九·九
一九一一年	二六·〇	二三·六

至於主要的六大銀行資本的增加，逐一表示於下（單位百萬馬克）：

德意志銀行	一八七〇年	一五·〇
	一八八〇年	五四·〇
	一八九〇年	一〇三·〇
	一八九九年或一九〇〇年	一九九·三
	一九一〇年	三一四·〇
貼現銀行	一八五六年	三七·二
	一八九九年	一六八·四
	一九一〇年	一八三·九
丹穆斯達忒銀行	一八五三年	六·八
	一九一〇年	一九二·〇

德勒斯登銀行	一八七三年	九·六
	一九〇〇年	一六四·〇
	一九一〇年	二六〇·五
柏林商業銀行	一八五七年	九·九
	一九〇〇年	一一四·八
	一九一〇年	一九二·四
沙夫好姆銀行	一八八九年	三六·〇
	一九〇〇年	一二〇·〇
	一九一〇年	一七九·八

德國各銀行，可以由上面六大銀行來代表的，這六大銀行，都擁有多量資本，營業種類很多，規模也大；尤其是它們的發展過程，是跟着諸小銀行的併合，確立其獨占地位的。

適應着各種實業的發展的狀態，德國銀行制度的特殊性，是在於縱使這些大銀行，也正像「灶下婢」一樣，應順國內經濟的需要，經營一切業務，跟着工業的勃興，所有種類的金融都經營

的這點上

德國的所謂「大銀行」(Grossbanken)，普通是指的德意志銀行 (Deutsche Bank)、貼現銀行 (Disconto-Gesellschaft)、德勒斯登銀行 (Dresdener Bank)、丹麥斯達忒銀行 (Danstädter Bank) 以及沙夫好姆銀行 (Schaffhausen Bankverein) 等六銀行。上面爲首四銀行，它的名稱都是以「D」字冠首的，所以通稱四大D銀行，勢力特別巨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銀行組織的內容的變化，漸逐採取股份組織。不待說，這發揮了產業上的積極機能的。

最後，因爲德國銀行而造成生產和交換的企業的金融化，這對於一八五〇年代開始迅速進展的實業的創建時期，有重要意義。可是此後，銀行業和工業，就繼續了密切不可分離的關係。

三

另一方面，因爲公司企業而助長工業的獨占化，自身走上獨占化的過程；德國資本主義就逐漸

走上獨占資本主義時代了。

這時候，有價證券的交易上，也逐漸有激增的傾向。根據德意志帝國統計年鑑，可以看到下列數字的變動（單位百萬馬克）：

	股份資本	抵押證券	債券
一八六三年	一九	八	五
一八七〇年	六〇	一五七	一一五
一八八〇年	二六一	一、四八三	一、三六三
一八九〇年	二八九	四、〇六六	三、三二〇
一九〇〇年	五八七	六、五七四	六、二一四
一九一〇年	五〇五	一〇、三一七	一〇、六二三

企業形態的變革，在廣汎領域上深刻地進行。公司企業特別是股份公司的發展，是助成那由小經營而大經營，然後而至高度工廠工業化過程的決定的要素。

十九世紀中葉，股份公司的增大，巴威在一八三七年——一八四八年間，有公司六家，資本金爲三百九十九萬馬克，可是到了一八四九年——一八五八年，公司數增加到四十四家，資本金加到一萬萬四千五百萬馬克了。

普魯士關於採礦冶金的股份公司，在一八三四年——一八五一年間有十四家，資本二千三百二十九萬泰來爾，在一八五二年——一八五七年間，則增加到五十九家，資本九千〇六十九萬泰來爾。假使和其他股份公司合計起來，那末變化如次：

	股 份 公 司 數	資 本
一八二五年	二二	三六百萬馬克
一八五〇年	一〇〇(以上)	六四〇百萬馬克
一八七〇年	三〇〇	二、五〇〇百萬馬克

全德國一八五一年——一八七〇年有二九五家公司，資本金二十四萬萬四百萬馬克；一八七〇年——一八七四年，已達八五七家公司，資本金三十三萬萬六百萬馬克了。此外，一八七〇年

三〇〇家股份公司所有的資本，以實業區別來看，情形如下。（單位百萬馬克）

鑛業	二七五·四一
銀行業	九四·六五
保險業	一五八·四六
鐵道業	一、七二二·四四

到了一八九〇年以後，無論在數量上或資本上，突然日益增大；國內財富的大部分，都是由股份公司正在運用的資本所構成。這時候起，企業的合同或結合，突然進展，尤其是同業同盟（Kartell），浸潤到一切的實業，而發揮它的偉大力量。根據里夫曼的計算，一八六五年以前，德國已有四個同業同盟，一八七五年增到八個，到一八八五年實達九〇個，一八九〇年一躍而加到二百十個，一九〇五年實際上已到三百六十六個了。再若根據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向議會提出的覺書，總計已達三百八十五個同業同盟，以實業為區別的數字如下：

煤業	一九
鐵業	六二
金屬業（鐵除外）	一一
化學業	四六
纖維工業	三一
皮革及橡膠業	六
玻璃業	一〇
磚瓦業	一三三
土石業	二七
陶器業	四
糧食品製造業	一七
電氣業	二
其他	七

一萬二千家以上的經營，已經分別歸屬在這裏。此外托辣斯(Trust)和康采倫(Konzern)也頗迅速地增大，其中要算斯汀納斯康采倫和A. E. G. 康采倫，是代表的。又里夫曼(Lieffman)所著「同業同盟與托辣斯」一書，認為一九〇五年政府關於同業同盟的調查，決不完全，就把一九二二年當時同業同盟數作爲一〇〇〇計算的。又據全德工業同盟同盟部主任梅芝那(Metzner)調查，一九二三年德國同業同盟如下。這統計雖不屬於十九世紀後半期的，爲供參考，就引錄於下。

實業類別	同業同盟
礦業	五一
鐵業	七三
金屬精鍊及半製品業	一七
機械製造業	一四七
汽機裝置製造業	四八
鐵道車輛製造業	一
汽車自由車製造業	八

銅鐵品業	一三四
電機精密機械透鏡(Lens)業	五六
金屬業	七八
木材業	四四
製革業	四六
土石業	三〇
建築業	—
玻璃業	三〇
化學業	九一
精油及油脂業	三六
造紙業	一〇七
紡織業	二〇一
被服業	七一
釀酒及製粉業	九七

造糖及製果業	二四
食品業	四九
海運及輸送業	四
合計	一、五四三

第十三章 十九世紀後半期的社會運動

一

十九世紀後半期的德國實業狀況，根據上面記述，已可明瞭。現在，不得不來闡明德國的社會一方面。因歷史的及地域的特殊性，德國實業的發達，開始就時間落後，因而要和其他各國，並駕齊驅，就非在短期間內，實行迅速的促進方策不可。這個特殊性，再產生出新的特殊性，即在政治上國家統一運動的蓬勃，同時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的傾向，就不得不被歪曲了。關於政治的一方面，讓我們在後節詳述；本節且局限於社會的一方面，加以觀察罷！

德國整個實業部門觸目的進展，造成新的階級分化；社會的情勢，也和它相適應地經過了變化。從封建的身分國家，激變到資產階級的立憲國家的過程中，支配階級的暗鬥相敵對，和對於它

們的目下而起的反擊，也不絕地更新其勢力。

蒸汽這個魔術，使社會情勢完全變更；現在，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造成紅明星，送上了歷史的舞臺裏。貴族階級因為迎合着資本主義的制度，而且也只有迎合的範圍內，纔得苟延餘命。

在這代表的二個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中間，像泡沫那樣離合無常的中間階級，偏處在舞臺的不注目的黑暗一角，繼續不安的存在。農民階級昔日的面目，毫無餘留地已被剝奪，好像隱身在貴族階級的覆袖之下。保守和進步，固執和破壞的動亂，環復演奏；那個吐着火和煙，燃燒起使人震驚的所謂德謨克拉西新時代的烽火，終於發展到三巨鐵道——聯結柏林·拜占庭 (Byzantium) 把達 (Bagdad) 的鐵道——，而遠馳驥足了。於是悲劇的結果，就逐漸接近。

在十九世紀前半期，階級的發展，還是在未成熟的狀態裏，就在數量上也只有微弱的勢力。德國資產階級還多量地殘留着舊有制度的特質，還帶有領主的或家庭工業的色彩，這上面早已說到過了。

不待說，德國資產階級之誕生爲階級，早屬近世初期，而且經過了直到十九世紀的幾世紀的逐漸生長，可是德國資產階級，成熟爲一個階級，就不得不待之於一八五〇年代。

從這個時期起，資產階級方始站在純粹資本主義制度上，簇生而增大起來了。

那怕到了三月革命——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德國資產階級爲主張自己的政治勢力，力量還太微弱；反之，譬如說三月革命是未完成的資產階級革命，但等到一進入十九世紀後半期，權力的掌握和支持，就開始委託給資產階級了。

向來，各種資本形態，都由同一個所有者來代表，所以形成合一的階級，不僅沒有統一，而且階級內部，還處於未分化的狀態；但到了十九世紀後半期，社會的情勢發生一大轉化。而政治勢力的伸張，也可作爲階級統一的有力佐證，階級內部的分化，也逐漸明瞭了。

銀行家，大商人，交通企業家，大工業家，大地主等，有了相當明瞭的區別了。

因之，在一方面就引起資產階級內部的經濟及政治利害的衝突；這是可注意的事情。譬如像商業賣買上，尤其像國外貿易政策上各資產階級階層的利害對立，如保護關稅組織和自由貿易

組織等就是。

形成資產階級的中堅的，是資本家的大企業家。據松巴德的觀察，其數量如下：把有使用人五十以上的農業除外，工業，商業，交通的經營者人數，一八八二年有九、九七四人，一八九五年有一八、九五三人。而有使用人五十以下十一人以上的經營之所有者，其中有一〇、〇二三人可以算在資產階級裏。

再加上大約八千的大地主，所以形成德國資產階級中堅的總人數，一八九五年約有六萬人，十九世紀末，恐怕要達到七萬到七萬五千人了。這裏所表示的數字，根據收入統計，也能明確地計算出來的。在普魯士，每年有一二、五〇〇馬克以上收入的，計有五四、九五九人，全德國約達九萬人。其中除去貴族及自由職業者，就和上述數字一致。所以在十九世紀末葉，把附屬人口合算在內，就有純粹的資產階級者二十萬到二十五萬人存在。這個數字，相當於全德人口百分之〇〇·五。

圍繞在上述資產階級中堅的四週，有準資產階級，它的構成要素；第一類是獨立的或者能夠

獨立的，根據近代經濟原理，可以稱爲「資本家的小經營者」。屬於這種人的，如多數販賣業者，大多數的家主，證券賣買人等。第二類是雖沒有經濟上的獨立，而從事於資本主義企業過程的。例如管理人，商務代理人等。現在把這些人合計在內。資產階級的總人數，達到二百二十五萬到二百五十萬人；相當於德國人口百分之三——五。

德國資產階級，其政治法律的勢力和意義，要比其他各國低劣。

這是因爲德國資產階級勢力的伸長，受到下述二個制限的緣故。第一因爲和小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間，缺乏階級的協調。德國的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只專心於擁護自己階級的利益，常以資產階級爲仇敵，實行鬭爭。不待說，這個責任，也大多在於資產階級者一方面。他們根據合理主義的原則，時常採取惡劣苛酷的手段，以滿足利己慾求；少用體悉，憐憫同情，那少用所謂「父母視子」之愛，來對待他們的。也因而比別國更少獲得資產階級內部的智識階級的同情。第二因爲全部社會階層裏，缺乏貨幣的滲透力。資本主義組織的積極方面——資產階級的發展過程，同時它的消極方面——無產階級的發展過程，在德國並無不同。成爲力求破壞的敵對階級的無產階級，

到了一八五〇年代，也走入觸目的進展時期了。

二

上述二個制約，使德國資產階級的勢力後退了。當十九世紀前期，無產階級者尚未成爲一個階級，就是在數量上也是微少的，這和當時資產階級的情形相同。

尙還儼然確保其基礎的封建制度，和早已興起的資本主義組織；成爲這兩者雙方的榨取對象，經驗了苦惱和貧困的無產階級，當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時候，站在革命勢力的指導者地位上；最後，和其他各階級協力從封建階級那裏獲得來的權力，雖被資產階級所獨占，可是隨着一八五〇年代的開始，它同時也進到強有力的生長時期了。

因爲資本主義制度的成長，無產階級的勞動關係及其狀態，就按照着資本主義而單純化了；又因爲助長了無產階級數量的數達，就完全變更了舊有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性。從這時起，德國無產階級也開始把自己的眼光投射到外方，不論階級意識上，同時在階級運動上，都逐漸增加國際

化的傾向，無論質和量，都受到巨大變化。

農村人口向都市的集中化，資本主義經營的擴大和增加，必然地形成無產階級的增大過程，全人口中最重要的部分，就都無產階級化了。現在根據松巴德的統計，無產階級在全人口中所占的成數如下。工業商業以及交通，使用二十人以上的經營，就可說是資本主義的經營。由這些經營所雇用的人數，一八九五年有二六五、三一七人被雇用者，和三、六五、六二五四人的勞動者，合計共達三、九二一、一五七一人。其中有二一、五七一人有準無產階級的性質，暫且除外，那末無產階級共有三百九十萬人。其中，再除去四十萬人是國家和自治團體的雇用勞動者，那末有三百五十萬人可說是純粹無產階級。它在全人口中所占的成數，相當於百分之十三到十四。再加上資本主義的農業企業所雇用的勞動者，約一百五十萬人，就數達五百萬人，把它附屬人口計算在內，就相當於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

雇傭二十人以下的資本主義的經營，所雇傭的人口，計有傭工一二六、二二〇人，工人一、二二四、〇〇六人，在農業裏，該項人口計六五〇、〇〇〇人。合計爲二百萬人，所以和上面人口

併起來計算，結果共達七百萬人。加上它的附屬人口，約占全部人口百分之三三·三。所以，無產階級的人數，在十九世紀末葉，形成全部人口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不過應當注意到，這個數字是打了很大折扣來計算的。

德國無產階級和別國比起來，其不同的特殊性之一，是被強制實行階級的固定。一般說來，德國有一個特徵，就是階級的非開放性。因而無產階級之轉移到別一階級，不僅已被嚴密遮斷，而各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敵對反目，更趨極端。

德國資本家對於勞動者，常是峻嚴苛刻的。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政治運動，毫不容赦，常盛殖階級憎惡的念頭。這樣，階級的保守主義性，從無產階級中在比較優良勞動條件下從事勞動的上層工人那裏，促進所謂「勞動貴族」「勞動官僚」的發生，同時，它產生了階級運動之德國式的社會改良主義。

由於這種德國實業的後進性，也是要求一下子恢復這種後進性的必然條件，這是不用說的。這種後進性伴隨着勞動條件的惡劣。德國無產階級工資，比別國來得低廉。雖說因為實業的異常

發達，能和各國並駕齊驅，而工資卻遠較英法美諸國，更為低廉。

加之，勞動時間，雖也時見縮短，可是一般地遲遲實行。一八七〇年，十二小時的勞動時間是通例；到了一八七七年，發生十小時制的要求，一八九一年九小時制，一八九六年好容易才發生八小時制的要求。從這裏也可以知道勞動的後進性了。

三

領主階級(Junkertum)在階級上蒙受到明確的變化，這是不待說的，可是決不會隨着資產階級的掌握政治權力而消滅。而且甚至在現在，還保有強大的勢力；它的政治和經濟的重要性，決不會貶下的。

三月革命的餘燼漸形平息，屈服在革命的恐怖下的領主階級，就常常抬頭起來。一八四八年的秋天，就粉碎了普魯士議會；翌年春，把採用自由主義的帝國憲法的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解散，因禁壓帝國憲法所引起的各地的擾亂，用軍隊力量來鎮壓下去；領主階級還擁有那樣強大的勢力。

可是，只用自己力量，不能支持自己的時期到來了。資產階級早已掌握住經濟的權力了。領主階級僅爲保持自己，惟有和資產階級互相妥協，互相勾結才有可能；現在是這樣時期了。領主階級就從舞臺的正面，退到後方；隨同安置基礎的舊制度的廢止，領主階級的不滿和嗟怨的時代開始了。對於新的經濟制度——資本家生產，資產階級愛好它，無產階級憎惡它；小資產階級表示敬畏，而領主階級投以輕蔑了。

所有權的安定和世襲，在新經濟組織所作隨着的物資流動化之下，發生危險了。新的經濟原理，合理主義的盤算，黃金主義，總括說來，「商業買賣」和領主階級的階級的矜持發生衝突。要匡救自己，不至於完全滅亡，其方法之一，便是不管階級的矜持，或多或少的程度內實行資本家化。不待說，殘存着的領主階級，已經全都帶有資本家的性質。而且資本家化，在舊的土地貴族和新的黃金貴族間姻籍的融合這個形式上，也可以進行的。另一個方法，譬如像結成地主同盟，那怕只有薄弱的階級性，也擁有微少的政治勢力的。

尤其是德國東部所殘留着的地主階級，就是到了二十世紀，多數還是建立在封建主義家長

制度的基礎上的。

四

和領主階級一同從政治前線退卻的，是中間階級（Mittelstand）其構成的要素，大概可以舉出下列幾種：第一、狹義的手工業者；第二、零售業者；第三、中小農民。

中間階級，特別是手工業者中進步的尖銳分子，活躍於三月革命，這是新穎的事實。

缺乏階級的統一。政治要素的不統一，沒有秩序，這是中間階級的特質。這種特質，就到十九世紀後期，還保留着。據松巴德的計算，他們占全人口百分之二五；到了一八九五年，情形還和一八四八年同樣。不過，這期間經濟組織的一大變革，結果也引起中間階級之政治的及社會的地位之變化。

實業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二大階級所支配，手工業者階級早不過是舊時代的遺物罷了。用手織機、手紡機緩慢地從事生產的手工業者階級，政治早已遠離他們而去了。這也同樣可以

適用於中小農民的。和領主階級的情形相等，職業的固定和世襲，是農民的生活基調。這種從昔日繼承來的非政治性，就到十九世紀後期，立憲主義輸入以後，還依然形成農民的特質。農民階級當作曾經侍奉過的領主階級的附屬物，把政治權利，恭讓給他們。經濟的從屬，經過農民解放，三月革命，結果逐漸已被撤廢；就到這樣時期，還增加了政治的從屬。過去生活習慣上保守的農民，在政治上也是保守的。這樣，中小農民階級走上相對地逐漸減少的路。

五

在上述階級背景之下，德國各階級的社會運動，點綴着德國的社會史。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代辯者康普好和漢傑曼的組閣，馬上變成反動的蹂躪；已經獲得的經濟的力，使資產階級化為政治的力的支持者了。

於是，新時代的代表階級——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以及國家主義的工作，逐漸在面前出現了。

三月革命裏果敬的，因而在資產階級看來是可恐怖的無產階級的活動，目擊這種情形的資產階級的支配階級，第一着手幹的事業，就是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以及用劍刃槍炮來彈壓沒有武裝的無產階級。玻恩（Burne）所指導的德國工會已經經驗到了，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爲了對付這批「危險的放浪分子」所準備的共同戰線，所施的槍劍的襲擊。

在此之前，當三月革命爆發，同時有共產主義同盟的大多數人，來到德國；到處發揮其勇氣，在出版物，集會，巷戰中發揮指導的能力。可是他們並不主張「三月革命」就是無產階級革命。這是因爲當時德國的社會情勢，還沒有成熟到這種程度。

馬克思，恩格斯用新萊茵新聞（Rheinische Zeitung）來活動，玻恩先在柏林，萊布齊，後在德勒斯登活躍。三月革命終結以後，大多數盟員亡命倫敦；一八五二年秋，共產主義同盟（Bund der Kommunisten）隨着「科倫共產黨事件」（Kölnner Kommunistenprozess）的發生而消滅了。

這樣，從對於機械和工廠的盲目的反抗搗亂起，種種自發形態的勞動運動的前史，就宣告終

結。無產階級質量雙方的轉化，帶來了下面的時期，

十九世紀後期的開首，因為反動的勝利，表面上保持着極穩的狀態。自然，對於反動的制度，從下方不斷的加以反攻。可是這個時期正像經濟上是個準備時代，迎候着波濤萬疊的將來；在社會上文化上也都是表面沈滯，內部在任何時都可爆發的力的蓄積時代。

和病苦窮困相搏戰，把全身精力奉獻給勞動運動的馬克思，因為革命失敗，到巴黎去了。以後轉赴倫敦，和移住在曼徹斯特 (Manchester) 的恩格斯繼續交友，一八五九年就出版了經濟學批判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他再站在德國勞動運動的指導位置上，那是離國十幾年以後的事情了。

近世無產階級運動，一般都認為拉薩爾 (Lassalle) 開始的。拉薩爾在一八四〇年代，已經是熱烈的共產主義者，經過一八五〇年代，和馬克思相交友，多受到他的影響。本來已有若干政治的社會的著作；一八六二年，在柏林近郊，手工業工會支部的柏林機械工廠，舉行演講，題為現代的歷史時代和勞動階級理想的特殊關係 (Über den besondern Zusammenhang der gegen

wartigen Geschichtsperiode mit der Idee des Arbeiterstand) 後來署名勞動者綱領刊行於世。一八六二年，因為這個演講，答覆工會的質問，公佈了致德國一般勞動者會議問題，中央委員會的公開狀。(Offenes Antwortschreiben an des Zentralkomitee zur Berufung ein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kongress) 把這裏的宗旨作為綱領，就組織起德國總工會 (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 拉薩爾被議決充任總裁。

他欣然答應這個決議，一八六三年五月二三日，在萊布齊，到有漢堡，馬爾堡 (Marbury) 科倫 杜塞爾多夫，馬因斯，愛爾巴斐爾特，巴爾門，查林根，萊布齊，法蘭克福等十都市的代表，組織成了德國總工會。這個運動，在萊因一帶，特別興盛。

總工會的組織，是非常集中的，在拉薩爾的獨裁政治之下，拉薩爾的活動強而有力，他貢獻給勞動運動的數個月時間，其所得內容，遠優於從事長年累月的成績；可是要永續地決定勞動運動的方向，不免是時間過嫌短促了。拉薩爾就任總裁以來，振興勞動階級的理想，或者和裁判所鬭爭，或者和進步黨鬭爭，結果，使他接近到俾斯麥了。可是運動的發展是非常緩慢的，像拉薩爾預期結

成十萬勞動者，那只是夢想罷了。話雖如此說，勞動運動是採用他的綱領的主要點；而對於拉薩爾所給予的工會和實業公會的批判，長為勞動運動的特質。

然而在將來，鼓舞運動的精神的，不是拉薩爾，倒是馬克思。

一八六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拉薩爾悲壯的熱情的臨歿。成為勞動運動可尊貴的犧牲，引起德國勞動者無限的感懷，無產階級由於這個事件，給社會運動以一大衝擊。

不過，德國總工會，當其創立者瞑目時候，還祇有四千六百十名的盟員。因而在拉薩爾死後，短期間運動依然停止在小鬪爭的狀態裏。個人的派別，代替政黨而出現了。而拉薩爾指定繼任總裁的柏克爾（Bernhard Becker）既無能力，又生性暴慢，勞動者同盟為之也失墜或分勢力。以後賴着有才能的指導者希瓦依札爾（Schweitzer）拉薩爾派的社會主義者——才得維持並增進它的勢力。這時候，威廉·李卜克內希（Wm. Liebknecht）受亡命倫敦的馬克思派遣歸國，和希瓦依札爾同時從事運動，但因政治上見解的不同，就把他驅逐掉，來建築起站在新的根據地上的勞動運動。

這樣，這個新成立的團體，就和拉薩爾派同時並存；它是非妥協的具有馬克思主義的傾向的。因之，才能使年強力壯的盤旋工倍倍爾（August Bebel）來參加到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陣營裏。這時候，倍倍爾年僅二十四歲，已任本鄉勞動者訓練組合的組合長，對於新團體的發展發揮了他的天性的雄辯和組織能力。這個新團體在一八六八年，採用社會民主工黨（Die 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的名稱，在第二年揆森那哈（Eisenach）大會以後，形成揆森那哈派和拉薩爾派相對立。揆森那哈派受到第一國際（一八六四年成立於倫敦）的精神的援助。

六

這個時間，資本主義打破了地域的劃分，侵入到世界的任何一隅。蘇彝士運河的開通，美國黑奴的解放，俄國變革的開始，作為一八六六年德奧戰爭的結果的德意志同盟之解散，普魯士普選制的制定，大不列顛城市工人的獲得選舉權，以及日本的資本主義的興起，都接二連三的實行了。這些社會的經濟的結果，必然使無產階級把眼光注視到外面來了。國內和國際的階級統一，

以及社會運動的統一形勢，逐漸濃厚起來。一八六〇年代之初（一八六一年——一八六四年），德國和英法兩國同樣地能夠看到勞動運動的恢復。

勞動運動採取國際化的傾向，可說是必然的。一八六二年倫敦舉行萬國博覽會時候，關於勞動者共同的勢力，應當成立協議，取得和英國勞動者意見的一致。第二年——一八六三年，英法兩國無產階級，對於波蘭革命，表示同情。一八六四年秋天，國際勞工同盟（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Soziation）在倫敦成立了。

國際勞工同盟的組織上，發生重要作用的創立旨趣書和同盟規約，是馬克思起草的，它成爲同盟的基礎。創立同盟的旨趣是：無產階級組織獨立的政黨；保護工人；設立工廠法；設立工會；對於陰謀而煽動民族間仇視的外交，實行鬭爭；世界無產階級實行團結，廢除階級支配，以及勞工階級的經濟解放等等。

馬克思企圖造成各國勞動運動的中心點這個使命，不得不經驗到許多困難。可是要把勞動運動的一切派別——法國的蒲魯東（Proudhon）派，工團派，英國的工會派，意大利的瑪志尼

(Mazzini) 派德國的拉薩爾運動的一派等——集中在一個組織之下，這個企圖事實是完成了。另方面，各國無產階級，爲了加強國際的連帶意識，盡了許多考慮。這樣，馬克思緩緩地着手把自己計劃作組織化的實現了。國際勞工同盟，一八六六年在日內瓦開大會，一八六七年在洛桑 (Lausanne) 一八六八年在布魯塞爾，一八六九年在巴塞爾 (Basel) 開會，逐漸地導入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

保護勞工，工會運動，戰爭，改善土地等，都成爲大會討論的議題了。在一八六七年之前，蒲魯東的影響，是支配的，以後一直到一八六九年爲止，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是占支配的地位。這個同盟因爲一八六八年加入的俄國巴枯寧 (Bakunin) 一派和法國蒲魯東一派的策動，以及少數社會主義者表示不平，就在一八七六年分崩瓦解了。

七

所以，德國勞動運動惟有作爲國際連鎖的一環，纔能存在的。一八六七年，俾士麥所頒佈的一

般平等，直接，祕密的選舉制，對於此後德國社會運動，發生兩個根本的結果。第一是：介在貴族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既已衰弱，又因對新興工人政黨的憂慮，失去了自身的資產階級，現在更加削弱了。第二是，給予無產階級以民主的選舉制，把階級運動，逐漸停留在議會主義的運動上。到了一八七〇年代，德國國內的勞動運動，因為埃森那哈派和拉薩爾派的妥協，引起了顯著的變化。這就是兩派在皋塔（Gotha）訂結合同。這個合同只是「妥協」罷了，在運動全體上，馬克思主義的地步，可說一步一步的確立起來。從此以後，一直到十六年以後，被一八九一年的厄爾福特綱領（Das Erfurt Programm）所代替為止，皋塔綱領（Das Gatha Programm）繼續成爲政治的信條。揭露着這個綱領，德國社會民主黨從一八七六年起，踏入了爲爭取政治勢力的鬭爭。

德國社會民主黨實行動員選民，要獲得議席，特別是或獲得德意志帝國議會的議席；在這合法的議會鬭爭上，爲一切國民的先驅，而且成就了赫然的成功，因之變成諸國民的模範。這種形式的社會運動，是如何典型的，如何德國式的，只要看下列事實，便可明白。一八七一年的帝國議會，選舉議員的投票總數爲三、八九二、一六〇，而社會主義的投票占一二四、六六五，選出議員二名；

一八七四年投票總數五、一九〇、二五四票中，占三五五、五九二票，選出議員九名；而在一八七七年總投票數五、四〇一、〇二一票中，占四九三、二八八票，選出議員竟達十二人。而在一八七一年代之前，選舉帝國議員的投票，在全世界上幾乎是唯一的。就是到了一八七八年，世界各國社會主義的投票，合計四三八、二三一，而其中倒有四三七、一五八票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餘則屬於丹麥。

甚至到了一八九〇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得票，尙占全部社會主義投票的六分之五以上。大戰以後的和平時期，社會民主黨得票四百萬以上，還占全部社會主義投票的一半。

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勃興，感到神經上煩惱的，便是鐵血宰相俾士麥。俾士麥遠在一八七一年，就提議列國政府以共同態度，來取締社會主義，因為英國政府未曾同意，所以這種協定未能成立。

德國政府就用取締言論，來作對抗社會主義運動的方策，一八七四年就制定了帝國出版法。接着，因一八七八年發生了海台爾 (Hoedel) 和諾皮林 (Nobling) 的狙擊皇帝事件，俾士麥

就籍機制定社會黨鎮壓法（Ausnahmegesetz）欲一舉而撲滅社會主義運動。自從社會黨鎮壓法制定以來，德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就不得不和政府的殘酷彈壓政策鬭爭。這時候，企圖和當時國家相妥協的拉薩爾一派的勢力，日趨衰退。爲了和彈壓政策相對抗，另外又發生兩派，一是用言論戰爭來實行抗爭的多數派，一是主張用直接行動，來求打破彈壓政策的莫斯德（Most）派，這是帶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自從社會主義鎮壓法制定以來，社會主義的言論機關雖然幾乎要完全消滅，可是社會主義的勢力和對於社會主義的同情，卻比鎮壓法制定以前，更要增加了。這就是說，鎮壓法不會撲滅社會主義的勢力，反而使它增長了。自一八七五年到一九一四年，在這四十年間，是經濟和政治的解放目的改革時間，同時也是社會主義運動不斷的進展時期。

關於應用技術和工業，科學的基礎和方法到經濟上，在全世界上完成支配的角色的德國，就是在社會主義運動方面，德國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之理論和實踐，也盡着支配角色的。

這個時期德國社會民主黨，立在上近代勞動運動的頂點。不管有社會黨鎮壓法的壓迫，一八八七年還得票七六二、二〇〇票，一八九〇年竟得一、四二七、一二八票，獲得議員三十五

名。這樣，鐵血法幾乎毫不見效果，就在一八九〇年九月廢止。不久，鐵血宰相俾士麥也因而罷免了。這樣，社會黨鎮壓法，就給社會主義運動的力量，打得一敗塗地了。德國社會主義的勝利，扼要說來就是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之勝利。

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就被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所支配。德國社會民主黨在一八九一年由考茨基（Karl Kautsky）起草厄爾福特綱領，用來代替皋塔綱領。厄爾福特綱領，在理論方面，是馬克思主義的；在實踐方面，是民主主義的社會改良主義的。這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性格使然的。徐培爾（Max Shippel）康普適雅（Paul Kampfmeyer）等所指導的，對於這種社會改良主義要素的反對，開始於一八九〇年代最初的二年間。這種反對，以後由恩格斯、倍倍爾、李卜克內希以及那個冷靜透的更動人的伊克納次奧挨兒（Ignaz Auer）的雄辯，來實行的。

社會改良主義的修正主義的分派，當社會黨鎮壓法廢止之後，由福爾馬（Georg Von Vornmar）指導，十九世紀末，由柏恩斯坦（Edward Bernstein）來完成的。這種改良主義的傾向，因工會運動的增大，而被助長起來。合作社的社員，一八九〇年不過二三八、〇〇〇人，一九一一年

已超過二百萬人；指導者是卡爾·雷基恩（Karl Legien）修米德（Robert Schmidt）烏姆布來特（Paul Unprreit）根本的傾向，都是改良主義者的。至於考茨·基梅林（Franz Mehring）羅撒·盧森堡（Rosa Luxemburg）對於這種機會主義，竭力實行光榮的鬭爭，而沒有得到實質的效果。

反之，德國工業和國外貿易驚人的展開，德國社會民主黨迅速不斷的數量的增大，投票數的增加，倒反加強了改良主義。一九一二年帝國議會議員的選舉上，德國社會民主黨得票四、二五〇、〇〇〇票以上，即獲得全體投票數的百分之三四·八。送了一一〇名的議員，到德國帝國議會裏去。接着世界大戰就爆發了。

這時候。用第二國際的形式，所表現着的國際勞動運動上，德國無產階級是主要角色之一，這是不待說的了。

在上述那樣社會的債務和社會狀態之下，德國是迎候着悲劇的一天了。這就是世界大戰的勃發。

第十四章 統一國家的形成和俾士麥的政策

—

德國發展成近代的統一國家，即德國高度地發展了爛熟的資本主義，是從十九世紀後半期開始的。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柏林的資產階級革命，爲了滿足自由的要求，也同樣是要滿足國民的要求。然而一舉而獲得勝利的資產階級的背後，到處都出現着實際上戰取了革命勝利的無產階級的威嚇姿態，於是，資產階級就逃跑到剛才敗戰的敵人方面去，逃跑到一八四九年縮壓革命的君主官僚半封建的軍事反動者的一羣人那裏去了。」

當一八四八年，已經議論到資本主義發展的根本的前提條件，即資產階級國家的形成，和國土的統一。他們謳歌着包括斯泰雅省（Steierland）提羅耳（Tirol），奧地利在內的，充滿着光

榮和勝利的德意志人的祖國；謳歌着「由馬斯 (Maas) 到默麥爾 (Memel)，從厄斯 (Eisch) 到柏爾特 (Belt)，德意志的一切都無可比擬的德意志，世界上無比的德意志。」

可是，德國的統一，決不僅是德國的問題。爲了戰取德國的統一，不僅非和諸侯及其他內敵戰鬥不可，更要同外國的干涉作戰。而且，也還一定要受到外國的援助。尤其當打倒拿破崙成功了，都知道這是德國國民協力的結果，隨之民族統一的自覺心，更加提高了。

當時，英國是和法國同盟的，奧國對於兩者都表示好意，德國保持着親俄的中立，而埋頭於國民的統一。陪襯出德國國民的統一運動的，是所謂「自由立憲」的思想。可是，德國的統一上，還存在着許多障礙。

其中，要算內部分裂，和毫無兵力，是頂大的障害物了。年青的德國艦隊也沒有的，長期間，甚至對於蘇爾小國的丹麥，也不敢一攪其鋒。德國頂特出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李斯特，關於國家的分裂，所可怕地損害到經濟發展的利益的，說了這樣的話：「德國四十八道的關稅線和入市線，使國內交通麻痺，它所惹起的作用，正好像人體全身被網縛，因而血液不能通到別部分一樣。從漢保到

奧地利，從柏林到瑞士，爲了做買賣，就一定要經過十個國家，研究十種關稅制度和入市稅制度，支付十次通行稅。可是不幸住在三國或四國相接境的國境裏的，就在懷着敵意的關稅吏或入市稅吏之下，斷送其整個生涯。他是沒有祖國的呀！」

元來德國從中世紀以來，便屬於神聖羅馬帝國；這種國家形態是極粗陋的，完全的國家的統一，並不存在。直到一八一五年，受到俄帝亞歷山大一世的影響，在維也納會議，成立了德意志聯邦。可是與其說這是聯邦，無寧到近於聯盟的程度，上到底不能滿足國民統一這個要求的。「名雖稱德意志聯邦，中央保有無力量的國會，可是列席的卻並不限於德國國民，丹麥王用什列斯威希好爾斯太因（Schleswig-Holstein）公資格，荷蘭王用盧森堡公的資格，該都是聯邦的君主了。」再說到聯邦的君主，它的領土也有在聯邦以外的。譬如像普魯士領的波森州，奧地利領的匈牙利達爾馬提亞（Dalmatien）以及意大利北部等便是。於是在德國國民黨之間，就發生了一個難關；應該統一的德意志，所包括的境界到底怎樣呢？統一運動的元首，應該推舉奧地利，還是普魯士呢？輿論上分成推舉奧地利和推舉普魯士二種；前者主張把全部奧地利的領土（在這領土之

上，包括着有四分之三是不用德語的斯拉夫族，馬扎兒族，以及羅曼斯族等等的異民族，加入在聯邦以內，來建設起廣大的德意志帝國；假使採用這種意見，那末包容異民族的德國，自己就非另有組織不可了。而後者就反對這種削弱中央權力的組織，斷然排斥奧地利，而以普魯士做中心，造成純粹德意志民族所構成的堅強的國家。

然而無論由普魯士王來進行的結成新國家的運動，或一般國民之間所發起的國民議會的統一運動，都設有達到完成；只有十八世紀中葉腓特烈大帝的德意志統一運動，可說是達到了德意志帝國勃興的一個基石的程度。

二

德意志的建設，所以較歐洲其他各國爲遲，其理由是因爲德國長期受到外國的侵略，其次，德國的統一，決不僅是德國的問題，三十年戰爭之後，全德國共同的問題，雖則早已祇有一個；可是還是處於假使沒有外國強有力的政治經濟的干涉，不能決定的狀態裏。加之，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四

九年間，德國反革命的勝利，更使德國的統一，大大延遲了。

要把散處德國的各領主的小國，重新組織成爲統一的議會主義的強國，一共有二種方法。

或是自下而起的革命，推倒多數國王和領主，建設共和政體；或者用自上而下發生的革命，換句話說，把德國雖然並存的諸國家，用戰爭來被大國所吸收。在第二個方法，同時發生是普魯士還是奧地利亞來實行的問題。

這兩個國家，誰能完成「自上而下的革命」呢？那一國來併合諸小國呢？德國諸小國在奧地利勢力之下，結合成爲近代的德意志國家呢？還是普魯士把奧地利從德意志聯邦中排除出去，在普魯士獨裁之下，完成小德意志的建設呢？

自從一八一三年到一八一九年解放戰爭和關稅同盟（一八三四年）組織以來，要把德國的領主弱小國家，組織成統一的議會主義的強國，就存有三條道路。第一個方法，把各國完全除去真正的統一方法，也就是公然革命的方法。這是使當時意大利完成其目的的道路。然而一八四八年反革命以後，極度恐懼民衆運動發展的德國資產階級，這條道路是完全不敢希望的。第二個

方法，是在奧地利統治下的統一。這是德國的特別是普魯士的資產階級，所不能答應的。因為奧地利是奉天主教，且在經濟方面也比較落後，故可認為是和德國的自由主義的統一運動完全無緣的一種勢力。簡單說來，要在奧地利的被廢下來統一德國，實在是浪漫的好夢。當德國中小領主，一八六三年在法蘭克福推戴約瑟夫（Francis Joseph）為德國皇帝時，這事已被證明了。最後第三個方法是普魯士領導下的德國的統一。即是推戴着領主的地主的普魯士，造成德國諸小國家的統一。這個方法實際上被採用了，德國向資產階級的發展，就以資產階級化的大地主經濟——領主的形態——為先導，而轉變過來。

在一八六〇年前後，普魯士出現二顆明星，對於實現第三個方法上大有功績。這就是史學者兼政治學者多費乞克（Von Treitschke）和總攬普魯士政局，與全德主義相終始的俾士麥。

多費乞克懷着以普魯士為中心的德國統一的宿志，是一個所謂小德意志派；他為德國的統一，深深地敵視了奧地利。從一八五九年開始，逐漸就表明了他的全德主義的態度，為了完成德國統一，絕叫了打破小邦的學說。然而把全德主義的理想移到實行的，卻是生在普魯士的沙夫好燻

(Schaffhausen) 地方的俾士麥。這就是說，好久以前起，經濟上政治上都有必然性的德國國家的統一，就由普魯士土地貴族型的普魯士人的手裏來完成了。這就是俾士麥這個人。用了他們鐵樣的政策，德國就由「自上而下的革命」完成國民的統一。所以，德國的國民的統一，是俾士麥式的，領主型的；可是德國統一問題，可說是暫且解決了。

三

德國的統一所以落後，其原因可說是：德國遭受外敵的侵入；德國缺乏兵力；普魯處於對立狀態；沒有能夠統一德國的優勢的君主等。

一八五八年，腓特烈·威廉四世患病，由皇弟威廉攝政。一八六一年威廉四世歿後，他就承襲王位，改稱威廉一世（Wilhelm I 1297—1888）。當時德國雖已採用國民皆兵主義，卻還不曾一般適用，當時一般大衆，多數縮短兵役年限，或完全被免除兵役。所以，普魯士的兵額，平時約十三萬人，就到了戰時，也不過二十一萬五千人。威廉一世知道德國統一上還缺乏兵力，首先就計劃擴張軍

備，任用毛奇（Grat Von Moltke 1800—1891）爲參謀總長，龍尼（Grat von Roon 1803—1879）爲陸軍部長，而確立了普魯士的軍備制度。

這個軍制案的骨幹，是增大平時和戰時的兵力（平時有步兵十九萬，戰時有四十五萬人）；每年入營的新兵，以人口的增加爲標準，來增加數額（從四萬人增加到六萬三千人）；縮減後備兵役的服役年限，加倍豫備兵役的服役年數（四年）等等便是。可是這種改制，特別是豫備服役年限的延長，並不是一般大衆所喜悅的；而且議會——自由派議員——並不認爲有軍備擴長的必要，正面起來反對，於是威廉一世就把議會解散了。可是王黨——保守派——在選舉中失敗了，新黨的進步黨（Fortschritts-Partei）佔着壓倒的勝利（新議會有自由派二百五十三人，保守派議員祇有十六人）；威廉一世的軍備擴張，就被新黨在一八六二年否決了。

俾士麥就被推舉爲宰相，來收拾難局。俾士麥站在一八六〇年代領主的普魯士政府的先導，「不用演說和投票，用鐵和血，」自上來完成德國統一。俾士麥的方策，是專斷野蠻，反動而且非法的。可是，又不得不寬恕它的。即使說，這種手段是卑劣的，然而目的是愛國的，他貢獻生命於德國統

一。可以打破那妨害德國統一的武器，俾士麥已經鍛鍊成了。在這個事業完成之前，德國對於丹麥、奧地利、法國等三個國家，不得不開始三次戰爭了。

丹麥戰爭發生於一八六一年，爲了什列斯威希和好爾斯太因這二個公國的處理問題。對於奧地利是一八六六年的七星期戰爭，對於法國是一八七〇年七月開始的普法戰爭。

一八六〇年代之終，戰爭的危機，擴展到萊因西岸，普法之間的敵視心，極度高昂。戰爭爆發的直接原因，是西班牙王位的繼承問題。德國資產階級對奧勝利以後，就信賴俾士麥，就不惜爲德國軍備耗費精力和資本。

普魯士在俾士麥指導之下，熱心地正在準備着不可避免的對法戰爭；反之，法國既軍備不整，在開戰當兒，被巴黎激昂的人心所推動，開戰後的形勢，真是毫無戰爭準備；就是在政府內部，外交部和軍部的聯絡上，也失掉預期着的奧意的援助。尤其是拿破崙第三之被圍於師丹（Sedan），與八萬法軍共同被俘以後，形勢就完全不可收拾了。

法國的敗北，以後就以一八七一年二月，占領巴黎和訂結屈辱的和平而告終了。

現在，法國不僅不再能妨害德國的統一，而且失去亞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地方的豐饒的鐵礦，還不得不支付五十萬法郎的巨大賠款給戰勝者的德國。賠款的支付，十萬萬限在一八七一年內，其餘的在三年以內付清，未付清之前，得在法國境內駐兵。德國按照俾士麥的豫定行動，即獲得了五十萬法郎，不僅能夠使德國再生，且成爲一個強有力的統一國家，而且從普法戰爭中所得到的亞爾薩斯·洛林的礦鐵，成爲德國方面繼續強持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的資源根據地，時常使法國苦惱着了。

普法戰爭中德國的勝利，是德國獲得殖民地（這是威廉二世登位一年，即一八八八年開始的）的前哨戰。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在一九一九年世界大戰後，德國簽訂凡爾塞和約的同一的凡爾塞皇宮裏，逢行着充滿凱歌的德意志帝國成立的宣言了。

這樣，德國在法國的首都，宣佈德意志帝國的成立，實足稱揚鐵血將軍俾士麥的軍國主義政策。

要而言之，普法戰爭的總結，不是普法兩國間糾紛的終結，而意味着亘久的極波瀾曲折的德

國統一的完成。

德意志帝國就由二十五個聯邦，亞爾薩斯·洛林二個帝國直轄領地，而成立的；大體上由德意志人構成；異民族祇有波森（Posen）和普魯士的波蘭人，什列斯威卻·好斯太因的丹麥人，亞爾薩斯·洛林地方的法國人。

德意志帝國的組織如下。它的政治組織外觀上和美國相似，是二十五個小邦所構成的聯合國，各有強大的地方自治，爲了共通的目的，被統一在柏林中央政府之下。德國的中央集權較美國更廣汎，如法人的取締，鐵道國有，社會的立法，民事刑事的立法等，並不放任給各邦的，而是德意志帝國立法的問題。各聯邦的法律，由該邦的官吏執行，受中央政府的監督。德意志聯邦是帝國，皇位由普魯士君主霍亨索倫（Hohenzollern）家世襲的。各邦除了三個共和市，亞爾薩斯·洛林之外，都是君主政治。君主依領土的大小，稱爲王，大公，公侯，與地方立法部，共同治理其領內。

構成德意志聯邦的各邦，列舉如下。王有四：普魯士，巴威，薩克森，符騰堡。大公國有六：巴登（Baden），黑森（Hessen），梅答楞堡·施微林（Mecklenburg-Schwerin），薩克思·威瑪·挨森

那哈(Saxe-Weimar-Eisenach) 梅略稜堡·斯特來利芝(Mecklenburg-Strelitz) 鄂爾敦堡(Oldenbourg) 公國有五布藍士外喜(Braunschweig) 薩克思·梅寧根(Saxe-Mainingen) 薩克思·阿爾丁堡(Saxe-Altenbourg) 薩克思·科堡·臬塔(Saxe-coburg-Gotha) 安哈爾特(Anhalt) 侯國有七士發次堡·查台爾喜姆(Schwarzburg-Sondershausen) 士發次堡·魯道斯他(Schwarzburg-Rudolstadt) (一九一六年聯合的) 發爾台克(Waldeck) 魯斯舊邦(Reuss Greiz) 會斯新邦(Reuss-Schleiz-Gera) 斯溫堡·里本(Schauenburg-Lippen) 立本(Lippen)。最後是三個自由市律伯克·布勒門·漢堡。此外尚有二個新獲得的帝國領地：亞爾薩林·洛林。

四

德意志帝國的憲法，由俾士麥草起，根據北德聯邦的憲法，稍加訂正而成。普魯士王威廉，做德國皇帝，總攬行政和軍事，立法機關是聯邦參事院(Bunderrat) 和帝國議會(Reichsrat)。聯

聯邦參事院是帝國裏頂有勢力的統治機關，由六十一個議員組成的，各邦按照大小來規定議員的人數。即普魯士十七人，巴威六人，薩克森，符騰堡各四人，亞爾薩斯·洛林，巴登，黑森各三人；梅喀楞堡·施微林，布藍士外喜各二人，其他諸小邦各一人。聯邦議會的代表，依照他所代表的君主，或使他得到議員地位的人的訓令，來投票的。立法機關的聯邦議會，創造一切重要立法，能夠發佈具有法律力量的命令。帝國議會根據二十五歲以上男子的普通選舉，每十萬人選出議員一人的比例，共選出議員三九七人組成的。要之，雖說是德意志帝國，並不會達到完全一個單位的國家，還存在着聯邦內部的對立。然而無論如何，德意志帝國因為獲得賠款，才能在政治上結成帝國的形態，這是非認取不可的；這是有賴於俾士麥精進的努力。

其次，俾士麥在外交上的目的，是維護一八七〇年所獲得的土地——豐饒的鐵的生產地。俾士麥以為德國既然完成統一，便對世界各國，占得優勢的指導的地位，他所冀望統一的意義是這樣；因而就造成了以法國為「永遠的敵人」，成爲以後歐洲不安的種子。使法國在歐洲陷入到孤立狀態，這是俾士麥外交政策的目的。

可是，俾士麥幾乎一些不吐露出所謂世界政策這樣大言壯語。這是因為當時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在歐洲諸國相互間的關係；歐洲諸國，關於其他大陸的政治，幾乎並不關及的。

因而，德國所頂努力的當面的問題，是妨礙俄法間的同盟。德國地理上介在這二國之間，把兩國同盟，看做是德國的危險線，最加警戒；俾士麥的計劃，實際上是奏效了。一八八三年，德奧意三國間，形成了所謂三國同盟。這三國同盟一直續繼到歐洲大戰之前。

復次是俾士麥在施政上的功績。俾士麥的經濟政策，起因於下面三種原因。第一是經濟的，恢復國內的實業蕭條。第二是社會的，救濟無產階級。第三是政治的，牽制社會主義的運動。我們更可以說，他的經濟政策，是爲了鎮壓社會主義而計劃的。俾士麥開始留意到國內政策，實是一八七七年以後的事。因爲稍早以前，德意志帝國組織以後，俾士麥忙於對法的外交工作，無遑顧及國內政策——財政和階級問題，所以就一任內閣書記長臺爾布洛克 (Martin Friedrich Rudolf von Delbrück, 1817—1903) 的策劃。然而俾士麥對於經濟政策並不是沒有立場的。一八七六年他反對臺爾布洛克的政策，臺爾布洛克就因而辭職，財長康法生 (Otto Camplausen, 1812—

1896) 繼任，又爲了保護關稅問題辭職；俾士麥不得不親自解決國內政策了。

俾士麥一方面力求救濟無產階級，同時對於煽動他們的社會主義者或進步的學者，極力鎮壓；他採用這種內外夾攻政策，認爲是當務之急；再又因爲他認爲社會主義者問題，專是軍事的問題；所以就斷然實行「軍事的」大政策。

俾士麥首先認爲，國家本身採取社會的處置——向盲目的工會運動進擊——是最適當的政策。舉凡「社會主義的要求中，有理由的，而且在現存秩序的範圍裏，認爲能夠實行的，」希望加以實現。

俾士麥是基督教徒，又是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的信徒，他採用社會改良主義，並沒有怎樣不可思議的。所值得注目的是，俾士麥頗受羅德倍斯都 (Johann Karl Rodbertus, 1805—1857) 瓦格納 (Adolf Wagner 1835—1915) 以及拉薩爾的影響。尤其要算拉薩爾，他借俾士麥的力量，用勅令來公佈普選；這二人互相接近，思想上也有共鳴的地方。本來，俾士麥和拉薩爾，從社會運動上看來，立在不同的兩個極端；可是因爲二人都把共產主義的政黨，當作共同的敵人，所以就共同

張開國家的政治戰線。此外，他們二人在思想上並不是沒有親和點的，這就是他們的國家觀。俾士麥雖不懂黑格爾（Hegel）的哲學，黑格爾從普魯士國家抽象出國家觀，推動俾士麥的也是他的母國——普魯士國的國家觀呀。

五

再次，我們觀察到俾士麥支配下德國勞動者的狀態，這要比英法等先進國惡劣得多；斯太因的農奴解放以來，雖然勞動者的自由，受到法律上的保護，過重的租稅，也已被廢止；可是實業資本家努力的擴大和強化，反使無產階級的工資，到處大大的降低，生活被抑低到水準以下。加之，一八五七年經濟恐慌的結果——十九世紀第四次恐慌——一八四〇年到一八五〇年為止的反動後德國無產階級的醒覺，這時就採取勞動運動的形態而出現了。

德國無產階級不得不在兩條戰線上鬭爭。一方面，要擺脫俾士麥反動政府的要利用勞動者，當作和自由主義資產階級鬭爭的武器；另一方面，非要從那種偽善的，主張勞動者「自助」的自

由主義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下，解放出來不可。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當和領主的地主階級的政治相鬭爭的時候，就在勞動者陣營裏找求同盟者。可是因為恐懼三月革命的各種事件，同時也就努力把勞動在和共產主義分離開來。

一八六〇年代德國勞動運動的特徵，是爲了確立階級立場，和獨立的政治路線而鬭爭。這時候，無產階級內部，分成二派，就是拉薩爾派和倍倍爾派。而鐵板匠海臺爾在一八七八年五月十一日，諾皮林在同年六月二日，相繼企圖暗殺皇帝的陰謀，對於社會黨鎮壓令的頒佈，實在給予了良好的機會。這樣，一八七八年十月，有名的社會黨鎮壓法就制定了。這做了俾士麥執政時，壓迫社會黨的一個武器。該法有效期間雖爲四年，然而二次延長，一直施行到一八九〇年。

根據這個法律，憲法保障國民的各種自由，社會主義者都被剝奪了。德國政府借了法律的名義，禁止了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共產主義的集會結社出版。在前後十二年的施行期間，根據社會黨鎮壓法被禁止的出版物，計有定期刊物一五五種，不定期刊物一二〇〇種之多；一八九〇年七月爲止，受到禁止的結社，數達二一七個。此外在漢堡，萊布齊，法蘭克福等地，根據社會黨

鎮壓法第二十八條，實際上在施行局部戒嚴令下面，被命離開當地的有九〇〇人，被逮捕下獄的計有一，五〇〇人。

俾士麥用恐慌所要完成的目的有二個。第一，他要把國民自由黨逼到走頭無路，擊潰他們的政治勢力。第二，要絞殺社會民主黨。第一目的，雖然可說已經完全達到，可是卻不能完成他的第二個目的。

國內集合結社出版被禁止的結果，社會黨就在外國發行機關報社會民主主義者（先在沮利克（Zürich），後在倫敦刊行），再把它轉送到德國國內。社會黨並不停止其繼續活動。結果，總選舉的得票，一八八一年雖然減少到三一，九六一票，一八八七年就增加到七六三，一一八票；以後除了一八八七年一次，常有顯明的增加，一八九〇年，社會民主黨的得票，終於達到一，四二七，二九八票之多；社會黨鎮壓法結果就完全失敗。一八九一年三月，俾士麥辭職，同年十月一日，該法也被廢止了。

六

俾士麥知道光採用鎮壓政策，在他自身也是不利的。所以運用勞動者的懷柔政策。

這就是根據德意志憲法第一六一條的社會強制保險法。一八八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德國政府向帝國議會頒示這樣詔勅：「社會保險立法，乃救助社會罪惡之立法；不任社會民主主義之放縱，加以抑制，同時求積極助長勞動者的幸福。」勞動保險法在德意志帝國的政策上，區劃出一個轉機。最初決定的，是一八八三年三月的疾病保險法；把這個法律作為基礎，第二決定的傷害保險法，也就不難在議會通過，一八八五年變成法律，於是一八八九年六月發佈老廢保險法。這三種法律，以後經過幾次修訂，終於擴張為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九日的帝國保險條例 (Reichsversicherungsordnung)。

這裏，我們關於社會保險和勞動能率，有稍加說明的必要。這就是說，社會保險在增加勞動能率上，償付加在該國實業資本家的負擔，還是足足有餘的。第一，社會保險直接增加勞動者的能率；

第二，間接增加勞動者子孫的能率，可以長期服役於實業資本。

總而言之，普法戰爭以後，德國的經濟政策，第一是俾士麥底軍國的和平政策——保護政策，幣制改革，鎮壓社會黨，社會保險；第二是李斯特的資產階級經濟論和保護政策等等，都能收得巨大的成功。

至於外交和軍制政策，根據腓特烈大王的「祕密爲政」上軍事上不可缺少的道德，我等務須注意儘可能將吾人之計劃與野心隱蔽。這個方針，用俾士麥的力量，毫無遺憾地被發揮了。即第一，在普法戰爭上，巧妙地使法國陷於孤立；第二，用武力做外交的後盾，儘可能不使對方怨恨，運用巧妙的手段。第三，和毛奇將軍的參謀本部的計劃，及陸軍的擴張，取得連絡，以便於外交政策的完成。第四，根據所謂「遠征近交」的外交方針，和奧地利結合，着手東方問題，由於德奧意（一八七二年）三國的簇使，煽動俄土戰爭（一八七七年——一八七八年）的爆發；德奧意終於在一八八二年締結三國同盟（一八八三年）。最後第五，努力於履行軍國主義上所必要的軍國民教育的普及。

第十五章 作爲帝國主義的世界政策

實業革命侵入德國，遠較英法爲遲。原因是德國殘留着專制的封建諸小國，因而德國資本主義的幼芽，要打開自己的道路，便異常困難。所以，英國式的自由貿易主義，輸入到德國，已經在一八六〇年代前後；德國實在是長期間的採用保護貿易主義的。

一八五八年在皋塔舉行的經濟調查會議，德國各邦所選出來的代表，幾乎全都禮讚自由貿易主義，德國的商業政策，終於建築在自由主義上。可是，俾士麥明白宣稱：「把自由貿易當做絕對的主義，是完全錯誤的，」這話特別強烈的表現保護主義的色彩；不過那時俾士麥爲碌碌於對法外交，並不參與國內的經濟問題；所以，這個時代德國的經濟政策，是由俾士麥左右的自由貿易論

者的手裏來完成的，一八七八年或一八七九年爲止，俾士麥內閣，採取着差不多近於自由貿易的政策。以後，自從俾士麥干涉國內政策以後，形成對於自由主義經濟的反動，一八七二年社會政策學會（Vere in für sozialpolitik）在埃森那哈開會，一八八〇年的德國的社會政策，大體上就根據學會的宣言的；而這個宣言卻帶有領主的性質。

到了一八八八年三月，威廉一世逝世，子腓特烈三世嗣立，他是採用自由主義，不喜歡俾士麥的武斷主義，甚至連一八六二年的軍制制度也是反對的這樣的人物；作爲霍享索倫家的君主看來，無寧會引起奇異的感覺。這是因爲所謂霍享索倫家，原本是爲了防禦外敵而設置的一個有手腕的選舉侯，自從腓特烈大帝侵略西里細亞以來，以霍享索倫家做中心的軍國主義的思想和興味，深深地銘刻在德國人的頭腦裏；一說到霍享索倫，這就是軍國主義的表象的緣故。

可是腓特烈三世，因爲秉天不厚，在位只有三個月，就在一八八八年六月十五日逝世，威廉二世就繼而登位。當時威廉二世還不過是二十九歲的青年。

在近代的君主裏，沒有像威廉二世那樣廣大以「凱撒」（Kaiser）之名爲人所知的。在

大衆之間再沒有像他那樣有名聲的了。

凱撒是有顯著的特殊人格的人，覺得好如帝國主義的感情的物體化。

德國的世界政策，可說在威廉二世皇帝的治下，纔開始具體化的。原來，俾士麥的政策，即威廉一世治下的德國的政策，實在可說祇把普魯士當作霸王，要在它下面完成聯邦的統一；而它的外交方針，不如說是消極的，固守普法戰爭的勝利；譬如像俾士麥一手創造的三帝同盟（一八七二年）或三國同盟（一八八三年），他目的都是防衛性的，決不是侵略的。

雖然俾士麥有時也喜歡玩弄馬基亞弗利主義的權變，又好用治夷制夷的政策；可是它主要的着眼點，是在期待着德意志帝國國際地位的安全，當作當面的敵人而防備着的，實在是法國。

俾士麥爲之而大逞手腕的，是歐洲大陸政策，這個決不是世界的政策。所以如像對於殖民政策，也是極冷淡的。這是因爲一則當時德意志帝國建設以後，爲日尙短，忙於內政問題，聯邦統一等等，無暇講究掠奪殖民地的政策，而且，德國也沒有足夠的商船和兵艦。等到威廉二世一做皇帝，俾士麥不能和他相容，俾士麥任職三十年，就在一八九〇年退隱，閑居在腓特烈斯路（Friedrich-

arub) 的私邸，被封爲魯恩堡 (Lauenburg) 公爵。

大海軍論者，殖民獎勵論者這一派，被抬舉出來了；年青的皇帝威廉二世，知道俾士麥的才能和偉大，同樣也知道俾士麥的缺點。因爲俾士麥決不是崇奉殖民政策的，而德國爲了和先進資本主義諸國相伍，不能再停留在歐洲大陸上了。

因而，威廉二世的勝利，與其說是他的人格的勝利，倒是爲了他的政策——世界政策——擊潰了俾士麥的政策。俾士麥就掛冠辭職，同時德意志的對外方針，便突然一變，從「大陸政策」推移到「世界政策」了。

畢竟因爲這時候，德意志帝國的基礎已經非常確定，也早沒有內部問題的憂慮，尤其是萊茵河沿岸工商業的發達，就有向海外發展，促進商品輸出的必要。所以，我們可以說德國走向獲得殖民地的運動，是從威廉二世即位一年，即是從一八八八年以後開始的。雖然德國的新殖民政策，在這以前已經開始了，也確是事實；關於這，祇要舉出一八八二年德國殖民地的成立，以及一八八四年那哈替卡爾博士 (Gustav Nachtigal) 在幾內亞海岸的海動，彼得斯博士 (Karl Peters)

在東非的各種先驅的行動，便足夠了。

二

德國自從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大捷以來，資本主義實在完成可驚的長足的發展，一躍而列入歐洲強國的隊伍裏。這是德國的整個政策，即保護貿易主義，科學研究的獎勵金，和一般教育方針等，一切都相成相輔地造成德國可驚的經濟的成果。

現在，簡單地用數字來加以說明。一八七一年新德意志帝國的居民，有四千一百〇五萬八千七百九十二人；一九〇〇年已達五千六百三十六萬七千一百七十八人；現在已達六千七百萬人以上。生產率以一八七六年達到最大限度，每千人有四十七人。但死亡率占生產率的四成，每千人中占一·七人，現在已從計算中把這除外了。下表可以看出德國生產率的變動：

一八五一年——一八六〇年	每千人中三五·三人
一八六一年——一八七〇年	每千人中三七·二人

一八七一年——一八八〇年	每千人中三九·一人
一八八一年——一八九〇年	每千人中三六·八人
一八九一年——一九〇〇年	每千人中三六·二人

從一九〇〇年起，生產率表示出下面那樣的減少：

一九〇〇年	每千人中三五·六人
一九〇一年	每千人中三五·七人
一九〇二年	每千人中三五·一人
一九〇三年	每千人中三三·九人
一九〇四年	每千人中三四·一人
一九〇五年	每千人中三三·〇人
一九〇六年	每千人中三三·一人

這個時代，對外貿易從六十萬萬馬克，上昇到一九一萬萬六千萬馬克，次於英國的二百五十

萬萬馬克，凌駕過美國的一五〇萬萬馬克。國外貿易的發展，實際上與其說是表示着食料品被輸入，倒不如說依存於國外貿易的國內生產，造成飛躍發展的好機會；而首先能夠解決德意志帝國因人口增殖所引起的人口問題的，就是國內實業的發展。

其次，到了一九一〇年，德國各海港入口船隻中，計有德船一萬一千九百隻，外船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八隻。德國造船所平均每年新造汽船七十隻，帆船四十隻。在從事海外貿易的海國人民中，德帝國實在可以排在第一列裏了。

德國汽船的發達

年	次	隻	噸	數	船	員	數
一八七一年		一四七		八一、九九四		四、七二六	
一八七二年		三一七		一八三、五六九		九、一四七	
一八七三年		四一四		二一五、七五人		八、六五七	
一八七四年		六六四		四二〇、六〇五		一四、〇〇六	

一九〇三年	一、五四五	一、六二二、四三九	四二、九八四
一九〇四年	一、六二二	一、七三九、六九〇	四六、四六
一九〇五年	一、六五七	一、七七四、七〇二	四六、七四七
一九〇六年	一、七六二	一、九一五、四七五	五〇、三〇三

德國帆船的發展

年	次	隻	噸數	噸數	船員數
一八七一年		四、三七二	九〇〇、三六一	二四、七三九	
一八七二年		四、四二六	九〇一、三〇一	三三、二一五	
一八七三年		四、二四六	九六五、七六七	三一、〇〇三	
一八七四年		三、四三八	八五四、九四七	三四、八三九	
一九〇三年		二、二二二	四九八、五〇二	一一、五一六	
一九〇四年		二、二五八	四九七、六〇七	一一、七〇一	

一九〇五年	二二,二九四	四九三,六四四	一一,九一四
一九〇六年	二二,二九九	四七一,八三六	一一,八〇九

或許有人會這樣說：德國造船業所以表示出這樣的飛躍，因為一方面他能夠以英人所不能忍受的微小利益，來接受造船的定單；甚至英國方面認為無利可得的，德國也會接受下來。可是德國造船業，果然能夠像所說樣子，附和在先進英國造船工業後面，而獲得利益嗎？事實決不是這樣的。因為在德國當時，利息要比英國高，所以德國人不得經營着比英國人的利潤更少的事業；造船工業並不例外。德國人是否無利益地從事造船的營業呢？下面二個統計，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德國造船工業資本總額

一八七〇年	四八〇萬馬克
一八八八年	一,五三〇萬馬克
一八九〇年	三,六一〇萬馬克
一九〇〇年	六,六〇〇萬馬克

根據上表看來，不是可以知道嗎，德國造船工業資本總額，從一八七〇年到一九〇〇年為止的三十年之間，以非常速度增加了。那末資本的利息怎樣呢？可看下文：

造船工業的總利益額和紅利率

年	次	總	利	益	紅	利	率
一八八〇年			四五〇,〇〇〇	馬克		七·九四%	
一八八二年			一,〇三五,〇〇〇	馬克		九·九三%	
一八八四年			一,二六六,一〇〇	馬克		一二·一五%	
一八八六年			一四五,八〇〇	馬克		一·一五%	
一八八八年			八五八,一五〇	馬克		六·五七%	
一八九〇年			一,七五七,五〇〇	馬克		八·一五%	
一八九二年			一,八三一,一〇〇	馬克		六·〇八%	
一八九四年			一,五一四,九〇〇	馬克		四·九八%	
一八九六年			一,九一四,五〇〇	馬克		五·五五%	

一八九八年	二、九五八、〇八〇	七·八九%
一九〇〇年	四、五〇三、五〇〇	一〇〇·五%

根據上面統計看來，便可以知道，德國造船業資本，雖然達到非常巨大的數量，而它的利益，也就逐漸有增加的傾向。雖然在這個統計的總利益裏面，因為公司的不整理，或資本過大——固定資本過大——的結果，大大地減殺了總利益量；可是還有上表那樣的利益。這是說明德國造船業如何獲利，並不在英國的資本利潤以下，能夠得到相當的利潤的。此外，因德國造船業的發展，同時各造船所所使用的職工有幾多增加，對於勞動者有什麼利益，這一看下表便可知道：

德國主要造船所使用職工數

公司名	一八八〇年	一八九〇年	一九九九年
西秋公司	一、二〇〇人	三、〇〇〇人	五、八二〇人
巴爾幹公司	二、二〇〇人	四、五〇七人	六、六二八人
好華德公司	四〇〇人	一、三〇四人	二、三七〇人

普洛恩德鐵公司	四五〇人	二、〇五一	四六四九人
合計	五、四二三人	二、八二七人	三四、六七〇人

從這個統計看來，可以看得出，德國主要造船公司，在二十年以前，實在還是微末不足道的，到了十九世紀末，年復一年的已經完成巨大的發展，使用到六倍的職工。可是，這裏應當注意的，德國造船所的勞動者人數的增加，是表示着工資的相對減少。

此外，關於德國的農業或鑛業的產量上看來，現在德國產量年達二百萬馬克，英國不過八十萬馬克罷了，這裏也看得到德國之資本家的成熟。其情形如下：

德國耕種地面積（單位公頃）

年	次	穀物種植地	菜蔬種植地	園	圃	牧畜場
一八八三年		三、五七、〇〇〇	六、七〇、〇〇〇	四、一五、五〇〇		三、三六、三〇〇
一八九三年		三、五、九二、〇〇〇	七、八二、〇〇〇	四、七六、二〇〇		三、七、〇〇、〇〇〇
一九〇〇年		三、〇、五九、〇〇〇	七、三、七、〇〇〇	四、八二、七、〇〇〇		三、三、八、七、〇〇〇

如像煤的產量，漸漸接近於英國；鐵從一九〇三年以來，早就達到英國的產量了。就如下表：

德國煤產量

一九〇一年	二九、三九八百噸
一九〇二年	三三、三〇六百噸
一九〇三年	三六、三九二百噸
一九〇四年	三五、九一九百噸
一九〇五年	三七、四三六百萬噸
一九〇六年	一〇八、九三九百萬噸
一九〇七年	一〇七、四七三百萬噸
一九〇八年	一一六、六三七百萬噸
一九〇九年	一二〇、八一五百萬噸
一九一〇年	一二一、二九八百萬噸

至於德國鐵工業的發達，更加顯著：

德國內地產鐵量（包括盧森堡在內）

一八七二年	五、八八六、〇〇〇噸
一八七三年	六、一七七、〇〇〇噸
一八七四年	五、一三七、〇〇〇噸
一八七五年	四、七三〇、〇〇〇噸
一八七六年	三、七一二、〇〇〇噸
一九〇二年	一七、九六三、六〇〇噸
一九〇三年	二一、二三〇、七〇〇噸
一九〇四年	二二、〇四七、四〇〇噸
一九〇五年	二二、四四四、一〇〇噸
一九〇六年	二六、七三四、六〇〇噸

德國鐵產量（包括盧森堡在內）

一八七一年	一、四二一、〇〇〇噸
一八七二年	一、九八三、〇〇〇噸
一八七三年	一、六六〇、〇〇〇噸
一八七四年	一、七五九、〇〇〇噸
一八七五年	一、六一五、〇〇〇噸
一九〇一年	七、八八〇、〇〇〇噸
一九〇二年	八、五二九、九〇〇噸
一九〇三年	一〇、〇一七、九〇〇噸
一九〇四年	一〇、〇五八、三〇〇噸
一九〇五年	一〇、八七五、一〇〇噸

這就是大體的情形。威廉二世治下的德意志帝國，繼承着俾士麥的軍事的和平政策之後，達到了幾乎一切都趕出歐洲各國之上的盛況。

那末，德帝國看來可以就此滿足，不必發生其他領土野心；可是新的帝國主義的德帝國自

身，對於它的地位，頗感不安。所謂不安就是：第一，感到頂大苦痛的，是人口過剩。第二，製造工業非常發達的結果，就有在海外找求市場的必要，這就是過剩商品的傾銷（Dumping）。最後第三，是原料供給的根據地。即是要求在海外找求所謂「陽光照臨的優良」土地，來當做原料資源地。

德國自然發生地由於上述三個原因，就放棄繼續到現在的和平政策，而發生了征服世界政策的帝國主義的工作。上述三個原因，被認為德國繼續維持其資本家生產的發展，所必須的條件。要而言之，爲了要和英法俄這些世界強國競爭，德國土地是過於狹少了。那末，就德國的地位看來，爲了生存上認爲有在海外獲得新領土的必要，也並非無理的。

有一部分的和識者，早就注目到這點，在一八八二年就創立德國殖民協會（Deutsche Kolonialgesellschaft），一再努力鼓吹殖民熱。結果，一八八四年以來，開始在非洲南洋各島，開拓了新殖民地。可是，地球上，有做殖民地希望的土地，幾乎全被英法等先進資本主義各國所占領，後來德國到手的，完全不適於白人居住的熱帶不毛之地。所以，德國殖民政策，也可以說大體上是失敗告終的。

而且，德國的尋求殖民地的運動還到處受到英法的壓迫，不能夠如意的發展。這裏，德國就須要巨大的決心。第一是擴張海軍；其次是決定「柏林報達鐵道計劃」，於是就看到德國世界政策的發軔了。

三

德國帝國主義的政策，有大陸政策和世界政策，上面已經紀述過了。在強烈的信念下面，俾士麥完成大陸政策，威廉三世完成世界政策。德國的大陸政策，分成全德主義（All-deutschtim）和汎德主義（Pan-germanismus）。用哈塞（Ernst Hasse），他是全德協會（All-deutschbund）的會長）的用語說來，前者是鄉土政策，而後者是邊境政策。即是說，汎德政策，有比全德主義前進幾步的膨脹的帝國主義政策的意味。可是，無論怎樣，他的理想是大陸政策，不應當稱做世界政策的。換句話說，它是對法工作的一個方案。

然而據華德生的話說來，汎德主義的理想是這樣的：第一，以一萬萬三千萬到五千萬的人民，

做經濟上軍事上的單位，建設中部歐洲。第二，匈牙利和波斯灣之間的整個地方，都包括在新的大關稅同盟之內，實現柏林報達鐵道的夢想。第三是獲得海上霸權和世界的權力。據華德生的意思，汎德主義和世界主義之間，相差真不過極微些的。扼要說來，華德生所說的第一項政策，是在說明全德主義的理想。第二項政策，是指汎德主義的野心。而第三項政策，是論到德意志海洋政策。所謂全德主義，汎德主義，軍國主義，乃至所謂海軍主義，都不外是德國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準備工作而已。德國的汎德主義或全德主義等，祇少可算得是解釋世界大戰的一個鍵罷。

據施拉達姆博士說：「所謂汎德，是德國人主張凡在德帝國境上集羣而生活的地方，聯合起來的一種主義，這畢竟是和國民主義相彷彿的。說到汎德主義，假使光在這個局限了的目的裏，那該是正常的罷，可是，決不僅此而已。即是說可以推斷得出：它的目的所在，是更要廣大前進，大凡和日耳曼種族多少有起源關係的民族，也要合併在德帝國的版圖裏面的。這已經是一定不可承認的了。可是，汎德主義還不限於此。所謂汎德主義，實在是普魯士式的主義；它的目的所在，除了國語或人種問題之外，凡於霍亨索倫家的勢力上認為有利的各方面的地方，都要併合的。」

這就是德國進到掠奪殖民地的政策。原來跟英、法、俄比較起來，德國所掠奪的要落後得多。德國要掠奪凡是認為有利的一切土地。我們看到全德協會會長哈塞所著的德國的世界政策這本小冊子，這就是關於德國經濟怎樣非從國民的前進到國際的不可，就給予帝國主義的說明。

即是說，在二十世紀，德國作為生活的必要條件，非採用不可的，就是活潑的「德國世界政策」上述全德協會的宣傳小冊（一八九七年）實是在種種意味上，表示德國的汎德政策的進行。

實在正像哈塞所說的，帝國主義的德國國家所取的方向有二：一是大陸，一是海洋。同樣以大陸為目的，也能夠區別出兩個主張。這就是全德主義以及汎德主義就是。

第十六章 帝國主義的進展

一

爲了觀察德國帝國主義的發展，可以從威廉二世登位一年（即一八八八年）開始；因爲這同時又是爲擴張軍備而募集新公債的一年，所以是頂頂妥當的。的確，德國的新殖民政策，是從這一年開始的，這是事實；可是在這以前，自從一八七一年德意志大國家形成以來，德國就已經嘗試許多海外的活動，我們在論到新殖民政策上，早就說到過了。可是，這些都不過是豫備的行動罷了。俾士麥爲了募集二千八百萬馬克的新國債，用作德國擴張軍備，在一八八八年二月六日的演說，可說在德國政局上，因而也在歐洲政局上，是劃時代的。這裏，除了德國金融工業資本的大膨脹以外，還有種種原因。

第一，一八八五年法國的法律，把軍需品的輸出合理化了。法國軍需品迅速流入到歐洲和美洲市場，立刻反應到德國軍需品工業上來；結果，引起德國工業急速的擴張，和形成那以有名的萊茵商會爲首領的許多企業聯合。第二，德國國際地位上的重要勢力，必需要這樣軍備。德國知道本國東西兩部分國界，同時受到威脅，正在遭逢到俄法兩國聯合的危險。第三，德國正在小亞細亞伸張勢力。一八八八年，德國某一新提加 (Syndicate) —— 後來成爲阿那托力亞 (Anatolia) 鐵道公司，接受德意志銀行的金融 —— 獲得從斯克脫里 (Skutari) 到依斯美特 (Esmid) 的鐵路線的九十九年租借權，和把該線連絡到昂哥拉 (Angora) 的權利。以後，德意志銀行就變成在土耳其境內一切德國鐵道敷設的背後所隱匿着的真正勢力了。該路到一八九二年實際通車了。一八九三年，德人更獲得二個權利。一個就是經過開沙里亞 (Kaisarie) 和底格里斯 (Tigris) 河流域，一直延長到報達的權利；另一是敷設支線到敘利亞 (Syrien) 的權利。後者在一八九六年通車；延長到底格里斯河流域一線，因俄國抗議而失敗了，這對於德國的報達鐵道計劃上，是頂重要的。無論德、法、對於土耳其的鐵道敷設，都有巨大的利害關係。許多金融國家在競爭之後，結果，就互相

變成仇敵，第四、德國的軍備擴張，加它在非洲的擴張殖民地政策，相關聯着的。這就是爲了征伐喀麥隆（Kamerun）多哥蘭（Togoland）東非和非洲西南等。東非的占領，是根據一八八四年的條約，這是彼得博士用德國殖民公司的名義所獲得的；一八八五年，得到德國政府特許的德國東非公司，成爲它的先驅。

德國侵略的殖民政策，從一八九〇年前後，逐漸變得顯明了。逐漸增加的大海軍論者，和國家主義者的一派後援之下，威廉二世知道俾士麥的萬能，不知道他的偉大；同樣也就看透他的缺點。俾士麥決不是殖民信仰的熱烈的歸依者。毋寧說，他的巨大精力，集中在德國的確立，和發揚的歐洲諸問題上的。俾士麥正腐心於歐洲諸問題上，只求鞏固作爲國民的國家的德意志；而同時，殖民論者卻正在倡議大殖民帝國的建設。他不贊成俾士麥，而採取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承認德國要獲得物資。一八八九年他第一次訪問土耳其——這和前年的鐵道權利相關聯的——馬上對於世界政策和德國所盡的任務，表示大胆露骨的見解。原來，時代是被放在金融資本支配下的了。事實，威廉二世沒有俾士麥的援助而支配着的德國，和一八七一年的德國，已有顯著的不同；

而且立在一八七一年的世界已經完全變更的世界上，德國資本主義和國外貿易，迅速發展，把俾士麥和他的國民政策——普魯士式的政策——變做陳腐的東西。德國的生產力增加，它的組織能力更可驚異。德國全部政策——保護貿易主義，新帝國主義，研究科學的獎勵金等一切，都互相作用，產生出德國可驚的經濟的成果。

一八八五年，鍊鋼不足四百萬噸，到了一九一三年，已能鍊鋼一千五百萬噸。一八九一年到一九一三年間，煤產量從七千三百萬噸，一躍增加到一萬萬八千五百萬噸。紡織廠的錠數，從一八九七年到一九一二年，增加了二倍。德國在世界航業上的地位，到了一九一三年，占世界汽船噸數的百分之三一·九，次於英國，占第二位。德帝國的輸出貿易，一八九〇年是三十五萬馬克（約一萬萬七千一百萬鎊），一九一三年增加到一百萬萬馬克（約四萬萬九千萬鎊）。特別認為重要的，是德國的鐵和鋼鐵工業的絕大發展。德國軍需工業的盛衰，這種金屬工業的隆盛和帝國主義的政策，實有密切的關係。德國的鐵產量，和英國的比起來，這事就可明白了。下表所列的銑鐵生產噸數，充分表示出新興的德國帝國主義的根據。

銑鐵生產量（單位噸）

年	代	英	國	德	國
一八五〇年			二、三〇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
一九〇〇年			八、九五九、六九一		八、三八一、三七三
一九一二年			八、八二九、一二四		一七、五八六、五二一

再說到鐵和鋼的輸出，從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二年，德帝國增加了百分之一，英國反而減少了百分之三七。到了十年以後的一九〇二年，德國銑鐵產量超過八百四十萬噸，只比英國少了一萬〇四百噸；鋼產量已達六百三十九萬四千噸，超過英國產量實達一百三十八萬五千噸。這樣，到了一九〇〇年，兩國產量，實際已相並行了。正好在這時候，德國皇帝宣言「德國將來在海上，」英德間的競爭和反目，就是這年開始的，這是值得注意的。德國的工業，就在引起「世界的工廠」的英國的猜疑恐怖中，日趨繁榮了。

在德國，近代資本主義的集中過程和獨占形態，頂有代表性地發達起來了。同業同盟（Kartell）

(5)及其他資本的結合形態，不僅用急速的速力，使工業發展，同時也表現在階級關係的變化，政黨及其綱領的變化上。

稱霸世界的德國資本的新形態，要求海軍更要強大。世界大戰前十六年間，德國陸軍的兵士人數，幾達八十萬人。軍國主義和海軍主義的增大，是必然的。即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平行，再又適應着技術的進步，海軍軍備的速度，可驚地增大了。德國海軍軍力的增大，喚起英國必然的抵抗，即引起造艦競爭。而軍費的增大，就重壓在無產階級和農民身上。一九一三年列強各國每人所負擔的軍費如下：

德國	二一·九馬克
法國	二九·七馬克
英國	三三·一馬克
俄國	八·三七馬克

歐洲資本主義各國中，德國像樣勇猛地進向資本家的生產發展的道路的，可以說是沒有

的。按照普法戰爭後所簽訂的法蘭克福條約，德帝國奪取到了五十萬萬法郎賠款，和亞爾薩斯、洛林豐富的鐵產根據地。此外，普法戰爭特別助長了這個統一過程。這個統一的基礎一方是普魯士王，他方是德國的二十一個小國政府和三自由市，訂結條約，這樣，抵制德國工業發達的種種障害，都被撤廢了。德國向帝國主義的發展——獨占資本主義時代——就擴大了。普法戰後，俾士麥在全德國的範圍裏，施行了二大經濟的改革。一是憑了數十萬萬法國賠款，推行到金本位制，二是德意志帝國銀行的改革。

二

英國占領埃及，實行反土耳其政策以來，德國在土耳其的勢力，逐漸增大，於是德國在土耳其就發揮了決定的勢力。

德意志銀行和報達鐵道公司，從土耳其帝國政府那裏，獲得了許多權利。一八九八年，德皇實行二次訪問土耳其，實行對於商業上權利讓予和軍事折衝上的行動。德意志帝國主義的卓越的

前哨——威廉皇帝，爲了貫徹其政策，任何方法都用的：「他在耶路撒冷，裝得像基督教徒的騎士，遍歷各地；在大馬色，裝得像回教宗旨的擁護者。」威廉完全成功了。這個勝利的結果，獲得了建設報達鐵路的權利，和波斯灣上的重要航路。德帝國在整理土耳其軍隊上成功了。隨着一九四三年鐵道利權的承認，德國在土耳其占有了經濟的優越。

趁着當時回教徒異常的再興的福，德帝國裝得好像是土耳其的友邦或同盟國樣子，藉口方便延禮的信徒，敷設了通到麥加（Mekka）去的鐵道。這種敬神的行動，同時使汎德主義者，他們希望輸送軍隊到阿拉伯，以便在埃及和印度之間，預留地步，一旦有什麼緩急，就能集中本國軍隊，攻擊這幾處英國的領土。這種大胆的遠大的有計劃的行動，引起其他資本主義各國顯著的反感；而後來成爲同盟動機的英法協商，就是對德各懷敵意的結果，轉而成它的原因。

協商文書之一，就是作爲承認英國在埃及及有行動自由權的代價，而承認法國在摩洛哥的行動自由。而德國對於摩洛哥也有自身的利害關係。德國的金融上商業上的利害關係既很巨大，而且還在不斷增加。德國在採掘鐵礦上的利益，是占第一的。德國在公共事業上的權利讓予，也很出

色；同時德人比任何一國人，有着值錢的土地。

此後十幾年來，摩洛哥成爲歐洲外交禍亂的中心，德國就能用它來試出英法協商的力量；把英法的注意集中到這裏，它就能在土耳其和近東，完成它的企圖了。

一九〇八年，奧地利突然併吞了波斯尼亞（Bosnia）黑塞哥維那（Herzegovina）這種行爲，激怒了其餘歐洲強國，特別是給塞爾維亞和俄國以一大衝動。可是德奧早已預先料到了。因爲它們早在力求實現柏林到報達的縱橫交通路線——三B鐵路。憑了奧國這種併吞，德意志帝國的勢力，直達巴爾幹，在土耳其其占到優勢的地位，而進窺波斯了。

自從一九〇〇年起，德國就力求在波斯確立特殊的貿易關係。一九一〇年，以德意志銀行爲背景的新帝國主義，就探進頭來了。

當一九〇八年危機發生的時候，事情真果要被裂裂樣子，終於以奧地利給土耳其賠款來了結。工業資本主義的桎梏，通過了反覆無常的恐慌來進行的；同時，資本家的帝國主義，也經過不終止的外交上軍事上的危機，走上沒有和平的道路。一九〇八年的危機，馬上再行起摩洛哥的紛擾。一

九〇九年的協定，雖然給了法國政治行動的自由，給了德國商業行動的自由，可是法國就把大批軍隊送到摩洛哥，危害到該國的獨立，因而就不能圓滑地進行。同時，爲了利用摩洛哥的資源，企圖在經濟上互相協同的許多努力，也都失敗了。一九一一年危機達到了絕頂，英國支持它的同盟國——法國的宣言，這時早已要引發歐洲戰爭；德論者叫出侵略的行動，可是德國沒有宣戰。

德國國內金融的恐慌，這是使德國採取和平態度的重要原因。德國絕大的經濟發展的內裏，潛伏着一部分早熟的有危險的銀行制度的弱點。德國甚至連儲蓄銀行，也亂放儲金，投資工業，期票貼現，進行不確實的股票投機。在恐慌時候，碰到擠兌的場合，德國的儲蓄銀行不能隨時支付了，一九一一年訊德主義者羣起而引起戰爭的時候，這種狀態就發生了。一九一一年九月和十月，德國必要三萬萬馬克的金幣，可是到處都不能到手，美國銀行業者，看到這個機會，就用六厘到七厘的高利貸借款給他們。平時，柏林出三厘到四厘利，就能夠從巴黎借得的；這就是德國在阿伽第（Agadir）飄揚着帝國國旗的代價。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德國和法國訂結了一個條約。根據條約，德國承認摩洛哥是法國的

保護領。可是這兩個國家，在六年以前，曾經共同大聲竭力地宣明摩洛哥的獨立的。

德國更把上喀麥倫的一部分，讓給法國，接受法屬剛果（Kongo）的一部分，作為報酬。這個條約，引起汎德主義者明白的嘲笑和敵意，軍國主義的化身——般哈第（Friedrich von Bernhardi 1849—1903）甚至這樣說：「因為放棄摩洛哥，和回教徒的關係就惡化了。在我們看來最重要的在回教世界的威信，失墜了！」

德國的勢力，又因一九一二年二月巴爾幹同盟的成立，受到威脅；到了一九一三年冬，巴爾幹主權的夢，毫無餘留地被打得粉碎了。而且，同盟國的奧地利和意大利，關於巴爾幹政策，投出了威嚇和呪咀。軋轢的增大，在這些同盟國之間，明瞭起來了。而結合着它們的，不是友誼，倒是恐怖的念頭呀！

甚至懷疑到三國同盟是否復活呢。可是到了第二年，德國的希望復活了。普加萊斯特（Buka-rost）和和平條約——一九一三年八月——，即是德國的和平，主要受維也納和柏林的指導。德國「向東方活動」的障礙——新巴爾幹聯盟的希望，終被破壞完了。

從締結普加萊斯特條約起，到歐洲大戰爆發止，這幾個月的歷史，是對於即待到來的鬭爭，實行猛熱準備的歷史。一般的擴張軍備，幾次瀕危的危機，以及德國在西南非、埃及、印度、愛爾蘭，到處煽起反英的行動。德國在美洲海岸、加勒比海以及墨西哥灣等地方，搜尋供煤所。

太平洋方面，德國把一八八〇年代以來，日漸增加的領土——島嶼，用無線電報連結起來，或者忙於建設停船港。在德國國內，自從無畏（Dreadnaught）大型戰艦出現以來，變成廢物無用的基爾（Kiel）運河，正在加以擴張。要想在舊世界上面，來確立德國優越的支配，所造成的戰機，正在成熟了。

德國就遠入北海活動，從北海再到地中海：這就是說，要實現到達瑪摩拉（Marmora）海和達達尼爾（Dardanelles）·博斯福魯（Bosphorus）海峽的「歐洲中部」的夢想，進而從海陸雙方來蠶食廣大豐富的亞洲大陸。當有用的豐饒的全部土地，幾乎早被其他列強併吞，或已被注目的時候；列強的世界分割，幾乎快告終結之間，纔進入帝國主義的階段，這對於德國是處於如何不利地位呀！

所以，德國比其他資本家的國家，更加痛切地要求勢力範圍。換句話說：德國歷史上就擔負了這樣任務：爆發起積極的帝國主義「最初的世界大戰」的導火線。

各國領有的殖民地（一九一四年）

（單位百萬平方公里百萬人）

	殖民地		本國		合計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英國	三三·五	三九三·五	〇·三	四六·八	三三·八	四四〇·〇
俄國	一七·四	三三·二	五·四	一三六·二	二二·八	一六九·四
法國	一〇·六	五五·五	〇·五	三九·六	一一·一	九五·一
德國	二·九	一二·三	〇·五	六四·九	三·四	七七·二
美國	〇·三	九·七	九·四	九七·〇	九·七	一〇六·七
日本	〇·三	一九·二	〇·四	五三·四	〇·七	七二·七
合計	六五·〇	五二二·四	一六·五	四三七·二	八一·五	九六一·一

這樣，我們就知道，世界的分割，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之間，已經完成到如何地步了。所領有的殖民地，在一八七六年以後，可怕地增加了。從四千萬平方公里，增加到六千五百萬平方公里，即增加到一倍半以上。六大強國計增加二千五百萬平方公里，即達到本國面積——一千六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一倍半。在一八七六年，德美法日四國，都沒有殖民地的，可是到一九一四年為止，這四個國家，已經得到了一千四百十萬平方公里面積（即約達歐洲全面積的一倍半）和一萬萬人口的殖民地了。

領有殖民地的擴張，進行得極不均等。譬如像本國的面積和人口，沒有十分不同的法德日三國和比較起來，法國所獲得的殖民地，幾達德日兩國合起來的三倍。

扼要說來，德國帝國主義所具有的特質，是從國際帝國主義所到達的發展階段，自然而然地生出的。一個特質；不過，比資本主義各先進國家落後的德帝國的發展，在二十世紀初葉，可說是猛烈的。

第十七章 世界大戰和經濟

一

從十九世紀末葉，到二十世紀初期，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工作，更加濃厚地帶着帝國主義的色彩。所謂帝國主義，是自然地就可以豫想到有和別國衝突的可能性的。因而，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新興帝國主義的德國——，就必然需要龐大的軍備，實行激烈軍備競爭。一八九八年，德國海軍的擴張，更加衝動了列強的耳目，感到受了威脅，德國和英國就互相惹起了猛烈造艦競爭。

自從二十世紀初葉以來，日益強大的歐洲資本主義各國，擁着龐大的軍備，試去奪取海外的領土，到處爭奪市場，各求獨占，一意在略取世界文明落後各國——殖民地。各國因為同業

同盟 (Kartell) 和托辣斯的發達，整個企業的一半或一半以上，集中在不足企業總數百分之一大企業的手裏。無論勞動者人數或動力，大企業——獨占資本——在整個企業裏占着驚人的成數，而獨占了市場。

德國的重工業，尤其是金屬工業和煤油工業上的積集和獨占，特別來得觸目。戰時馬上可以變成軍需品工廠的染料工業，以及其他化學工業上，獨占過程也非常顯著。這種傾向，一方面和銀行資本的集中，即和巨大的金融資本相結合；另一方面重工業以及化學工業畸形的發展，和不生產的軍備擴張相結合，愈益釀造了誘致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

德國的大銀行，吸收着一大半的存款，把資本投放到實業，然後來支配它。換句話說，德國的六大銀行（德意志銀行，貼現銀行，(Diskontogesellschaft) 德勒斯登銀行，帝國銀行，丹穆斯達忒銀行，沙夫好姆銀行）和德國大資本企業相結合，不僅支配政黨，政權；再要和別國資本銀行相結合，或投放到殖民地市場，在世界任何地方，爲了獨占而和別的財閥相鬭爭。

世界上的大資本和大銀行，爲了獨占世界市場，展開了強烈的鬭爭。電氣工業裏，德國的 A.

E·G和美國的G·E·C的競爭獨占煤油業裏，德國銀行團和美國的美孚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間的競爭在航業裏，德國的漢堡美洲汽船公司，及北德羅伊德汽船公司（Norddeutscher Lloyd）這兩大德國財團，和摩根根（Morgan）托辣斯間的競爭及妥協等，都表示出德國資本在世界大戰以前，早就在帝國的名義之下，使用武力來壓迫英美資本了。

德國資產階級一方面使本國無產階級，負擔着許多重荷——低廉的工資和勞動時間的延長——同時在世界到處掠取殖民地，借軍艦的武力，投放資本，把名目上的獨立國，化爲半殖民地乃至德國資本的勢力範圍——德國資本的榨取地帶。

以有托拉斯和大銀行的聯絡懷着大殖民政策的德國新帝國主義，使掠奪競爭極度發展，以有巨大的陸海軍的軍備比率使各強國——資本主義的先進國——成爲德國的競爭者，因而引發起世界大戰。

這就是說，世界大戰是十九世紀末以來，世界帝國主義政策的必然結果，所謂非洲及西南亞洲地方的獨占殖民地市場鬭爭的政治化和武力化。於是，強大的帝國主義各國的勢力均衡，就被

破壞還是英國支配世界呢？還是德國支配世界呢？形成一大鬭爭。

要而言之，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的當然歸結。而爆發大戰的主因——俄國的汎斯拉夫主義和德國的汎日耳曼主義，都是戴着國民主義假面具的新帝國主義的表現。

而且，參加大戰的許多國家，還利用了什麼正義呀，權利呀，人道呀，自由呀，文化呀，以及其他一切美麗的假面具，在衷心裏，卻存着帝國主義的要求，這是無可爭辯的。

世界大戰還可以說是帝國主義的大決算。而結果，就造成了俄、德、奧這歷史上三大帝國的顛覆。

在大戰前幾年，早就充分孕育着世界大戰爆發的危機了。剩下來的問題，祇是這個已經化濃了的歐洲，潰破一角而突出的機會和口實而已。這個機會，就是幾年來千頭萬緒地牽結着的巴爾幹問題。

大戰的直接動因，就是奧匈帝國皇太子斐迪南大公 (Francis Ferdinand) 及皇妃，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波斯尼亞洲塞拉耶服 (Sarajevo) 的暗殺事件。

現在可以舉出世界大戰的四大原因：第一是英德兩國世界政策的衝突，第二是俄德兩國世界政策的衝突，第三是法德的宿怨，以及殖民地利害的衝突。第四是，各國的異分子的民族統一運動。

要而言之，世界大戰最大的一個遠因，就是要想實現汎德政策的計劃的威廉二世的野心。而實行汎德政策的目的之一，就因為德國本國工業過度隆盛，昔日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之間所存着的平衡，已被破壞，結果就惹起了過大的困難，因而要阻止這些困難的發展。

擁護彌拉波所說的「普魯士的國民的實業」就是世界大戰的原因。

固然，文化不同，民族各異，風習皆殊的國與國之間，所以，戰爭原因是多種多樣的；譬如德國的理想在本國的文化普及世界，承認軍國主義的神聖；而像法國，忘不了五十年前之舊怨，爲了要想收回亞爾薩斯·洛林的重工業生產資源；英美卻高唱民主主義的理想；俄國卻望斯拉夫民族的統一，意大利就一向希望着「意大利人的意大利」這些，不錯的都是誘發世界大戰的原因，不過重要的基礎，是在於有關各國的資本家，「爲了要使統一的經濟生活，圓滿發展」，即是爲了要求

增設「本國國民的實業」這是無可疑義的事實。所以，作為帝國主義國家間相互衝突看的世界大戰，更加暴露了金融資本的專制和它的野心了。

侵略的各國資本的利害，這樣就到處衝突，相互錯綜，在公然的武力鬭爭的蔭下，完成祕密的領土分領，或市場分割的協定。

利己的資本，在祕密協定和驅迫威脅之間，為着自己的勝利，確實的獨占着利益這種目標，所以有計劃地參加戰爭。如像意大利參加德國方面之後，反轉來投到協約國方面，這是適當的例子。這樣，世界大戰的參戰國，戰時豫先協定了分割敵國的領土——敵國資本的榨取地帶的再分割——，作為參加的條件。這在德國方面也是同樣的。而各國要求的矛盾錯綜的性質，成為後來凡爾塞條約矛盾的端緒。

二

其次，來檢討世界大戰中，德國所實行的帝國主義的活躍。我們要闡明下列三件事情。第一、究

明帝國主義各國所締結的秘密條約。第二、分析蒲理袁 (Briey) 事件的本身所表示的資本主義產生的動向。第三、爲了使國民繼續作戰，直到戰事的目的恰好被完成的時候爲止，它所採用的手段，當加以分析。

所謂第一項的秘密條約，就是一九一五年三月的俄土間宗教的秘密條約，和帝國主義的關係。此外如德國和羅馬尼亞之間的帝國主義的秘密協定（一九一七年八月）以及一九一七年三月的德國的國境問題等。

至於說到蒲理袁事件，這要而言之，就是說到戰時德國重工業和帝國主義戰爭的關係。不待說，帝國主義時代的特徵，是資本家經濟的重心，從紡織工業推移到重工業；生產手段生產工業的隆盛，和巨大的同業同盟相結合，重工業資本的勢力，增大到由鋼鐵大王、煤油大王的魔手，來決定一國政策的地步。重工業的強大，再和軍需工業（這就是它的產物）有着關係。德國的克虜伯廠、西門子廠等大軍火製造廠，和軍閥銀行資本團、鋼鐵以及煤托拉斯，保持着密切的關係。德國在戰爭初期的勝利，這是因爲德國是歐洲第一的冶金國；這件事實，正像在夏爾羅阿 (Charleroi) 或馬

爾奴(Marne)等戰役所表示的，具有這樣重要性：「戰爭勝利的問題，就是各交戰國雙方能自由發揮的鋼鐵的數量問題。」

重工業無壓制的掠取慾，和戰爭的刺激，甚至在（包括世界大戰中軍略在內的）一般政策上，也留下了許多顯著的例子，表示出經濟利害的絕大支配力。這就是蒲理哀地方秘密的暴露。

蒲理哀事件，就是以法境蒲理哀地方爲中心，所形成的德法的爭奪。所謂蒲理哀事件，是世界大戰前，法國產鐵最豐富的地方。世界大戰一開始，德國就侵入這個生產法國鐵礦產量七成以上的蒲理哀盆地，未曾遭遇什麼抵抗，占領了它，直到戰爭終結爲止，繼續管理該地協約國軍隊威脅到德國占領該地，已經在一九一八年末——世界大戰最後的日子——，美軍以蒲理哀爲目標，開始了攻擊，世界大戰期中，德國從蒲理哀盆地，採取了一千四百萬噸的銑鐵。因爲西班牙和瑞典的銑鐵的供給，都已斷絕，所以假如沒有蒲理哀鐵地，德國就不能繼續作戰了。一九一六年十二月科倫 (Köln) 的國民新聞，理解到這個事實，論到德國的戰爭目的，這樣說：「蒲理哀盆地的狹隘地帶，特別在戰爭期中，是保障我們軍事和經濟獨立的重要土地。我們必要蒲理哀，它保證着我們所

必需的鑛產的供給；在議和談判裏，我們有應當要求該地的權利和義務。」

事實上蒲理哀盆地，是德國軍需工業所絕對必要的。一奪還該地，只要六個月以上，德國就不能維持戰爭了。

所以，世界大戰的繼續，在德國看來，可說是爲了防守蒲理哀盆地。德國抱着攻擊是最好的防守形態這種主義，而行動着；爲鞏固蒲理哀盆地的支配，長期間不屈不撓的猛烈攻擊，來對付法國的凡爾敦（Verdun）。我們現在可以明白，凡爾敦激戰，所以是有以史來激烈戰事的理由吧。

據興登堡（Paul Hindenburg）說來，攻擊凡爾敦是爲了妨礙法軍衝擊蒲理哀盆地；德軍長驅而入，一直迫近到離凡爾敦二十英里的地點。

德國官報（一九一六年十月十七日）上這樣說：「對於協約國攻擊的場合，凡爾敦既便於敵人奪取我們貴重的蒲理哀鑛產地，而且結果還要威脅到麥次（Metz）要塞。而占領麥次，就易於征服德境洛林的工業和鑛山地帶，那也就是奪取我們軍需工業的頂重要的部分罷。」

這次事實，明白地證明着蒲理哀盆地的決定的重要性；而且對於斷然襲擊該地，也可以說是

德國敗滅的信號的這一假定。提供着充分的證據。此外，占領蒲理哀盆地。是德國防守那戰時中所占領的各地，所必要的製造武器的根據地。德國在世界大戰中，對於下列被占領的各地，徵收着巨額的課稅：

列日市 (Lüttich)	二百萬圓
布拉班州 (Brabant)	一萬萬八千萬圓
阿美麥提卡市	二十萬圓
里爾市 (Lille)	二百八十萬圓
布魯塞爾市 (Brüssel)	八千萬圓
亞琪市 (Amiens)	四十萬圓
盧芳市 (Lüwen)	四萬圓
派楞堤安市	四十二萬圓
盧維埃 (Louviers) 圖爾科萬 (Tourcoing)	四十萬圓

此外德國對於比利時各都市，大約徵收了二萬萬圓的貢獻金。這就是說，德國對於這些所占據的地方，合計徵收四萬萬八千四百五十萬圓的貢獻金。德國就用這些課賦，來填補一部分軍費。然而，長年累月的戰爭，給了德國下列那樣巨大的軍費的加重。

德國的軍費

開戰後六星期	十七萬萬三千萬圓
交戰後一年間	六十萬萬圓
世界大戰中總計	六百六十六萬萬圓

德國在世界大戰裏，所支出的每天平均戰費，最初是二千六百萬圓，終了時是六千八百萬圓，德國在戰事中，爲了調動這樣龐大的軍事費，就造成國內經濟的許多障害。固然，德國關於戰時金融政策，鑑於一九一一年摩洛哥事件的苦痛的經驗，就一方面準備戰時準備資金，同時另方面努力調節金融；所以，戰前（一九一三年）已有一萬萬九千六百六十四萬馬克的正幣，德帝國又早

在西班牙道 (Spanadan) 要塞的由利烏斯塔裏，也儲藏着六千萬的正幣準備，以備戰時動員。

所以，當世界大戰的初期，德國軍事上的動員，好比疾風迅雷般的同樣，財政上的動員，也極為迅速。即在一九一四年八月臨時議會上，議會不須要什麼討論，就通過了停止兌換，放鬆銀行券發行的限制，制定新法幣等十七個財政上的「緊急法案」。這樣，德國的財政經濟，必然地走上通貨膨脹的過程。

可是，世界大戰期中德國經濟的通貨膨脹，還是被拘束的形態上的通貨膨脹。這就是說，戰時德國被封鎖經濟，是過去人類所經驗過的典型的戰時經濟。直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在這樣條件下：「德軍立即自法比及其他協約國領土撤退，放棄亞爾薩斯·洛林，退至萊因河以後，將砲臺碼頭提交協約國聯軍，同意交出艦隊及潛水艦，放棄軍事設備，」簽訂停戰條約為止，還爲了統制和封鎖，戰時通貨膨脹，不曾表示出本格的發現。

最後，第三項所說的，爲了使德國國民，繼續作戰到戰爭的真正目的恰巧完成的一刻爲止，它所採用了的手段，這就是設立德國情報局。這還可以用來把大戰真正的性質——適應德國金融

資本和重工業的要求，掩蔽過的大衆耳目。立在第一線上的，是華爾夫通信社。

從一九一四年八月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爲止，大約四年半期間，從攻擊比國邊境列日開始，經過德軍進擊東西兩境，德國近代武器——毒瓦斯，潛艇，齊柏林飛艇——的活躍，凡爾敦，馬爾奴河（Marne）的決戰直到根據威遜遜「十四條」開始議和爲止，兩軍的損失如下：

已判明戰死者	九、九九八、七七一人
重傷者	六、二九五、五二二人
其他受傷者	一四、〇〇二、〇三九人
俘虜及行蹤不明者	五、九八三、六〇〇人
協約國聯軍軍費	二、七一四億圓
德軍軍費	一、〇五九億圓
軍費合計	三、七七三億圓

這樣，實足四年四個月的戰爭以後，協約國方面的帝國主義，危及資本主義自身的基礎，好容

易纔對德贏得勝利可是，一方面，資本家的生產的全部均衡，已被破壞和動搖，又遭遇到勞動大眾的進擊隨着到現在，看出爲着互相相反的利害，正在互相威脅衝突着的他們自身了。

第十八章 大戰後的社會情勢

—

德意志帝國在世界大戰上失敗的結果，因生產人口的減少，生產手段的破壞，亞爾薩斯·格
 林以及全部海外殖民地的喪失，再加上巨額的賠款負擔，而蒙受了重大打擊；可是扼要說來，這些
 都不過是先前二十年間的德帝國主義政策的產生的罷了。世界大戰不僅造成德帝國主義的崩
 壞，反而加強世界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各種傾向，又使資本主義內部的對立尖銳化，產生出各國的
 新的勢力關係，即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所締結的凡爾塞條約，不僅對德國加上：（一）割讓
 領土；（二）現物賠償；（三）賠款這三種物質上的壓迫，而且引起其他觀念的形式的各種問題，
 例如引渡戰爭犯——德皇及其部下問題（一九二一年五月在萊布齊的裁判）等。條約只規定

了燃燒着醜惡野心的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利害關係罷了。

所謂凡爾賽和平條約，前文列署條約締結國各國全權代表的名字（德方代表，爲布洛克杜爾夫·崙次奧（Brockdorff-Rantzau）伯爵等六人）宣告戰爭終結。本文十五篇，各分細款，再分條文爲四百四十條，又包括附件十八種，附表三種。條約裏關於德國主要的條文，揭舉於下：

A. 亞爾薩斯·洛林歸還法國主權。

B. 薩爾（Saar）區域煤礦所有權及採掘獨占權，讓予法國。

C. 奧匈分立。

D. 承認捷克斯拉夫及波蘭獨立。

E. 西里西亞·波森，以及普魯士之一部分，割讓波蘭。

F. 薩爾流域，暫在國際聯盟管理之下。

G. 但澤市永久在國際聯盟管理之下。

H. 什列斯威希及東普魯士之一部分，由普通投票，決其誰屬。

I. 德國海外領土，完全放棄。

J. 德國海陸軍兵力，加以極度制限，廢除徵兵制，禁止設置潛水艦及空軍。

K. 協約國追訴前德國皇帝，設特別法庭審理之，此外凡有違反戰爭法之慣例者，實行追訴，於軍事法庭審理之。

L. 德國承認戰爭之責任，戰費之外，復須賠償協約國人民及財產所受之一切損害；此外經濟上及交通上，對德國權利及自由，加以種種制限。

M. 協約國軍隊，為保證德國履行壓約，占領萊茵河左岸。

此後帝國主義的和平狀態，愈盡助長這種矛盾和衝突。一世界大戰一變世界底物質裝束。而以凡爾賽條約為中心，如資本家的生產的崩壞過程，資本主義國家國際關係的破壞，列強之間結成新同盟，殖民地自發鬪爭轉變成意識化。革命的無產階級運動的勃興等等，日益看到了新的展開。

要而言之，這次歷史上的大戰，使以德國為中心的歐洲社會經濟狀態，完全變更。第一，過去為

各大陸的債權者的歐洲，大戰以後變成債務者了。第二，歐洲的勞動能力，大大地減少了，這主要是因爲人口的減少。在戰爭以前，歐洲大陸，因爲供給剛強的開拓者到新大陸和新奪取的殖民地去，正像統計學所指出的，女子的人數多過於男子。大戰更助長這偏在的傾向，男女人數的差異，特別擴大。第三，尤其是德國，受聯軍的強迫議和，不能繼續戰爭。德國方面除了承認受聯軍的軍事政濟支配之外，還不得不放棄了它的殖民地，船舶，對外國的債權，以及可以移動的資源。更進而毫不關心德國方面的慘狀，強迫支付賠款。第四，本來在德國方面的幾個數量頗大的人民集團，大部份是德意志人和馬扎兒人——現在被分割開來，受那比他們文化更低劣的人民所統治。第五，德，奧，布加利等國，實際上一些軍隊也沒有，絲毫也不能抵抗地服從那軍事支配的頂峻嚴的形式，而勝利國家卻用前所未見的比例，增加了最新形態的陸軍和艦隊。這可說是上面那樣社會的經濟的病態之結果。第六，分成三十個國家的歐洲大陸，它的購買力天天減少，匯兌市場，動搖不定。凡爾塞和約，是否定了協約國在大戰裏所宣言的全部原則，而且凡爾塞和約還根本地否定了威爾遜總統的有名的十四條——它不僅對於德國，而且對於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造成了嚴肅的預約的。第

八，從這些事件所產生的精神的不安，使許多聯盟國家，相互間發生了意見的分歧。美國、英國、意大利、法國等，不僅目的上和政策上，甚至在感情上也生出巨大的隔閡。美國就儘可能的想從歐洲大陸的紛爭，以及和它有關聯的責任裏脫身出來。法國要採取英意所完全不能同情的方法，即採取直接行動。這樣，歐西大陸的三大強國，就決不能說是完全調和的了。再次關於共同的目的和理想，關於必要完全一致地協調地來適用條約，雖然紛紛議論，可是這是以前就應該考慮到的事情。這就是說，一些也不減輕，一些也不變更條約的條項，而要強制執行它恐怕要變成陸州大陸的頹廢罷？在造成德國方面沒落以後，恐怕勝利國方面也終會沒落罷！第九，國家主義的強烈的鬭爭，土地的分割，原料資料地的壟斷，把歐洲大陸上三十個國家間的邦交關係，更加陷入到非常困難裏了。國家主義的兇暴，它的更顯著的事件，是從這次大戰產生的。在波蘭以及別的新興國家，特別是這樣的。這些國家，因為缺乏精力元氣，瀕於崩壞，天天沈淪在悲慘和零落，可是還在追求着空虛的帝國主義的幻夢。第十，假使找不到任何方法，用來代替那以必要繼續戰爭的原則的現行條約，那末，歐洲大陸假使發生了新的比以前更劇烈的戰爭，就有葬送文化之虞的。可是用什麼來替代現行

條約呢？這就是無論戰勝者或戰敗者，非共同站在自由平等立場上的，有着友誼的合意的系統不可。這個方案，可以把歐洲從那現狀——對於德國方面，懲課着德國所不能負擔下的重荷，而同時又分裂成二個陣營裏——解放出來吧。在現在情勢下面，一方面嚴重地武裝威嚇另方面，而另方面被禁止武裝，不得已像奴隸那樣屈辱着。假使不服從，那就要被強迫幹那更苛酷的苦役的。（據 Francesco S. Nith）

二

協約國和德國的休戰，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簽字了。兩方面所採用的休戰的條約，據說是就威爾遜總統有名的「十四條」草成的。

所謂威爾遜總統聲明的十四條綱領，是根據下面方針出發的。

- (1) 民族自決主義。對於有獨立能力和委實的民族，根據國民主義，使成獨立國。
- (2) 保護少數民族。對於沒有造成獨立國的委實的民族，各國政府當加以相當保護。

(3) 樹立民主主義的政治組織。

(4) 撤廢敵國內——德國內——的徵兵制度。

(5) 交通路線的公開。

(6) 打破祕密外交。舊世界裏所以戰爭不絕，因為一般大眾不得監視外交的緣故。爲了將來世界和平，必須絕對否認祕密條約的存在。

這種不賠償不併吞的主義和政策，給協約國做了卓越的宣戰材料。可是實際上，凡爾塞條約對於德國是頂苛酷的。喪失了重工業的資源，被奪去交通機關，全部經濟的根據地都被剝奪了去。德國，到底不能實行條約的。可是，帝國主義各國強迫實行德國的分割，和奪取它的生產手段再加上列強特別是英法兩國的要求，處在對立狀態裏，而現在利害互異不能兩立的兩種要求。被包含在一個條約裏。首先看，凡爾塞條約的經濟部分，是怎樣的東西？一般說來，成爲歐洲經濟組織的樞紐的德國經濟組織，實在是在於A. 海上貿易，B. 煤鐵；C. 運輸及關稅制度。

A. 德國的海外貿易。凡一千六百噸以上的全部船隻，千噸到一千六百噸船隻的半數，以及

漁船的四分之一，引渡給聯軍方面。此外，德國還要替聯軍方面建造一百萬噸船舶。在非洲的一切殖民地，和在非洲及中國的一切經濟上的權利和特權，連併在各外國的全部財產，一起割讓。
B. 德國的煤鐵。從德國手裏，奪去了薩爾流域的煤產地。德國還不得不把大量的煤，引渡給俄國，比利時，和意大利。因之德國喪失了煤的三分之一。

C. 割讓運輸和關稅機關。爲了接收德國的鐵道，河川，運河，港灣以及公共機關，並爲管理租稅和關稅，任命了協約國共同委員會。

這些對於德國實業的根本打擊之外，還要責令支付一千三百二十五萬萬馬克的莫大的賠款。條約頂大的根本的矛盾，就是既從債務者手裏奪去了實業的全部手段，還要求了莫大的賠款。要實行這種條件，不俾德國，甚至是歐洲大陸，不，甚至是全世界，也是絕望而不可能的。特別是萊因以東的歐洲部分，這個政策被證明是致命的，結果使全部中歐的大衆生活水準，迅速地降低。更值得注意的是，是休戰以後九個月之間，繼續着的經濟封鎖，所造成的可怕的深刻影響。這種致命的政策所造成的悲劇結果，在屈從了它的德國人民惡化的體格裏，明白地描畫着。

長期大戰裏疲弊了的德國，不能夠籌集到每年二十萬萬金馬克的巨大金額，於是，一方面就引起亂發紙幣，它方面除了更加強化了德國勞動者的榨取程度之外，此外沒有別的方法的。可是，假使強迫勞動者階級服從更惡劣的勞動條件，要強化榨取，那末就要遭逢到勞動者階級的全面反抗的。和資本家的對立狀態，就更加激化；在德國革命以後——一九一八年——，二個階級的鬭爭，再沒有像德國那樣執拗，而且那樣長期抗衡了。勞動者的極度榨取，不僅德國，整個歐洲中部，即全部多腦河沿岸各國，使大衆生活水準，日益低下。「世界大戰以後，可怕的經濟封鎖，繼續着幾個月，多數火車頭和乳牛，都被沒收，引起大衆的生理墮落和衰退。紙幣的亂發，造成物價暴騰和馬克市價不知底邊的跌落。」

根據德國工會總務委員的覺書——德國勞動者的狀態和巴黎會議的決定——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二年○末，工資的上昇，實際如下。

工資

生活費

工會的計算 克威爾的指數

對於一、四四四、八五一人的勞動者 九〇萬萬
 對於 八一七、七〇六人的勞動者 六·五萬萬
 對於 三七、四九六人的勞動者 四·二萬萬

一五·五萬萬 一四·七萬萬

再又根據經濟和統計第一——第二册，一九二〇年二月德國的工資上昇如此：

全體平均 一九四年七月——一九二〇年二月工資上昇百分率

鑛山勞動者	一〇九三
鑄鐵及金屬勞動者	八〇〇
纖維工業勞動者	九三二
土木工業勞動者	六一三

世界大戰以後，德國勞動者的工資的，確表示出上昇，可是這卻並不表示着勞動者生活水準的上昇。因為根據德國帝國統計局的調查，德國抵發物價指數，在一九二〇年二月，表示出一三七六的巨大數字。「自然，不少好辯的資產階級，試圖證明德國勞動者的生計，在世界大戰期裏或大

戰以後，已經改善了。可是難道還有列舉統計數字，來證明德國無產階級的貧困化的必要嗎？[？]沒有這些統計數字，難道看了粗劣的衣服，普遍的憔悴，到處病院裏都能反覆地看得到的肺病，和一般疾病的激增，還不明白嗎？難道誰還不知道德國勞動者的衣服，洗舊了的服裝，一點兒的動產，都跑到農村高利貸手裏去嗎……當一九二一年的初期，物價表示着低落傾向的時候就希望勞動階級的生活被改善了；到了一九二一年後半期，新的物價騰貴——這種物價騰貴一直繼續到現在，到了一九二二年初期，受着新稅的影響，還更加激化——開始的時候，這種希望也就消失了。甚至連資產階級所絕對地信賴着的檢事巴爾比斯，也會計算出來：一九二一年秋季，礦工工資雖較夏季增加了百分之九，可是抵發價格卻上昇了百分之五〇了！(Eugen Yarga)

可是，犧牲大衆而出賣自己的輸出貿易——飢餓輸出反而倒非常繁盛了。一九二〇年以來，英國的失業和實業衰頹，就是因為歐洲中部的居民，特別是德國，早已窮困得不能夠購買外國商品了；同時又爲了被排除通商的數百萬俄國居民的貧困化。惟有法國托着實際上能夠自給自足的幸福，對於加在德國上面的要求，還不能滿足。

「中歐帝國」的夢，現在隨着德國的沒落而轉移到法國。法國從休戰以來，採取着不斷的積極能動的頑強政策；尤其是形成了小協約國——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波蘭的支持，成爲歐洲的軍事盟主，全部支配着歐洲的煤鐵的資源根據地。

凡爾塞和約，從德國那裏，奪取了亞爾薩斯·洛林，薩爾流域，歐本（Eupen），馬爾美第（Malmedy），波森，西普魯士，上西里西亞，默麥爾（Münster），但澤市，以及北什列斯威希（Schleswig），強迫設立非武裝區域和限止軍備，掠奪了陸上以及海上的一切經濟資源。非武裝區域沿萊茵河，經過巴登，符騰堡，直達佛蘭克福·魯爾東方的線上。另一個朝着北海的地方包含着波羅的海，什列斯威希·基爾（Kiel）等的地域，也被禁設軍備。陸軍被減小到難以言狀的少數，全部艦隊被沒收了。

這就是說，德國除了一切武器——戰爭手段，和實業——生產手段，都被奪去了以外，還要負擔着巨大的賠款。亞爾薩斯·洛林的鐵，薩爾流域的煤，上西里西亞的鐵，全部都喪失了。

薩爾地方就是所謂薩爾問題的發源地，一九三五年國聯大會上，決定歸屬於法領，還是德領。

不待說薩爾地方在大戰以前，明是德國的領地居民也多是德意志人根。據凡爾塞和約暫歸國聯掌管，至於最後的歸屬，在和約實施十五年以後，由該地居民的普通投票來決定的。關於薩爾的協定，被和約第四五條到五〇條規定着的。

不管德國不能夠支付償款，還強迫它來支付。所以德國全部經濟機關，完全被破壞了。就是餓瘦了自己身體，也還非造成廉價的輸出品不可。

就全體來看凡爾塞和約的時候，我們看到大戰的真實目的，不外是獨占呀，市場呀，權利讓子呀，要求原料資源地呀，或者戰勝國早已所有着特權的場合，那就要求引導這種特權的陸路呀，鐵道呀，航路呀等等罷了。

可是，凡爾塞和約對於這些問題，究竟給了怎樣最後的解決呀！不，正相反的，正惟這些帝國主義的和平條約，纔是創造出戰爭的條件，它不外是使戰爭成爲不可避免的政策和精神的化身而已。扼要說來，凡爾塞和約，是過去二十年間帝國主義政策所達到的結論，因而可以作爲是對於二十年間的政策，作了一些決算。這種損益計算書（Balance Sheet）的執行，就在帝國主義國家兩

大集團——英國一羣和德國一羣的鬭爭，結局德國一羣歸於敗北，就把一切的掠取和收奪，加上戰敗國上面。

所以，這種帝國主義的條約，加強資本帝國主義矛盾的發展，更產生出釀成二次世界大戰的條件。

三

現在，我們說到一九一四年以後德國的社會運動。這恰恰和最初的預期相反，隨着戰爭的繼續，一般大眾從一時的興奮裏醒覺起來，特別是因為德軍情勢日趨不利，一般大眾的慘苦，逐漸增加，反對戰爭的熱情跟着就提高了。結果就發生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的革命，德意志帝國宣告終結。這種時代的變遷，的確顯著地表現在社會民主黨內部黨派的分裂上。「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第四次軍事預算，有二十名社會民主黨議員公然對它投反對票，其他二十二名在票決之前退場；這些反軍國主義的分子，一九一七年終於獨自另建一個政黨。」

自然，這一派單是反政府分子和反軍國主義分子的集合，內部是非常複雜的。因而就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發生最初的分裂，包括在該黨裏的斯巴達團（Spartakusbund），離開了德國社會民主黨。

比這再早一些，即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國爆發了革命。隣國的德國，不會不受到影響的。這樣，爲了緩和日趨惡化的形勢，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就從多數派社會民主黨裏羅致黨員入閣，但這究竟不濟於事，十一月初，基爾發生海軍暴動，國內的不滿，就趁這機緣，形成巴威革命，柏林革命。德皇就在十一月十日，從斯巴（Spa）的陣營，脫逃到荷蘭的阿美倫根（Amerongen），以後再到都爾尼（Doorn）。接着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正式發表讓退帝位的聲明。

十一月十日，就在布緒馬戰院開革命議會了。這就是柏林工兵代表大會。新政府在十一月十一日簽訂停戰條約。革命暫告完成，德國變成共和國了。可是從實際上說來，這個決對不是形成社會變革的革命。換句話說，這次德國革命，並不會在社會組織上，引起任何變動。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二大對立，依然嚴重地存在；而掌握國政實權的，還是資產階級。

革命後的德國左派，隨着聯立內閣的成立，就正面起來反抗了。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全德工兵代表大會召集了。會議是由愛伯爾（Friedrich Ebert）主席的，這樣就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召集國民議會。

在採用「國民議會」還是採用「工兵」會議的論爭上失敗的斯巴達團看來，剩下來的道路只有一條。這就是暴動的直接行動。可是這時候，愛伯爾政府捨掉消極防禦態度，變成積極攻擊態度了。在達雷姆訓練編成的諾斯克（Gustav Noske）的政府軍，就來鎮壓暴動。革命運動的中心人物：卡爾·李卜克內希（Karl Liebknecht）和羅撒·盧森堡（Rosa Luxemburg）都被捕慘殺了。

猶太人胡果·普羅依斯博士（Dr. Huzo Preuss）起草的威瑪（Weima）憲法，在這種社會情勢裏，就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十四日，由第一任德國大總統愛伯爾署名公佈了的。確，一九一八年以後德國的社會情勢，就是混亂和不安，罷工和革命的騷動。暗殺，反革命以及不斷的政變，這些都無秩序地族生着，這就是戰後德國的情勢。說到戰後勞動者的地位，它是「負擔着巨額賠款，

現在貧困的底裏，呻吟在對內對外的兩重榨取下。除掉剛剛停戰以後的變態的好況以外，德國勞動者的工資，非常貧弱的。」

於是就以法國一九二三年占領魯爾發端，德國勞動階級的不滿，更在同年十月，宣佈萊因省獨立，暴發成漢堡的共產黨的革命。不久就因政府的壓彈政策，終於失敗了。可是，德國勞動運動左翼的傾向，並不就此終結，它隨着右翼的動亂（卡普（Wolfgang Kapp）的暴動，一九二三年九月希特拉在明亨（München）的行動），愈益擴大化了。

第十九章 大戰以後的經濟狀況

一

從世界大戰末期到凡爾塞和平會議爲止，這個期間，支配着歐洲的有二種思想。一種是美國大總統威爾遜所代表的思想，在帝國主義的和平十四條的原則裏，可以看得出的。另一種是法國資產階級的代辯人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所表現的懲罰原則。前者由和約第一篇，規定設立國際聯盟，而具體化；後者主要是由凡爾塞和約第七篇所規定的懲罰形式，而告完成。在威爾遜的協調主義和克里蒙梭的懲罰主義之間，有英國的機會主義的態度，憑了英國的斡旋，和平會議好容易一直進行到凡爾塞和約的訂結。

因而，凡爾塞條約，只是把這兩種思想（協調主義和懲罰主義）雜然並蓄在一個帝國主義

的條文裏罷了，這是已經說過的了。說到世界大戰爆發的責任問題，戰後在德國以及協約國各國家的政治家學者之間，各自站在擁護本國資本的立場，互相論爭，結局，關於誰應當負責任直到現在還沒有決定。而且，立在這樣立場上的議論，結果要想一致，到底是不可能的。因之，所謂凡爾塞和平條約，立刻暴露出它的矛盾，本是自然的了。

世界大戰以德國慘敗而告終結了。德國輝耀的鐵十字，完全被打倒了。勃蘭德拉 (Brandler) 說：「德國在世界大戰裏完全失敗了。喪失了亞爾薩斯·洛林和上西里西亞的工業區域，以及稱爲「波蘭走廊」的波森。德國失去全部殖民地，全部戰艦和大部分的商船，都被戰勝國強占去了。德國再又失去了一成九分的煤礦，一成六分的褐煤礦，七成四分的礦山，鋅產量的六成八分，二成七分的熔鑪爐，一成六分的輪轉機械，六成的鋅鑄造所，以及耕地的一成四分三釐。世界大戰裏，死亡二百萬人，負傷四百萬人。戰爭更把死亡數提高四百萬，出生數約減少了三百萬。國內的戰時負債，數達一千三百萬萬馬克，道斯計劃 (Dawes Plan) 規定應當支付給戰勝國——協約國方面的賠償，實達一千三百六十萬萬馬克。」

在戰敗國的德國經濟上，最大的難關，便是賠償問題。這也成爲世界經濟的癥了。在戰勝國的復興上看來，獲得賠款是支付國債本利所不可缺少的財源。非靠它來彌補財政的平衡不可。所以「賠償問題」在德國固然不用說，就是在協約國方面，也是死活的問題了。

世界大戰以後，直到和約成立，其間經過半年；簽訂凡爾塞和約到實施道斯計劃爲止，經過五年；從道斯計劃到楊格計劃（Young Plan）的成立，又經過五年；到洛桑會議，再是三年，合計起來，自從講和成立以後，雖是經過了十多年的歲月，其間始終成爲問題的，便是這個賠償問題。

從歐洲恢復和平，到一九二三年賠償數量未確定時爲止，可算是賠償問題的第一期。在這期間，「賠償問題完全忽視了德國經濟的財政的內容和能力，只想妨害德國恢復帝國主義，封鎖它的經濟復興，要永久地把德國固定在世界二等國的地位上。只是從協約國的政治上的觀點，來對待德國的。」所以，凡爾塞和約並不確定德國一定要支付的賠款數量。協約國的政治家，只負有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以前，決定後，當向德國通告的義務。在未決定賠款總數以前，德國從一九二一年五月以後，三十年以內，在賠償委員所規定的時期，用現物或發行債券來支付。講和條約裏，

國爲表示保障和承認賠償債務的意味，決定第一次支付一千萬馬克的金幣及無記各種債券。德國從和約簽訂以後二天，以一百二十天爲猶豫期，被命每月輸送煤三百二十萬噸。一九一九年九月一日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德國所輸送的煤，達一萬萬九千五百萬噸。「在這種強迫輸送繼續的期間，德國本身也缺乏煤了。更可奇怪的，輸送到英國去的德國煤，再反輸入到德國，竟會有這樣奇觀的。」還要奇怪的，協約國方面的煤委員，命令每日輸送煤二十萬噸到四十萬噸給那正和俄國共產軍作戰中的波蘭資產階級，所以德國就停止輸煤給協約國了。

可是，所謂「斯巴(Spa)協定」成立了。一九二一年五月，倫敦開賠償問題會議，規定德國賠款總額爲一千三百二十萬萬金馬克，在今後三十二年裏，決定德國每年支付二十萬萬金馬克，此外支付約當輸出貿易額的二成五分金額。這就是稱爲倫敦支付計劃書的內容。

賠款的支付，是財政問題，同時是經濟問題；可是不久，這就變做歐洲頂重大的政治問題了。這裏的事實，暴露了二十世紀歐洲各國的利害，是如何錯綜之極。這同時又證明了，現代的國際生活，是怎樣緊密地，用經濟的聯帶這種羈絆，把世界各國束縛着了。

這期間，德國國內，馬克急速度地暴跌了。平價約值日金四角八分的馬克，在賠款總數被決定的時候，只值得四分二釐了。它還一步一步地下落，第二年歲末，只值得一釐的百分之二六；到了第三年四月，更行暴跌，變成連紙張印刷費也不夠的狀態了。

這樣，德國財政，到了破產的門前，假使賠償問題不加一些糾正，是不得了的。於是便在倫敦和巴黎開大使會議了。可是收的效果呢？法國資產階級放出「德國故意不履行賠款」的聲浪，就散了。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一日，法國在警戒「德國故意不履行賠款」的名目下，實行侵入魯爾。法國五軍團，比利時一軍團合計六萬軍隊，開進埃森（Essen）和蓋爾曾奇爾亨（Gelsenkirchen），法比兩國政府占領魯爾的辯明書是這樣說的：「爲了德國違反木材及煤問題，所以派遣技術家所構成的監督委員會，到魯爾來監視煤業聯合會（Syndicate）的活動，以便確實獲得移交程序的嚴重執行。爲賠償之能支付，現已決心講求一切必要的處置……協約國現在毫無出之軍事行動或政治式的佔領之企圖，僅開入爲保護派遣委員所必要的軍隊……」

要而言之，法國並不是占領魯爾，而是爲保護而占領的。可是德國政府卻和豫料相反，並不服

屈於法比兩國的指揮。因為法國的占領魯爾，是侵犯國際公法的，是違反凡爾賽條約的。德國用「不抵抗的抵抗」對它繼續實行經濟和勞動上的消極的愛國的抵抗。周圍的狀況，於法國是不利的。特別是英國，攻擊法國的蔑視國際公法的暴行。如像寇仁（Lord Curzon）英國黑衫黨創立人莫斯理（Sir Iswald Mosley）的父親）那樣，把構和條約並不承認占領魯爾的意思，通告各國。法國計劃着分離萊因地帶，援助了萊因地帶的分離主義者。從前宣言萊因共和國獨立的威斯巴登（Wiesbaden）一派，到了十月，在法國軍隊保護下，在亞亨再度發表萊因共和國獨立的宣言。這樣，分離派和反分離派的暗鬪，以及圍繞着這種暗鬪的法軍的暴動，萊因地帶就變成混亂的街頭了。德國終於放棄掉消極政策，重新進行已經一再拒絕了的和法國的交涉，一直到道斯計劃成立，就告成功了。

二

德國在戰後，爲了自力更生所非踏破不可的難關，就是通貨無限制的膨脹。通貨制度的危機，

和政治危機互相表裏，發生在戰後的德國。可以成爲通貨膨脹的原因的，有德國財政的不健全，社會的根本原因等。首先當締結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停戰條約之後，德國就被要求立即歸還俄國和羅馬尼亞的金貨幣。接着根據十二月十三日特里爾（Trier）財政協定，德國負有這樣義務：凡不經協約國同意，不能動用國家銀行的正貨，政府所有的有價證券，在外存款，以及外國證券，再又規定凡屬個人所有的該項存款和證券，惟有得到協約國的同意，纔能輸出。到了十二月十五日，從前俄國那裏受領來的三一二、四七七、〇〇〇馬克，就現送到巴黎了。

世界大戰雖告終結，軍隊的復員費，實達巨數，再加上爲了世界大戰裏疲弊困憊的一般大衆，非從國外調集食品，供給不可。凡爾塞和約實施以後，不得已要支付莫大賠款，因而調集這種現金賠償，就引起匯兌低落；爲了現物賠償，就引起國內物價騰貴，負擔就愈益加重了。其他像國內賠償費，爲緩和社會不安所需用的許多匡救時局的社會設施費，填補鐵道會計的損失等等，國庫的窮困，儘管走上深刻化的一條路了。

直向着這樣情勢的德國政府，從一九一九年以來，屢次打算增收租稅，所得稅以及承繼稅，是

不待說的；連銷售稅，資本利息稅，財產增加稅，增產稅，都斷然實行提高；再又幾次實行提高國有鐵道的運費，以圖增加歲入。再還繼續借債。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二，實在是靠借債得來的。根據和約的支付，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約當政府收入的五分之一；可是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占純收入的十五成。新憲法雖然賦予國家徵稅的權力，還不得不反覆不休地舉債，新政府的財政，就專靠借債換債來調節的。

這樣，美國資本就在莫大的利潤下，流進德國來了。這種資本流入到在復興途上的德國的全部機構裏，德國同盟和企業組合（Syndnate）或者被統制在德國金融資本下面，或者被統制在外國資本下面。德國戰後所謂無軌道的通貨膨脹，早已到了必至的情勢了，根據帝國銀行的給政府所通用的金融，其數如何巨大，約如下表（爭十億馬克）

	金 準 備	貸借金庫證券	財政部證券	商業 票 據
一九一八年底	二·三	五·三	二七·二	〇·三
一九一九年底	一·一	一一·〇	四一·三	〇·五

一九二〇年底	一·一	二二·四	五七·六	三〇
一九二一年底	〇·九	六·九	二二二·三	一一·一
一九二二年底	一·〇	二三八·五	一、一八四·五	四二二·二

不必說，德國在世界大戰的失敗，一半原因是在於生產缺乏。可是生產根據地的涸竭，戰後毋寧遠比戰時更甚。因為各種生產手段，大多數被世界大戰消磨壞了；而且德國一般大眾，戰時忍受着的節衣縮食，跟着一宣告停戰，突然弛緩了。隨着社會革命，又引起小資產階級的動搖，聯軍方面的經濟封鎖，一直繼續到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二日，所以德國國內物資的需給關係，就極頂惡化了。促成戰後德國物價飛漲的因子，都已存在着了。

憑了倫敦條約，雖然暫時打開外貨輸入的路，可是卻沒有完全解決過去禍根的效果。反而倒招來了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的通貨膨脹，接着產生出德國資本流出國外的惡結果。同時，德國政府的豫算，因為鐵道隸屬國家就更加惡化。因為這樣社會的情況，通貨膨脹就擴大起來了。

戰後德國的通貨膨脹，把德國經濟，從根底裏激動起來，這上面已經講到過了。政府在九月二

十七日宣佈戒嚴令，十月十五日，封鎖馬克法案，由財長費爾斐丁（Rudolf Hilferding）創立實施了。

封鎖馬克的發行，目的不在供給新的支付手段給市場，這是實現了德國通貨的價值安定。即以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算來，柏林美金匯兌市場，實爲四、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馬克對美元的市價，恰好達到舊平價的一兆分之一。

經過了許多難關，封鎖馬克鞏固了；可是臨時紙幣，國家銀行紙幣，金債券紙幣，封鎖馬克等，這些都雜然並存在德國。而是最後應當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單一金本位。爲了這個目的，沙赫特（Schacht）做了帝國銀行的總理了。不久就創立金貼現銀行，和道斯委員進行折衝；沙赫特工作得很好，能夠脫出了這個危機。

三

從政治見地上來把握的賠償問題，現在也站在經濟基礎上面，來考慮到德國和歐洲各國秩

序的回復了。於是二個專門委員會，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設立了。第一個專門委員會，是美國的銀行家，以當時居美國副大總統地位的道斯做委員長，研究德國政府財政的均衡，以及安定貨幣的方法。另一個委員會，由英人馬肯那（McKenna）主持，它是進行調查，在德國貨幣價值低下時期，馬克逃避到國外的金額，

這二個委員會，到第二年就向賠償委員會提出報告書。馬肯那委員會，推定一九二三年時，德國流出到國外的資本，約達六十七億金馬克。

關於德國通貨膨脹在國際上的影響，當一九二三年底，調查了德國在外資金的馬肯那委員會報告書裏，這樣寫着：

- (一) 入超以及根據凡爾塞條約的現金支付量，合計九十萬萬到一百萬萬金馬克；
- (二) 馬克信用以及馬克銀行券，在國外賣出量（德國經濟由於賣出馬克信用，得到七十萬萬到八十萬萬金馬克的利益；由於賣出馬克紙幣，得到六萬萬到七萬萬的利益），合計七十六萬萬到八十萬萬金馬克。

(三) 出賣現金——十五萬萬金馬克。

(四) 德國不動產和有價證券，在國外賣出，總計十五萬萬金馬克。

(六) 旅客居留費收支——決算上雖有相當多量的收入，不過德人在外國的用費也少。

(六) 占領軍隊消費額——用外國貨幣，或用外國貨幣來購買馬克後再來消費，其消費量若干。

(七) 船舶保險運輸等的收益——若干。

(八) 德人在外投資的收入，和外人對德投資的收入，抵消之後，稍有利於德國，旅外德人的匯款，以及和德國有關係者同情者的匯款，數量也相當的多。

(九) 德國國內流通的外國貨幣，——在一九二三年底，約計十二億金馬克。

道斯委員會——所謂道斯計劃——認為通貨安定，和財政均衡有密切的關係；而財政均衡，以賠償的經濟化為急要任務。這樣，就產生出賠償制度上道斯計劃這個東西。

道斯計劃大概是這樣的：德國有充分的經濟資源，又有運用它的人材，將來的發展，是可期而至的。因而，只要德國經濟狀況一被改善，德國賠款的支付，就並不感到困難，這是明白的事。戰後紙幣跌價，歲出膨脹，危及財政基礎，海外貿易，也常成入超的狀態；所以首先安定德國通貨，恢復豫算均衡，增進貿易輸出不可。德國非把這三個問題（安定通貨，均衡豫算，增進貿易）當作一個整體來考慮不可。所以就定下如次的計劃：

（一）設立兌換銀行 爲了馬克紙幣的下跌，通貨失去本來的作用。中央銀行又缺乏金準備，國內流動資本，已告涸竭；所以爲了安定通貨，在舊的德意志國家銀行之外，有設立新的兌換銀行的必要。新銀行的資本金，計四萬萬馬克，發行新紙幣，收回舊紙幣。憑了新銀行的運用，企圖通貨的安定，穩定外匯市場。

（二）豫算的均衡 求得填補德國歲出所必要的財源，是獲得支付賠款的財源上所必要的。爲了支付賠款，德人非忍受相當負擔的決心不可。特別是借着紙幣跌價的機會，實行整理國債，所以德國現在，幾乎沒有內債的負擔；結果，德國國民，比英法以及別國國民，負擔更

少量的國債。德國政府假若實行稅制行政的整理，採用煙草專賣制度，那末從普通會計，能夠省出幾成的賠款的。

要而言之，道斯計算關於賠款的支付，在德國國內，就用德幣，因而防止馬克通貨對外價值的跌落。至於支付賠款的財源有四：一是從國家豫算裏，扣除關稅以及酒精煙草，啤酒，砂糖消費稅；一是使國有鐵道發行年利五釐——另有減債基金年息一釐——的鐵道債券，票面一百三十萬萬金馬克，把它無代價地提供給賠償委員會；另又發行優先股（票面二十萬萬金馬克）以及普通股（票面一百三十萬萬金馬克），充作現在和將來的資本之用。其三是發行工業債券，規定全國工業發行債券五十萬萬金馬克（年利五釐，減債基金年利一釐），最後是煤，骸煤，染料等實物的移交。

道斯計劃所規定的這四個支付金總量，從一九二四年以後，五年間每年支付十萬萬到二十五萬萬金馬克；適應德國的經濟狀況，最初二年間完全免除從國家豫算中的支出，到第五年度，即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以後，開始變換原則，從國家預算中的支付，要達到標準支出量——

十二萬萬五千萬金馬克。

可是，道斯不會決定德國的賠償總數，也不規定整個支付時期。因而道斯計劃並不是關於賠償的最後決定，這些決定還要待諸後日。道斯計劃雖則創立了所謂「繁榮指數」的制度，可是該項制度決不會減輕一些德國的賠償負擔。

關於道斯計劃的實施，德國國會決定採用四個法規。（一）銀行法案。（二）關於實業的法案。（三）關於私營鐵道公司的法案。（四）關於外債的法案。道斯計劃的確立，和德國通貨的安定，共同恢復了德國對外信用，打開外資輸入的路，而使生產有整理和擴張的可能。

因而，道斯計劃統治下的德國實業，從一九二五年以後，在一九二八年時間，展開了世界大戰以後頂活潑的實業活動。可是同時，整理過程是用所謂「實業合理化」的方法，新就以釀成勞動不安，企圖在德國無產階級的負擔上來求實業的安定，就引起了所謂「實業合理化的惡影響」。的確，隨着道斯計劃的成立，德國的問題，從政治方面轉換到經濟方面了。這就是說，政治方面有了安立，經濟方面開始了合理化的整個運動。而實業合理化，成爲德國經濟生活和勞動運動

一個頂頂切實的問題。

在一九二五年後半期，德國歷史上兩個決定重要的文件，相繼發表了。一個是共產國際擴大執行委員會給德國共產黨員的「公開狀」；另一個是德國全國工業同盟，給德國資本家階級的所謂「德國工業綱領」。

第一個是關於德國共產黨的再組織的新論題；第二個是對於安定以後的德國經濟，指示了應當進行的道路。一方面對於德國工人階級，另一方面對於德國資本家階級，各在尖端上代表階級的利益；在兩極上互相對立的各個領導部，在一九二五年後半期，同時發表了攻擊的公開狀，這事決不是偶然的。這是對於德國資本進入安定後的道路，各各表示批判的立場；因而一九二五年以後，德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就是這個綱領中（德國工業綱領，和它的批判文書——共產黨的公開狀）的實現過程，在這個過程，德國共產黨為組織的強化，實行精力彌邁的活動的。

因為世界大戰的失敗，喪失了人口和土地，被奪去了重要生產資源地，被搶去了殖民地的德國，負擔着賠償問題重擔的德國，就遭逢了深刻的經濟國難。打開經濟國難的一個方法，就是實業統制運動，採用實業的合理化。

德國的實業合理化，首先表現出來的，就是愛用國貨運動，採用獎勵國產政策，可是這先就不得不受到實業的整理，實業合理化的洗禮的。

實業合理化的中樞，是 R · K · W (Reichs Kuratorium für Wirtschaftlichkeit，創立於一九二一年)，德國聯邦工業聯盟，德國技師協會等等。R · K · W 企圖憑藉着德國實業組織和實業技術的改善，來達到實業活動的經濟化，增進對外競爭能力，以便幫助一般經濟生活水準的向上。德國的實業，時或巧妙地利用通貨膨脹，即使忽視了合理的計算，還能收得到充分利益的。加之，對外幣值的低落，給輸出工業的資本家，以匯兌投併的利益。因而在這個時期，德國實業毫無用心到改善組織以及技術的必要。

可是，一碰到通貨整理，從這種人爲的以及自然的保護上脫落下來的實業，現在便非在和別

一水準上，來競爭不可；於是大家絕叫實業合理化的必要，實業合理化就被普及到資產階級。〔聞了。尤其是隨着道斯計劃的實施，有輸入外資的可能，供給了這個過程上所必要的充分資金。原來，德國的工業，小規模經營者，極爲衆多。據一九二五年國勢調查結果，全部工業經營大約有二百六十萬個之中，沒有雇傭勞動者的經營，約占全體中四成五分，連只雇傭五人以下勞動者也包括在內，它的數量實在就超過了全體的八成七分；雇傭五十人以及五十人以上勞動者的經營，不過祇佔了全體的一分七釐七毫罷了。這樣小規模企業的存在，早就促使某種形式的團體產生——其目的在排除企業者之間的相互競爭。特別在德國，它就用加答兒的形式出現了。

德國從十九世紀末，同業同盟開始發展，戰後，它就進到特別高的階段。一九二三年當時，德國工業的同業同盟約有一千五百個，但據政府一九二五年的調查，數量實在已經增加到二千五百個了。

世界大戰以後，出現的德國實業的合併方法，有 I·G·組合 (Interessen Gemeinschaft)。這是幾個獨立的同業，或相互有聯帶關係的企業，關於利益或資本，締訂結合的契約的。這種 I·G·

組合，在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三年馬克暴跌時代，流行很盛。可是這是處於戰後金融界混亂時期的非常時的方法；這種縱斷的企業集中，一進到實業合理化時代，因為一九二六年三月成立了橫斷的合同組織的法案，就轉換到這個方向來了。德國生產界裏，已經完成絕對獨占形式的，有聯合鋼鐵股份公司，和染料托辣斯。

德國鋼鐵等業上獨占的形成，已經達到非常高度。和頂大的托辣斯——聯合鋼鐵業股份公司（*Vereinigte Stahlwerke A.G. Düsseldorf*）同時並存的，有克虜伯（*Kirdorf*），等托辣斯。而這些托辣斯，在鋼鐵等各生產方面所形成的加答兒上，強固地結合着。

德國的化學工業裏，*I. G.* 的染料股份公司（染料托辣斯）在一切種類化學製品的生產上，占着獨占地位。公司的構成。比鋼鐵托辣斯的構成，還要複雜。這是根據戰前七大商會的利益協定，和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日成立的六公司的利益協定出發的，不僅包括着狹義的染料事業，連染料，藥品，無機有機的化學製品，溶劑和樹脂（*Lac*），合成鞣皮，輕金屬，軟片（*Film*）及其他各種照相材料，人造絲，氮素肥料及其他氮素生產物，合成建築材料賽珞芳，油布（*Lino-*

tenn) 從煤裏乾溜而得的煤油等等，都包含在內的。

以上說的是德國實業合理化的組織效果，其次，非進而說到勞動的能率化不可。實業合理化，是和科學的經營方法相聯合着的，要求生產和配置上技術的改善的。而勞動能率化，就是其中的一種方法，這就是勞動時間的延長。技術的發展，在資本主義的各種條件下面，不可避免地引起勞動榨取的激化。譬如在化學工業，一九二四年五月到一九二七年五月，每週平均勞動時間達四十八小時以上的，從該工業部門工人總數的三成八分八釐，增加到四成五分五釐。根據德國經濟的生產及販賣條件調查委員會的調查，以一九一三年爲一〇〇，平均的實際勞動時間，在棉紡業上，一九二四年是八八·五，一九二七年增加到九二·〇，甚至在農業企業裏，在同一期間，也從八八·五，增加到九一·五。

勞動時間的延長，還採用了各種方法。譬如魯爾地方的煤礦，爲了實質上延長勞動者的勞動時間，而提高了搬運勞動者的升降機的速度。扼要說來，實業合理化的勞動時間的延長，寧可說是原始的方法。德國用實業合理化所獲得的生產性和勞動榨取的增大，祇把各國資本家要想勞

力脫掉的對立，更要大規模地再生產出來罷了。

此外，德國實業合理化運動的進展，達到了「技術的勞動教育學校」的創立；他們在這裏受到強化勞動方法的訓練。這裏還應當注意到的，因為通貨膨脹和勞動強化而沒落了的中間階層，轉向到法西斯主義，而被資本家階級所利用。

第二十章 最近社會經濟的狀況

帝國主義的現階段，構成戰後資本主義的第三期。這個命題，是關於一般世界資本主義的規定；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德國資本主義也實行轉移到第三期。不過，德國有許多特殊的事情，譬如「頂早進到合理化。因為支付賠款而阻害了國內剩餘價值的蓄積，結果，德國資本對於外國資本隸屬性的增大；缺乏作為生產物實現市場的殖民地；因為軍備限制而造成重工業市場的狹隘化；換句話說，這些作為凡爾賽條約的結果，成為戰敗國的德國所受到的走向資本主義發展上的制限。德國資產階級要打開出路，所能採用的手段，必然是提早推移到德國資本主義的第三期。」

德國資本主義憑了合理化運動，和政治上反動政策的採用，好容易地獲得戰後的安定狀態。以來，直到現在，德國的生產，消費，和蓄積，全部還未曾達到戰前的水準。所以，戰後德國社會經濟的特徵，可以扼要指出如下：

第一，德國的經濟復興，決不是全部是所謂自力更生造成的。它明顯地是憑藉着外資輸入，而助成起來的。

第二，德國資本主義的問題，還不會解決。生產關係和價值實現關係的矛盾，正在極度激化。爲了要把數百萬的失業軍，回歸到生產過程，爲了支付賠款，德國全製品的輸出，算定非提高到全世界需要的六分之一不可。

第三，德國國內經濟的發展，不得已努力於帝國主義的擴大和強化。可是卻沒有能夠實現這種努力的權力政治的手段。這裏的矛盾，愈趨發展。德國資本主義沒有資本來實行資本輸出。國家還負有支付賠款的義務。國家收入被制止隨意開支。即德國的全國鐵道，和國家銀行，受到帝國主義對德國的管理。

第四，德國資產階級，所用以克服生產可能性和價值實現可能性之間的矛盾的，是採取這樣方針：用合理化來增強無產階級的榨取，以便在世界市場裏能夠擴張輸出。因而國內市場今後就更加萎縮下去。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鬭爭，不得不一天一天地尖銳化起來。

第五，增進商品輸出，是和相互競爭的各帝國主義國家的抵抗，以及世界市場對於全製品的消化力的限度，相衝突的。德國資產階級，利用低廉工資的生產，也只能確保高度利潤，希望憑了實際加答兒的形成，來緩和競爭。增進國外銷路的傾向，是和形成國際獨占組織的傾向，正相交錯着的。

第六，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回復到戰前的高度，而且繼續要超過它，這個問題，到現在還不會解決。一切解決的嘗試，都歸結到榨取的強化上來。資本主義的解決，是否能夠成功，一視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一視德國無產階級對於榨取的強化，其抵抗的程度，和耐久力如何而定的。（Eugen Valga）

這樣看來，德國在戰後十年間的安定——合理化——狀態，直接影響到現在德國的經濟危

機。這是因爲，一方面經濟走向獨占的性質，推移到生產和金融的更高的組織形態；另一方面，矛盾和不均衡，明顯地激化起來了。

一九二八年開始的德國經濟恐慌——這是成爲多腦河諸國的農業恐慌和德國的信用恐慌的直接因子的——德國資產階級採用了下面幾種的政策：

第一，工資和俸薪，極度降低，同時，增大勞動的強度。

第二，用下面的新手段，來分配國家機關的費用；即社會的支出，極端緊縮，增加勞苦大眾新稅和關稅的負擔，以便減輕資本家課稅。

第三，用租稅政策和農業政策，來增加中農貧農的榨取。這種農業政策，對於中小農的家庭生計，加上異常的負擔，而減輕了耕種穀物的大地主的負擔。

第四，消費激減和租稅負擔的結果，手工業者和零售商人的所得，早就非常減少了的；現在爲了再向他們實行攻擊，德國政府就到處採用了「減低物價運動」的政策（據Eugen Valga）。扼要說來，一九二八年以後，德國獨占資本的攻勢，雖然主要是對付無產階級的，卻也幾乎及

部中間階級、資產階級、國粹法西斯以及社會法西斯的努力，是對準着下列目標的：「使工廠勞動者和失業勞動者的對立，勞動者、雇用人和官吏的對立，更主要的是一切無產階級和勞苦中間階級的對立，激發起來。」德國政府執行「物價減低運動」的各種方法的意義，也正在這裏。

德國經濟恐慌，破壞了中小工商業。結果，德國法西斯蒂的一羣人，勢力就擡頭了。「薩克森和屠麟根的家庭製造業繁盛的地方，提姆尼次地方的諸小都市，自從一九二九年以來，法西斯主義從十倍增加到十五倍。」法西斯勢力因而擡頭的事實，從此也可證明了。

二

德國經濟恐慌，實際是從一九二八年以後，激化起來的。只倚靠着對外信用來運轉着的經濟機能，在賠償和外債的過重負擔下面，達到末路了。德國的賠償問題，暫時雖由道斯計劃的實施，而獲得解決；可是德國國內的財政經濟狀態，此後卻愈加惡化，要支付道斯計劃所規定的標準年金二十五億馬克，到底發生困難；而且因為道斯計劃是暫行的方案，所以各種問題，就在德國枝節橫

生。

這樣，在一九二八年度（一九二八年九月）終結以前，接着到來的賠償問題的負擔，需要最後加以決定。爲了這個目的，一九二八年九月，就在日內瓦召集國際會議，打開了制定楊格計劃的序幕。

楊格計劃是以楊格爲領袖，從一九二九年二月起，大約費了四個月時間，經過許多的周折，在同年六月，就容易纔制定了。楊格計劃的中心，是規定賠款應當在一九二九年度到一九八七年度之間付清，最初年度（一九二九——三〇年）付七萬萬四千馬克，以後逐漸增加，在一九六五年度，達到二十四萬萬二千八百萬馬克的最高點，從此漸次減少，一九六六年度——一九八三年度，每年十七萬萬內外，一九八五年度以後降低到九萬萬馬克，直到終結爲止。

支付楊格計劃的賠款財源是：第一，從德國鐵道公司——國有鐵道——，在三十七年間，支付萬萬六千萬馬克。第二，從國家財政內支付十二萬萬五千萬馬克，此外根據道斯計劃的財源，全止。最值得注目的，是把貨物賠償量確定，最初年度規定七萬萬五千萬馬克，以後每年減少五

馬克到了第十年度，只有三萬萬馬克，當年起廢止貨物支付。這樣，德國的，不成爲世界之癌的賠償問題，最初由斯巴會議改成道斯計劃，再改變爲楊格，終於把賠款總額減低到三百五十八萬萬，僅及原案四分之一，而告解決了。

楊格計劃的特徵，是德國的支付賠款，比道斯計劃容易得多。設置支付賠款監理官，設立國際清算銀行，向它支付賠款。楊格計劃和道斯計劃頂大不同之點，就是把支付賠款分成二部分，每年支付額中，六萬萬六千萬馬克是無條件部分，其餘是有條件部份，前者無論有怎樣事情發生，不准支付延期，而且強制用外國本位貨幣，支付給國際清算銀行。後者根據實際情形，允許二年期的移交猶豫，延期支付一年，不過在移交猶豫的場合，德國當收有條件的賠款某部分，以德國本位貨幣，存放到國際清算銀行的貸方的帳項裏。國際清算銀行可以用它當做對德的投資的。

不過，就是楊格計劃，也決不是最後的解決。德國在平常年頭，假使每年沒有四十萬萬馬克的正貨，以外債或出超而收歸本國，那末就處在沒有支付餘力的狀態裏了。可是德國的對外信用，決不是有無限舉借外債的可能。況且所謂「空腹輸出」也不能夠長久繼續的。

特別在現在，德國的經濟恐慌，還可能支付賠款嗎？因爲看法的不同，有的甚至說賠償問題，是德國經濟恐慌的真正原因。所以，德國遠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二日，議會就以三百十四票對五十票的大多數，通過政府應從速改訂楊格計劃的提案了。

三

德國的賠償問題，因楊格計劃的實施，暫時得到解決，這也是事實。可是，一九三〇年十月，紐約發生股票暴跌風潮——原因是由加拿大小麥恐慌引起的——接着就波及到歐洲，中歐特別是奧地利的經濟恐慌，就成爲不可避免的形勢。一九三一年五月，因爲奧地利的信用恐慌所表現出來的世界信用恐慌的暴風雨，立刻襲擊德國經濟，從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七月，外資的收回，以及本國資本的逃亡，達到可怕的鉅量。不管德國銀行運用提高利息政策，而該行金準備還是從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國家馬克（Reichsmark）（五月末，激減到一、四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國家馬克）（六月末，）到七月末，再激減到一、三六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國家馬克。

是白魯寧 (Herinrich Brüning) 在該年三月，就停止議會，正在進行緊急處分的時，爭態被險惡的空氣所包圍着了。最初犧牲的，是丹穆斯達忒國民銀行，在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三日聲明停止付款。

德國白魯寧和冠蒂斯 (Dr. Julius Curtius)，英國麥唐納 (James Ramsay MacDonald) 和漢德生 (Arthur Henderson) 就在契卡斯會見；另一方面德國本國，在六月三日頒佈緊急處分法。可是政府和中央銀行，爲了克服當前恐慌所採用的各種臨時對策，還不能補救德國的破局。同年十二月，在美國發表的德總統興登堡給美總統胡佛 (Herbert Hoover) 的說明德國金融界 實況的信，確切地說明當時的事情：

「大總統閣下：德國國民慘淡之痛苦，於今已達極頂，未容再事袖手傍觀矣。故向閣下懇商及之。德國國民，於過去數年，已忍受極度困苦貧乏，國民之苦難，去冬已達極點，雖至今春，我金融界實業界好轉之希望，未能實現。於是予根據德國憲法界予之緊急權限，實施應急政策。目的在保障國家緊要政務之執行，並保障我失業人羣之生活。此等應急方策，對於一切經濟上社會上

之關係，發生深刻影響，故德國國民，各方面均須付以重大犧牲，以國內手段，求情勢好轉，而講究善策。然襲擊世界之經濟恐慌，對於因世界大戰結果，一切餘裕全被奪去之德國國民，尤加以痛烈打擊，徵諸過去數日間之事態，已可明瞭：全世界對於德國之經濟組織，失去信仰，喘息於難負重擔之德國經濟組織，早已至不能完成其機能之境。外國對於吾人所予之大量放款，業已收回。即在過去數日間，德國國立銀行，不得已以其金準備及匯兌資金之三分之一，支付外國。此等事實必然之結果，我經濟生活更被迫有重行緊縮之必要；失業人數，本已達從事實業之勞動者三分之一以上，非更行增加不可。若徵諸求勞動之意志能力，及德國國民之訓練，自信任何困苦，德國國民均能忍受之，以應本國所負擔之債務，但為鼓舞德國國民之勇氣，使之顛面現實生活，且為對於德國履行債務之能力，維持全世界之信賴，則救濟德國，誠為當務之急……」

立在重大的破產深淵的德國，環求投資國美國的援助，美大總統胡佛，也恐懼德國的恐慌，接惹起歐洲各國以及紐約市場的大混亂，所以在六月二十日，聲明了被稱為胡佛計劃的停止賠

(Mortatorium)

(一) 美國政府准許各國政府對美債務，停止償付一年。

(二) 同時，各國政府相互間，亦延期償付賠款一年。

(三) 在此相互停止償付債務一年下，期待金融界之恢復。

因為這個胡佛停止償付債務的計劃，結果德國能夠停付賠款；英、法、意，以及其他各國，一方面能夠停付戰債，同時也停止收入賠款。然而因為胡佛計劃，並不是根據海牙協定的楊格計劃的停付債務，所以區別賠款部分為有條件及無條件二種。像法國那樣，每年收取無條件賠款的，並不一定贊成這個胡佛計劃。因而就一直到了七月五日，好容易成立英法協定，來解決這個爭執。

可是，「胡佛繁榮」並不會光臨德國。世界市場正為「浮動的胡佛繁榮」鬧得像煞有介事的當兒，德國經濟界再被暗淡的空氣所襲擊，大羊毛康采倫「諾爾德窩爾次列」宣告破產，達那特銀行停止業務，終於在一九三一年七月十四日，不得不發佈全國銀行停止支付二天的命令了。

同時，德國政府，在七月八日，以大總統緊急命令，付予德國資產階級的提議——組織共同保證企業組合以法律的效力。結果，德國企業凡有五百萬帝國馬克以上的營業財產的，為保持德國

對外信用，所實行的信用業務中發生的損失，就獲得德國金貼現銀行，在五萬萬馬克限度以內，接受保證責任的權限。

可是，沈溺在經濟恐慌浪潮裏的德國政府，所固執着的救濟德國資產階級的大綱，在當時德國國民一般的意識裏，早已到底不能容許實行了。首先是國粹黨機關報唱議反對，認為德國現在對於外資，不僅已經需要支付十五萬萬馬克的利息，而且再要借入外資，就等於以手自縛了。德國共產黨機關報，也加以苛辣的評論，以為這正是德國對於海外資本，有政治和經濟隸屬的意義。

不過，國家銀行總裁路德（Hans Luther），和英法兩銀行總裁的交涉竟以失敗告終了。這是德國經濟政策的一個方向轉換，而且這個事實，正在說明在這次世界經濟恐慌發展的初期，德國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正在開始作一大轉換了。

這就是說，救濟破產銀行的過程上，德國國家資本的動員，決不是孤立的現象，德國爲了解脫「用恐慌，終於不接受外國資本的援助，就靠着本國的力量，澈底站在自主的立場上，企圖金融機關」改造，正像柯爾（Cole）也早已指出過的，這是意味着在當時德國國民上面，向日漸擡頭的

主義以及法西斯主義，更有力的前進一步。

所以，帝國銀行總裁，縱使暫時抑止德國國民的輿論，而和英法的銀行總裁，交涉設立長期的信用，這個交涉，也就以失敗告終了。理由是法國方面，主張廢止德國所提出的德奧關稅同盟，一萬噸裝甲巡洋艦中止建造等，對於這些政治的要求，德國方面，到底不能夠服從辱國條件的。這也正是表示着德國社會情勢的變化。

四

所謂法西斯主義，是爲了要解脫這種經濟恐慌的政治理想，和國民感情。並不像社會民主黨那樣，徒然尊重對外協調主義，以國家的財政破產爲犧牲，來奉承無產階級。德國的法西斯主義，適應着德國金融資本家新的支配勢力——實業資本的要求，國內實行澈底的勞動強化，對外膽敢實行勿銷對於他們並無任何利益的龐大債務；法西斯主義，就是具有這種勇氣和感情的形式。

德國的國社黨，最近以德國北部做根據地，可是它的發祥地是巴威。奧地利出生的希特拉，一

九一九年在巴威開始加入國粹主義運動。大家都知道，一九一八年德國的革命，也發端於巴威，在獨立社會黨員愛斯拿（Kurt Eisner）領導下，樹立了革命政府，也還是在這裏。

可是，德國社會主義在這裏的業績，並不十分興盛。因為結局，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間，有本質的不同，國民都能夠知道，只要在社會民主主義的範圍裏，社會主義是不能實現的。而在德國，卻保留着非社會主義化的實業這種非能率的經營，和占全德人口約四成的失業者。

國社黨的產生，是對於這種社會民主主義的反動。所以，在國社黨的綱領裏，高舉出增進實業能率，和救濟失業。國社黨在世界經濟恐慌下面，再又得到德國中小市民階級的支持。尤其是，促進國社黨政權成長的頂重要的因素，完全是最近德國農業恐慌的深化，和在恐慌的泥濘裏背負着沒落的命運的中小市民階級的感情而已。

希特拉，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發表告德國國民書，就是從這個他組閣以後，向全國放送的新政府的態度草稿看來，也可以知道，希特拉政府在對國民的公約上，也常常高唱着確保國民的政治地盤。希特拉這樣說：

德國國民被內外各種的約束所眩惑，忘卻過去最良善的德和富——名譽和自由，因此喪失掉一切；這樣十四年的歲月迅速逝去了，德國國民的窮困，是值得戰慄的。中小階級已經全部窮困；災害一次浸透了農民間。我們就要墮入不能夢想的大規模的殘敗局面（Catastrophi）了吧。照現在的情勢看來，崩壞的危機，正達於極點；共產主義者逞其無比的暴力，以狂暴的手段，毒害我們現在失去冷靜立場的全國國民，永遠要破壞統一。假使一達到他們所期待的，那就沒有別的，要比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革命時候，他們共產主義宣傳者所作的預約的更要不幸的結果，現在，他們向我們預約着。

因為國內戰爭，德國不得已產生幾千受喪的，和無數的死者，這特別是報告迫近眼前的暴風雨的電光的警告。

世界大戰時候指揮國軍的老元帥，往時在戰線，現在在國內，對於我們伴侶的友黨和我們國粹社會黨員，為協力一致來挽救祖國，籲求捧獻忠誠。

政府依照下面二大四年計劃，要完成我們國民經濟生活再進的巨業。即（一）為維持國

民生活的必須基礎——食糧，救濟德國農業；（二）對於失業，加以強力而廣汎的攻擊，以期救濟德國的勞動者。

德國大總統與登堡元帥，召呼我們，命令着用我們的一致協力，帶給德國國民以復興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向諸位國民訴請，要求承認讓步協和的必要。」

他那一流的善辯的不爛之舌，由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德國國會總選舉的結果，被數字所保證了。即國社黨議員人數，比較上次增加九十二名，共達二百八十八名，再加上維持着和前次同樣勢力的國權黨的五十二名，那末希特拉政府黨的議員人數，占着三百四十名的壓倒的過半數。

現在國社黨獨裁下的德國，可以說在二個方面，直面临着頂重大的危機。一是國內經濟問題，二是對外政治問題。自不必說，所謂國內經濟的危機，對外政治的危機，在本質上，都不外是同一社會的地盤上所造出的現象。在國內，每次的經濟關係的緊張，是現在德國的頂顯著的特徵；同時，主要是政治關係的緊迫，形成頂大的煩惱。表示德國對內的緊張的，是一九三四年的政

and de'etat) 而象徵着對外政治關係的極點的，是一九三三年，德國聲明退出歐洲軍縮會
不國聯。